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交锋后的交锋



编者前言

什么是“后改革中国？”

一句话，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改革中国。

什么是“交锋后的交锋？”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儿所说的“交锋”，一方面固然是包括了1978~1998年二十年来的三次思想解放，但另一方面，却又绝不仅仅局限于此。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交锋”还包括了与历史传统的交锋，包括与国外各种势力的交锋，也包括与自然环境的交锋，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98年6月25日晚7时37分的中国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当美国总统威廉·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手拉手走下飞机舷梯，踏上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古老而又文明的中国大地时，万众瞩目。正如后来外电纷纷指出的那样，历史把一个跨世纪的发展机遇赋予了中国。

而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们感觉到，“交锋”一词又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内涵和外延——从国内到国际，由抽象而具体，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新的交锋出现了。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也为了不忘却此前二十年间浴火重生的交锋之路，我们将把这种在知识经济时代最新的，也是最初的交锋，称为“交锋后的交锋”。

后改革中国与商鞅（序言）

1998年由朱镕基总理主持开始的机构改革，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大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值此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我们将把此后的中国称之为“后改革中国”。

后改革中国首先是再现革命之精神的中国。小平同志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1998年的改革将是第七次机构改革，因此有人称之为第七次革命。进一步来说，就是再现革命之精神。

后改革中国其次是交锋后的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间中国人的思想已经历了三次交锋：1978年第一次交锋冲破了“个人崇拜”，1992年第二次交锋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1997年第三次交锋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交锋后的中国，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稳健地步入21世纪。

后改革中国最终是为了崛起在21世纪的中国。朱镕基说：“我感到任务艰巨……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中华之崛起，为了走向21世纪，这应该成为每个现代国民都必须恪守的信条。

后改革中国赖以治国安邦的百年大计乃是依法治国。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李鹏提出，要严肃认真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权，

把保障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为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根本任务，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努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诚然如此。

宪法是神圣的，宪法高于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法治国家才是人类社会的最文明表现，只有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才能保证实现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

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 2350 年前的商鞅。

因为商鞅是最古老东方帝国法治神话的创造者。更因为商鞅是一个坚定勇敢的改革者，商鞅身上最早表现出革命的精神。商鞅为秦开帝业，奠基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垂拱之治，这种革命的精神也从此重重传接沿袭了下来，一直到 20 世纪末的今天。

革命之精神一成不变，时代却已面貌全非。商鞅置身于那样一个烽火连天的不治乱世，性命好像土涌陶皿一样随时都可能粉碎，却还是毅然决绝地踏上变法改革的不归之路，其志可嘉，而最终殁于车裂也是从开始就注定了的。商鞅的变法本来可以克尽全功的，只是这需要有一个附加条件的成熟。这一成熟所需的时间已被历史证明。它不是 10 年，也不是 100 年，而是 2350 年。

这一附加条件就是法治。

法治不是商鞅首倡，在大秦帝国之前就已实现了吗？不是，那只能说是伪法治。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法治的精神高于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那时还有森严的阶级，还有一群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帝王诸侯。

难怪现在有人说了，商鞅时代的法治只能是神话。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一个传统的关于家富国强的梦想才能变为现实。

所以要掬一把英雄泪！法治没有错，商鞅也没有错，错的只是当时滞后的社会制度。商鞅，一个最伟大的改革家，一个大无畏革命之精神的最早发扬者，一个为秦开帝业，奠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垂拱之治的最英勇先驱，最终以五牛分尸的车裂之死而殉道。悲剧，更是耻辱，中华文明史上最大的耻辱呵！

后改革中国即将崛起于 21 世纪。站在狼烟苍茫的世纪山巅，于旭日东升中回首来时路，那儿洒着斑斑点点的千年血泪，如果商鞅生于后改革中国就好了……但也不一定非要如此，商鞅是一个也是无数个，只要再现革命之精神，只要高扬一杆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大旗，那么，走进 21 世纪，一定会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代跋）

窗外春风又绿，正当蝶舞之时。但屋子里却是褥热如夏，2951 名人大代表迭起鼓荡的掌声久久不绝，气浪袭人。

这儿是 1999 年 3 月 17 日上午 9 点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九届人大

一次会议的代表刚刚通过投票表决，朱镕基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5任总理。

于是我们要问了：朱镕基背景如何？朱镕基领衔的新一届政府将率领全国12亿人民跨入21世纪，新体制今后将迈出怎样的步伐？在朱镕基任期内，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的腾飞？而追溯朱镕基此前半生的传奇之路尤其必要。

朱镕基于1928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耕读世家。

他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便是读书。他把伯父给他的一点零用钱全部用来买书，后来与书摊老板、伙计熟了，人们就准他用看过的书加些钱来换新书。

10岁，他忍痛让两个女儿辍学。

青少年时期的朱镕基酷爱文学，上小学时，《水游》、《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已烂熟于心。上中学时，涉猎了鲁迅、巴金等的文章。他喜欢京剧，在中学里演过全本京剧。

后来中学毕业，当时大家都互留临别赠言，雄心勃勃的同学有说“纽约见、伦敦见”，有说“争取诺贝尔奖”，朱镕基给一位同学的赠言却很平实：“人生聚散本来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相逢。我愧无嘉言懿行足资兄助，但愿他日重逢，耿耿此心依旧，为兄一饮庆功酒。”家世的经历和生活环境，使朱镕基比一般的孩子早熟很多，形成了直率沉静的性格。

就是这种性格，让他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吃尽了苦头，但他却也因此成长为一个独行于世，有高人之见的非凡人物。

1988年省级干部退休的年限65岁相差5年，正好是一任市长的任期。

邓小平曾说：“朱镕基只能当一把手，不能当二把手。”到上海工作，是朱镕基获得的一个重大的独当一面的机会。年届60的朱镕基雄心勃勃，发誓大干一番。他初次亮相，对上海存在的问题表现出惊人的坦率。

朱镕基一到上海即雄心勃勃地表示：“一任市长下来，我不是重振上海雄风的功臣，就是让上海耽误最后一次改革机会，彻底落后于全国改革形势的罪人。我自己决不甘于做这个罪人，党和国家。上海市人民也不允许我做这样的罪人。”朱镕基还表示，自己要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在实践中考验一下自己的能力。

1988年他们就打破了历届人代会预备会习惯性的宁静，提出了要求上海政府机关领导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并发表讲话的要求。

这个建议一提出，首先得到了朱镕基的响应，而且在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会上，他也主动表示说：“‘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我就好比嫁到上海来的‘媳妇’，代表上海市人民的人大代表们，就是专门对我这个‘媳妇’，进行品头论足的。”⁴发表了坦率、务实、充满自信的竞选演说。本来大会规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候选人，市长和副市长候选人及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检察院院长的候选人，各自的施政演说时间限制在十分钟以内，最长不超过十五分钟，结果，朱镕基讲了一百一十分钟。

朱镕基一登台，其开场白即赢得满堂喝彩。整个会场上因为他的演说内容，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哄堂大笑，气氛非常活跃。

接着，朱镕基以谦逊的口吻，要求会议主持人同意他延长时间，人大代表们以掌声欢迎他延长演说时间。

在一小时五十分钟的演说中，朱镕基许诺说：“如果我当选这座中国最

大的城市的市长，我将使上海市政府成为‘廉洁、高效率的政府’，新一届政府将在上届政府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开拓，但振兴上海不能提倡短期行为，而应有长远打算。”朱镕基在竞选演说中还提出了六条施政措施，包括：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政府官员要廉洁奉公，要从小事做起，制止吃喝乱收礼之歪风；把上海市政府置于人大常委会和市民的监督之下，把全市人民的意见作为施政的座右铭；为加快上海向外向型转轨，1988年将集中精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出口生产，并整顿松懈的劳动纪律；做好肉禽蛋蔬菜等的供应工作，同时加强市场物价管理。

制止乱涨价，发挥上海科研优势，促进科研与生产相结合；保证教育经费稳定逐步增长，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并着手开发浦东、崇明新市区。

朱镕基的演说，多次被代表们少有的热烈掌声所打断。他是该次人代会所有发言中，获得掌声最多的一位。当日下午，朱镕基当选为第九任上海市市长。

果敢决断，直率真诚，对下属严格兼严厉，这是朱镕基在上海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敢说，敢干，是朱镕基的个性特点。

敢说，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是真话，不是八股老套，因此，大家都爱听朱镕基讲话。

有位省级高官曾说过：“听朱副总理作报告，简直是一种享受，既长知识，又受教育，听两三个小时，一点不觉得累。”朱镕基做报告基本不用稿子，讲一些经过调查研究看到的事实，令人心服口服。

敢干，真抓实干政绩突出，使他从副主任到市长，直到副总理，总理。国家经贸系统的官员们对朱镕基果敢干脆的工作作风深为钦佩；上海市民对朱镕基讲真话，干实事的魄力交口称赞。

1993 持下，以治国魄力推出“宏观调控”政策，他首抓整顿金融秩序和金融体制改革，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约法三章，铁面无私，言出必果，令各地一哄而上的泡沫经济急刹车，以经济和行政手段使经济过热和投资膨胀得到整治，有力地压抑了通货膨胀，同时按照“用改革的办法进行整顿，在整顿的基础上加快改革”的方针，优化经济结构，实行：“分税制”改革，扶植股份制和产权改革试点。

1996 制，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快速的增长。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整体配套。重点突破和全面攻坚的新阶段。其中金融调控功不可没，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引人注目的是，它很大程度上依靠了行政控制以外的间接调控手段。1996 年 11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中国外汇储备突破千亿美元。

成为继日本后第二个超千亿美元的储备大国。这条佳讯引起了世界金融界的极大关注。

从实行宏观调控开始，朱镕基担负了实际主持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任。邓小平同志说：“此人懂经济。”这是一句有分量的赞语。软着陆的成功，为朱镕基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1997 人们认为，危机的外部原因是国际资本的投机，而内部原因却是金融秩序混乱和泡沫经济。

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受到严重打击，其后遗症不可低估。

联想到朱镕基在 1993 年宏观调控之初首抓整顿金融秩序。力行金融改革以及今日中国外汇储备已达 1300 亿美元的可喜事实，人们不禁由衷感叹：朱镕基抓得太对了。

中国经济已走向现代经济，正与国际接轨。需要既具有强有力行政组织能力，又具现代经济理论水平的经济战略家们领导经济工作，“专家治国”是大势所趋。人们认为，有朱镕基这样的行家里手实际主持经济工作，乃是国人之福。

近来，香港的《中国评论》刊文介绍新总理朱镕基时，曾引述孟子一句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或许，这正是朱镕基的最真实的写照。

卷一 交锋后的中国

《交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交锋》说了些什么为什么
叫“交锋后的中国”
《交锋》对商鞅的发现商鞅的故事
《交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1998“
《交锋》一书引起轰动”。

文章写道：“由《人民日报》两位资深评论员和记者马立诚、凌志军所著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还没出版，就在北京引起轰动，原来，原国家体改委主办的《中国改革报》获知此书即将出版的消息，捷足先登，从今年 1 月 8 日起，选择该书部分章节在报上连载，每回约 4000 字，迄今已连载 20 回。

自该书连载以来，报社和该书作者收到无数电话，新华社一位记者说：‘看了这本书非常激动！，大家都问什么地方能买到这本书，有人怕买不到，请求报社代为购买。有的表示要买好几本送人，报纸自这天起每天加印几千份供不应求。

本书以 1978 年、1992 年和 1997 这三次重大的思想解放为经，以详实的资料和内幕为纬，详细描述了 20 年来阻挠一系列重大决策。重要事件和重头人物，在台前幕后展开的激烈交锋。涉及既包括官场政治，也包括民间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画出了一幅当代中国近 20 年思想与政治交锋的全景图。这本 35 万字的著作可以说是近 20 年思想交锋的大全。

《交锋》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和十五大旗帜，详尽描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艰难前行的路程。

2 上会下，明的暗的，扑朔迷离，惊心动魄，多少人因此获得前途或丧失前途，多少事件因此扭转方向重新解释……将来的历史学家，对这 20 年交锋将会有多少纷争和评说？介绍改革开放的书很多，但还没有一本书具有这样新鲜刺激的视角，没有一本书从 1978 本书披露的九十年代的‘皇甫平事件，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斗争之后，又一次扣人心弦的重大思想交锋，交锋的结果，是邓小平毅然南巡，亲手解开捆绑中国

人姓‘社’姓‘资’的绳索，推动沉重的中国重新启动改革开放，由此，中国经济才登上一个新台阶，人们才有机会亲身经历了许多新鲜事。

另外，本书还披露了九十年代中期震动京师和海内外的‘万言书，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就在《中国图书商报》刊发这篇介绍《交锋》的文章的同一天，《北京晚报》。

《南方周末》等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权威性报纸也分别刊发了介绍《交锋》一书最新出版的消息，再加上《北京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改革报》等呐喊助威，一夜之间《交锋》走俏大江南北。当一觉醒来，你会惊讶地发现《交锋》正悄无声息地走进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生活。

《交锋》！《交锋》！！《交锋》！！！！

就这样，《交锋》异军突起，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雄踞在国内各大书店销售排行榜上，独领风骚，且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既然《交锋》是如此一本好书，如此一本“令人激动”。“好读极了”的奇书，那么，人们在心中不禁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交锋》究竟说了些什么？

《交锋》说了些什么

那么，《交锋》究竟说了些什么呢？正如《中华工商时报》刊发署名文章“马、凌《交锋》引起轰动”指出的那样——“马立波、凌志军著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的出版正逢其时，它既是献给改革开放 20 周年的一份厚重纪念，也向人们提供了展望 21 世纪的政治思想背景。

迄今为止，在介绍和描写改革开放的诸多著作中，还没有一部像《交锋》这样，直面 20 年，读起来令人掩卷深思，慨叹不已。

任何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在这一连串巨变背后，一定涌动过许许多多政治上思想上的巨澜，发生震颤人心的激烈撞击。

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各种缘故。人们或者偶一与闻，或者知之不详，这对于关心政治。关注自己命运和国家命运的人来说，有如一个黑洞般的谜，这自然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巨大遗憾。

“《交锋》的问世为你解开了这些谜。这本书以 1978 年战胜‘两个凡是’、1992 年冲破姓‘社’姓‘资’、1997 年破除姓‘公’姓‘私’为经，以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为纬，系统地描述了 20 年来围绕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要事件，在台前和幕后所展开的激烈的交锋。从 1978 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 1991 年围绕皇甫平问题讨论，《交锋》都有详细的评述。虽然是写三次思想解放，但三次解放各自向前向后延伸，全书就连成一片，构成了一个有着内在紧密联系的紧凑的整体。可以说，《交锋》是一部 20 年思想解放史，是一部有独特视角的改革开放史，是一部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可以这样说，当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有着崇高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中国公民，仔细深入地读完《交锋》一书后，掩卷而思，你会发现，“20 年思想解放史”，“有独特视角的改革开放史”，“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这些都并非是对《交锋》一书的溢美之辞，恰恰相反，它们恰恰最精确，最概括地揭示了《交锋》书中一些

本质性的东西。

且让我们一一来看。

先说“20年思想解放史”。

这点我们仅从《交锋》一书的副标题“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就可以看出来，《交锋》主要讲述的就是在1978年~1998年的这二十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怎样的三次思想解放：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1992年破除姓“社”还是姓“资”，1997年冲破姓“公”还是姓“私”……在《交锋》一书中，马立诚、凌志军两位作者以深刻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层层面面，把这三次思想解放具体地、通俗易懂地道了出来。因此，说它是“思想解放史”，并不为过。

再说“有独特视角的改革开放史”。

值此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为了向改革开放献礼，数以百计的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描述记录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政治类读物纷纷出版，且层出不穷，大有雨后春笋之势。但是，比较这些读物，你就会发现它们千篇一律，几乎都是从经济生活的变化，综合国力的提高等单一方面来着眼的，深度有了，厚度也有了，但总是力有未逮，就好像小桥流水一样，缺乏一种振耳发聩、大江东去的浩荡之气。一句话，就是缺乏大气魄，大手笔。

后来就有了《交锋》。

所以说《交锋》的视角独特，就在于马、凌两位作者直面二十年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进程，没有被纷繁复杂的社会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以资深记者的老辣深沉和稳健冷静，始终抓住一条防“左”反“右”的主线，把这一部震撼人心的开放史，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样的一本好书，是不可多得了，把它誉为“有独特视角的改革开放史”，也不为过。

最后，让我们着重来说一说“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无须讳言，《交锋》一书在国内首次披露了“皇甫平事件”的幕前幕后的细节，而且，更是首次提到了令“京师震惊”。作为“内部意见征求稿”的四份“万言书”，这些，都让我们不能不佩服马、凌两位作者的勇气和智慧。

或许有的读者还不知道，那么，“皇甫平事件”是怎么一回事？1991目叫做《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文章署名皇甫平。事后得知，这是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干部与《解放日报》负责评论的干部合作的成果。皇甫平，即黄浦江畔的重要评论是也，取其谐音而得皇甫平。

这篇不长的评论，冲破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尽管这篇文章照顾到当时舆论接受程度，没有提“市场经济”，而用了“商品经济”这个说法。但是，文章中所鼓动的“改革年”，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以及“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还是刺激了一些人。

《解放日报》3月2日再发表皇甫平的署名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这篇文章要求：“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文章提出，90年代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在国企改革中，简单地套用过去的老框框不行，被书本束缚住也不行。要有新思路，新招数。什么样的新思路。新招数呢？文章没有具体说明。但是，这篇文章却提出了在当时是发聩振聩的原则性新思路：市场经济。

文章继续批评了“新的思想僵滞”。这“新的思想僵滞”除了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形成了障碍之外，还有哪些表现呢？3“新的思想僵滞”主要所指，终于在这篇文章中出现，这就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

4 备的干部》。

文章提出要把改革开放向新的深度拓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这样，皇甫平写的四篇文章，从锐意推进改革开放，到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姓“社”姓“资”；从发展市场经济，到如何选人用人，形成了一个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完整系列。

皇甫平这些文章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表达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讲话内容。

“皇甫平事件”一石激起千重浪，而后来“内部意见征求稿”的四份“万言书”更是风云突变，“令京师震恐”。

第一份“方言书”把“社”与“资”就成“公”与“私”。

“万言书”本来的题目叫作《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文章大约写于1994年第四季度至1995年初，最迟不晚于1995年春天，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的时候。无人具名，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确切地指出为何人所作。但读者几乎一律地认定，作者为“左”的思潮的坚定的代表者。作者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两年间蒸蒸日上。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又耿耿不能得志之心情，确切地流露在字里行间。

第二份“万言书”：以“反和平演变”为纲。

第二份“万言书”大约出现在1995年春秋之间，题目是：《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仍未具名，但由题目的选择以及行文风格来看，其作者和第一份“万言书”的作者是同一些人。同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不仅先在海外报刊公开发表，而且在国内广泛流传。

文章的主旨与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仍是论证我们国家的安全已经面临严重威胁，但是，这一次，作者所关注的焦点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之后国际的形势。这是同第二个“万言书”的不同处。作者对邓小平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开始说些好话，不像第一份“万言书”里那样根本不提。

平心而论，今天的中国的确有着种种麻烦。同前一份“万言书”一样，这一份“万言书”中列举的问题中，就事论事地说，相当一部分并非无中生有。问题是，这些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应该循着什么途径来观察和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是靠加快改革力度来解决？还是根本否定改革，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样看来，第二份“万言书”虽然没有重申“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走资派还在走”，但其论述却有着异曲同工的奥妙。

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中国的事情，就不仅仅是给改革套上一条新的思想枷锁的问题，还要完全地取消改革，回到“阶级斗争”的年代去。

这是第二份“万言书”较之第一份“万言书”的更加彻底的地方。他们观点的要害是不承认对传统的体制和观念要进行必要的改革。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这一系列“万言书”当中作者唯一注明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1996年10月至12月20日写出初稿，1996年12

月 21 日至 1997 年 1 月 20 日修改定稿。

尽管作者说这是：“内部征求意见稿”，但是，其中主要观点已经在 1996 年第 4 期《当代思潮》杂志公开发表，该文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署名，文题：《以公有制为主体基本的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作为“内部征求意见稿”的第三份“万言书”其思想倾向，观点和行文风格，与前两部分“万言书”一脉相承，但又有一些改变。

我们还能记得，第一份“万言书”抱着对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不以为然的的态度，第二份“万言书”在结尾处引用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在，第三份“万言书”在开头即引用了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的一段话，然后说：江泽民同志“鲜明深刻地揭示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同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内在本质的联系”。接着，“万言书”又引用邓小平的话：“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仍然没有忘记引用江泽民总书记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江泽民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政治的核心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处理矛盾……通过正确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看来“万言书”的作者已经懂得使用“借助钟地打鬼”的战术。

第四份“万言书”：“走资派”名单录。

在邓小平去世前后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报刊，每日静心研读，把他们认为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一一摘录，其作者之姓名和报刊之名称，也一律记录在案。此种环绕意识形态斗争的尺度寻章摘句。分类合并之方法，令人难免想到那个专门搜集整理走资派“反动言论”以“供批判用”的年代。这一次“寻章摘句”的成果，仍旧是一份材料，题目是《1992 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虽未标明“供批判用”或者“反动言论”之类，但读者一望而知，作者是希望有一天拿来“供批判用”的。

这就是第四份“万言书”，其最后的完成，大约在 1997 年 1 月多 12 月间。

像第三份“万言书”一样，这一次作者仍然在开头引述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作为依据。

作者引述的邓小平的话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作者引述的江泽民的话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四份“万言书”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名单。在这些所谓的“自由化分子”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作家。法学家。理论家。“他们的言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所以“万言书”作者指责《读书》、《书摘》、《中华读书报》、《东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今日先锋》等媒体基本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把持；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舆论机构让“自由化分子”露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各省党

报党刊近几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基本上绝迹”。

“万言书”的作者还点了一批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和倾向的书籍。

有耐心的读者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得出一个尴尬的结论：在中国，除了几家刊物之外，主要报刊几乎都在搞“自由化”或者在容忍“自由化”。

这就是《交锋》！思想与思想的碰撞，赤裸裸的交锋。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真正的“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

感谢《交锋》，也感谢马立诚。凌志军两位作者，给我们说了这么多，又说得这么好。

也正因此，我们今天解读《交锋》才有了一些特殊的意义。

为什么叫做“交锋后的中国”

1998 年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由朱镕基总理组建新一届政府，终于强劲启动。

从 3 月份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正发生着变化，几分迷惑，几分压力，几分激动，几分希望……以朱镕基为首的新一届中国政府，朝气蓬勃，年轻化，知识化的特点突出，本科学历占 79%，专科学历占 18 世纪新一轮改革，充满信心。新政伊始，行政新风扑面而来。

新总理走马上任即适访英国、法兰西，参加亚欧峰会，遂起一阵“中国旋风”。朱总理即席发言，妙语连珠，谈笑间，让欧亚增强对中国的兴趣，增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了解。此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朱镕基抓经济有一套，但外交上尚未经受真正的考验。然而，中国新总理亚欧峰会之旅，却显示出他非凡的外交才能与魅力，以致几乎令人想到曾身兼总理与外长的周恩来，“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评价朱镕基：“非常好，他是一个优秀的人。”英国首相布莱尔赞赏“朱镕基的务实、机智与幽默，声称佩服得到了“着迷”的程度。法国总统希拉克拉着朱镕基的手，有意在镜头前竖起大拇指。亚欧峰会期间，各国首脑争相与他会面，每人只获“分配”十分钟的时间。对此时间之短，德国总理科尔“大为光火”。

朱镕基强调：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关系到粮食安全，务求必胜。

4 年内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也箭在弦上。

科教兴国，是新一届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科学技术部部长朱丽兰指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向“高发期”腐败宣战，碰硬陈希同，冰城反贪，扳倒红塔之颠的腐败者……98 再起廉政风暴；“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新总理一言千钧，掷地有声，足见中国政府反腐决心之一斑。

这就是 1998 年，这注定了是不寻常的一年、注定了是要被载入历史纪元的一年。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也为了不忘却此前二十年间浴火重生的交锋之路，1998 年的中国，我们又称之为“交锋后的中国”。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儿所说的“交锋”，一方面固然是包括了 1978 年～1998 年二十年来的三次思想解放，但另一方面，却又绝不仅限于此。

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交锋”还包括了与历史，与传统的交锋，包括与国外各种势力的交锋，也包括与自然环境的交锋……大略定义一下，我们可以这样说——交锋，在历史与传统之间，表现形式为思想的解放，生产的发展；在当前与未来，交锋则具体是以三个问题为载体的，那就是，人口的增长和迁徙。自然环境的限制和机会，以及新科技的突破。

交锋后的中国，困难与希望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

《交锋》对商鞅的发现

《交锋》一书提到这样一个小故事“朱镕基洒泪为商鞅”，故事写道：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很多事，不是没有看清，而是装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有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凤梧所说，‘要说话不敢张嘴走路不敢动腿。’“什么都不做的人，其乐无穷；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心。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正。”我们注意到，是《交锋》发现了商鞅。

应该说，在众多的向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献礼的出版读物里，几乎没有提到过商鞅的，更没有哪一家将商鞅与当前的改革大业联系到一起从而慨叹：“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我们直觉地认识到多。重提商鞅，讲一讲商鞅的故事，再观革命之精神，以史为鉴，这未尝不是关注改革大业的一种方式。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商鞅的故事。

商鞅的故事

商鞅，约生于公元前410年左右，卫国帝丘人氏。七岁的时候，赵国攻卫，为了向魏求援兵，商鞅以终身入魏为质作了交换。从此，商鞅就生活在了魏国西河，拜刑名之学的奠基人李悝为老师。

凡年间，商鞅先后跟着三个师兄吴起、乐羊、西门豹历练，渐渐长大。他恳求老师李悝把刑名之学传授给自己，但是李悝见商鞅天资刻薄，寡恩少义，人又是极聪慧的那种，担心他学了刑名之学会遭反噬，就拒绝了他。

然而时代注定了要造就商鞅这样一个英雄。商鞅先是偷偷学习李悝的刑名之学，接着，到了后来，随着李悝对三个弟子吴起、乐羊、西门豹的日益失望，再加上突然的发生一件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李悝视商鞅为衣钵传人，把刑名之学的毕生心得都传授给了他。

五年艺成，商鞅在李悝的操持下与秦女嬴喜举行了婚礼。李悝要到鬼谷隐居，临行与商鞅约定三年后鬼谷相见，在那儿给他补上刑名之学的最后一课。

但是商鞅后来违反了这一约定，他先是跟吴起到楚国变法数年，接着又西行入秦，妄图封侯拜相以求富贵，结果受了檐乙之骗，嬴喜又得了重病，商鞅滞秦三月，只好灰头土脸往鬼谷来投老师李悝。

谁知到了鬼谷，老师李俚已病亡多年。刑名之学的最后一课从此失传。商鞅又跟鬼谷先生学艺数载，最后秦女嬴喜吞金自杀，以死相求，商鞅这才二番入秦。

秦孝公拜商鞅为大良造，令其主持变法改革。用之十年，而国大治。于是商鞅迁都咸阳，再行新政，继而屯兵戍边，以攻魏国，大胜。秦孝公拜商鞅为相国，封以商鞅之地十五邑，号称商君。

因为变法改革得罪了很多人，商鞅意识到刑名之学可能反噬自身的危险，就听从门客赵良的劝告，辞相退耕。

但商鞅最终车裂而死的命运注定了是无力挽回的。这一年秦孝公病重，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知道自己的儿子秦惠文王不足以完成东吞大国、一匡天下的大业，于是颁遗诏废秦惠文王，而传国子商鞅。

商鞅纠六国之兵，正欲伐秦，却忽然染上一种不治绝症。已年近花甲的商鞅知道自己是不行了，想到自己聚众攻秦，已违反了当年对秦女嬴喜的誓言“不与秦仇，不灭秦祀”，他决心践违誓之诺“死于车裂”，以报嬴喜。

于是商鞅自请降秦；并提出要受车裂之刑，“五牛分尸而死。”

秦惠文王迟疑不决，痛恨商鞅的那些大臣如公子虔、甘龙、杜挚等却早急不可耐。一个寒风呜咽的早晨，他们偷偷地，以五牛分尸的车裂之刑，杀死了年老病重、奄奄一息的商鞅……。

第一章 历史赋予的机遇

上篇

一、震撼世界的9天

1998 里·克林顿手拉手走下飞机舷梯，踏上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古老而又文明的中国大地，一个历史性的瞬间终于来到——克林顿对华 9 天的国事访问正式开始了。

据报道，克林顿访华 9 天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6 月 24 日启程飞往中国，6 月 25 日傍晚抵达西安，6 月 26 日参观村落和兵马俑博物馆，6 月 27 日至 6 月 29 日在北京期间，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参观故宫和长城等。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在上海与企业界人士会晤等。7 月 2 日，游览桂林漓江。象鼻山等。7 月 2 日晚至 7 月 3 日访问香港。

从 6 月 24 日到 7 月 3 日这将是震撼世界的 9 天。这 9 天注定了将不同寻常，这 9 天注定了将被载入史册。

截至到编者发稿时，也就是截止到 6 月 28 日止，克林顿总统已来华 3 天了。那么，在这过去的 3 天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呢？且让我们分头来着：1998 年 6 月 28 日，满面笑容的克林顿总统和夫人希拉里手拉手走下飞机舷梯，与迎候在旁的陕西省副省长贾治邦和夫人热情握手，互致问候。两名西安少年儿童向总统夫妇献了鲜花。

随后，克林顿总统一行离开机场，前往西安南城门，陕西省省长程安

东和夫人在此迎候，并陪同美国贵宾参加了西安传统的旅游项目——仿古迎宾入城仪式。这种礼宾仪式近年已举行过数次。

西安市市长冯煦初在古城门前向克林顿赠送了象征西安人民友好情谊的“金钥匙”。克林顿总统高兴地接过钥匙，表示感谢。

冯煦初在仪式上致欢迎词，他说，热情好客的西安人民欢迎克林顿总统阁下和夫人访问古城西安。

克林顿总统在仪式上说，他期待着通过这次访问，了解更多有关中国对人类智慧宝库的伟大贡献。中国有“令人自豪的历史。有明天的希望”。

他说：“美国人民佩服你们的成就，你们的经济，你们勤劳的工作。创造性和远见”。

“作为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国家，中美对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

1998 年“世界第八大奇景”之一的秦始皇兵马俑。克林顿夫妇获得前美国总统里根一样的“特权”，走到兵马俑一号坑底，在兵马俑群中仔细观察制作材料和工艺。

后来，克林顿一家又在下和村农民杨西安家的庭院中小坐片刻，并未入屋。总统一家与杨西安家人在庭院简单交谈后，滴水未进，便在杨家的门外，和六名村中的代表交谈。

1998 年 7 月 25 日，受到在这里等候的江泽民主席和夫人王冶坪的欢迎，双方亲切握手。两位中国少年向克林顿总统和夫人献了鲜花。克林顿是继尼克松、福特、里根和布什之后，第五位在任时访华的美国总统。

两位元首在分别介绍了参加欢迎仪式的中美官员后，走上了检阅台。由 60 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先后奏响美中两国国歌。此时，鸣礼炮 21 响。

随后，仪仗队队长正步走到检阅台前，向克林顿报告：“总统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之后，在江泽民主席的陪同下，克林顿走下检阅台，踏上红地毯检阅了由 176 名官兵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9 此后，从 6 月 28 日到 7 月 3 日的 5 天里，克林顿总统还将访问中国的上海、桂林、香港等地方。既然过去的 3 天已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那么，此后 5 天里将要发生的一切也注定了会牵动全世界几十亿人的心弦。

当然，克林顿总统的对华访问还在继续，我们也还不可能知道未来的 5 天之内，具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依然要说的是，克林顿总统的访华是划时代的，在美中关系史上是里程碑式的。正如如外电纷纷指出的那样，“历史把一个跨世纪的发展机遇赋予了中国”，同样地，历史也把跨世纪的发展机遇赋予了整个世界。所以说，从 1998 年的 6 月 25 日到 7 月 3 日距 7 月 3 日还有 5 天，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中篇

一、新纪元

1998 年 3 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胡锦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98 年 3 月，温家宝为国务院副总理。

1998 这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日本时事社、共同社、美国美联社、法国法新社等外电纷纷报道了这些消息。且让我们分头来看：3 月 16 日，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选举李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这次大会上，江泽民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党内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历时 10 年，担任了两届总理职务的李鹏今后将站在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的立场上，努力加强作为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的作用。

江泽民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同时再次当选为国家军委主席。

可以认为，胡锦涛在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之后，将在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等党内工作的同时，协助江主席工作。此外，他还将积极参与外交活动。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和曾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都因年事已高而引退。

刚刚投完票的河北省人大代表郭先生说，希望新的领导机构“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在谈到已经成为人大委员长的李鹏时，这位代表表示：“作为总理，他了解人大的工作，而且身体健康，是称职的。”在这次人代会上，代表们要求“重视法制”的呼声很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立法机构的职能将是李鹏所面临的课题。

代表们普遍认为，江泽民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积极传播者。这意味着，他能够在保持党对社会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1994 年春天，江泽民发动了反腐败运动。

中国官方报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核心。他是个善于交际和精力充沛的人。

3 务院总理。在宣布的一刹那，会场上响起了热烈掌声，由此可见，为克服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难题，人们对“铁腕总理”寄予厚望。

坐在主席台上的朱镕基随即站起来向代表们致意。会场上再次响起掌声。这时，朱镕基走近前任总理李鹏的坐席，微笑着与他握手，表现出新总理的风度。

一位香港代表说：“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出色的领导人。”日本三和银行驻上海分行负责人川又先生说：“大家都看到了他对上海和中国的经济所做的一切。”在今天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张万年和迟浩田将军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大会还选举博全有，于永波，王克和王瑞林将军为中央军委委员。该委员会是由江泽民本人任主席的中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

3 院机构改革，部长减为 29 人，其中新部长有 23 人，有两个企业的最高领导人被任命为负责主管经济的部长。这种人事安排显示了朱总理对改革国有企业的积极性。

关于副总理的人事安排，除继续留任的李岚清、钱其琛和吴邦国外，又增加了温家宝，由原来六人改为四人。据认为，李岚清作为第一副总理将统管全面经济工作，钱其琛主管外交，吴邦国负责工业和国有企业，温家宝主管农业和金融工作。

朱镕基的新政府看起来精干、年轻。人数减少了 30%，政府成员平均年龄下降了四年。

包括朱镕基总理和副总理，国务委员及部长在内的国务院共有 38 人组

成，平均年龄为 59 新政府中有三位女士，而上届政府中有两位。她们是国务委员吴仪。教育部长陈至立和科学技术部长朱丽兰。新政府中还有四人是少数民族。

3 幕。江泽民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朱镕基取代任职已 10 年的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中国领导人将率领 12 亿人民跨入 21 世纪，新体制今后将迈出怎样的前进步伐？为此，我们对中国面临的国有企业改革等内政课题以及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作一分析。当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以 98% 的高票获得通过时，人民大会堂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的确，精简四分之一国务院部委这一改革方案，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强有力支持。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只要通过了科举考试，权力、名声和财富就会接踵而来。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之所以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蔓延，与这种传统不无关系。

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异常艰巨的，堪称“一场革命”。过去，中国曾多次尝试进行改革，但最终都走上了“压缩、膨胀、再压缩、再膨胀”的老路。机构臃肿造成了目前这种状况：三四十个老百姓供养一名行政官员，近一半的财政收入消耗在干部身上。

膨胀的官僚机构不仅对财政造成压力，而且还阻碍了经济活动，滋长了以权谋私的风气。中国将在三年内精简一半的公务员，问题是如何安置精简下来的一大批人员。

国有企业改革是人代会的又一热门话题。在改革过程中，失业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峻。

在传统体制下，企业拥有一支庞大的从业人员，并且还要承担职工住宅、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福利负担，企业显然无法摆脱亏损的局面。人人都知道企业首先必须裁减剩余人员，然而，问题是如何安置日趋增多的失业人员。

去年，全国有近一千万的工人下岗。其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中央领导人在人代会分组讨论会上多次强调要全力解决好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为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政府还新设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能否解决下岗和再就业问题，事关中国改革的成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 17 日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一开始便高兴地宣布，美国总统克林顿决定将于 6 月底访华，中国对此表示欢迎。中国方面曾希望美国总统提前访华。由于此事已决定下来，中国新体制在外交方面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近几年中国着重与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欧盟开展了大国外交。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是通过推进多极化来打破美国的一极统治，而仅依靠传统的重视第三世界的外交，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

在不久前的伊拉克危机中，中国站在反对使用武力的海湾国家一边，与同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法国联合起来，阻止了美国向伊拉克发动攻击。

朱镕基总理将出席 4 月初在伦敦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同日本、欧盟等国家开展首脑外交。届时，中国新体制的外交活动将正式开始。此外，在人代会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也将于 4 月访日，为江主席秋季访日和日中友好创造良好的气氛。江主席还将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

作为大国外交的主要活动之一，中国将迎来克林顿总统的访华。中国

打算同美国加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使美国彻底放弃遏制政策。

二、大国之路

3 潮。新一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富有务实精神，现代意识和个性色彩的演说，给人大代表，中外记者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相信所有坐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都会被领袖们的直面现实所感动，都会为领袖们的决心和信心所鼓舞。

“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崇高而重大。我将忠实地遵守宪法，恪尽职守；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江泽民主席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入正题即突出，“忠实地遵守宪法”的思想，不仅使人们品味出国家主席宣誓就职的庄严感，也透露出将加强依法治国的重要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李鹏委员长在随后所做的闭幕式讲话中，也用一半以上的篇幅阐述依法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的权力。”听罢江主席这篇约一千字的讲话，还有一个突出的感觉是文采飞扬，充满激情和鲜明的个性，充满必胜的信心。“要奋斗要发展，就会有困难有风险。但是，任何困难和风险都无法阻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这个雄心壮志不仅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必将胜利地到达现代化的光辉彼岸。”朱镕基总理在 90 分钟的中外记者的招待会上，充分展示了一个大国政府总理的自信。

坚定、博学，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仅征服了在场的 600 多名记者，也必将深深地感染所有收看电视直播的观众。“不管前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几句坦率、直诚，令人感叹的话，体现出新任总理对国家，对人民沉甸甸的责任感。的确，对新上任的朱总理来说，未来五年任期内的日子决不会是轻松的，而对保持经济增长，尽量安排就业，政府机构改革，国有企业解困，金融风险防范等诸多现实经济问题，他要做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工作。因此，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用“惶恐”来形容自己出任总理的心情，即唯恐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连续几天，国内外舆论对我国新一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评价颇多，颇高，尤其是对新上任的国务院总理，媒介评论如潮。海外有报纸甚至用“英雄造时势”表达对中国新领导人的期望。不少身为省部级官员的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新上任的朱“总理表示由衷的赞佩；一位与朱总理接触过的基层代表，则用“确实在行”这样朴素的语言表达对新总理的信任和拥戴。从朱镕基任国务院总理的提名获得通过时代表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也可感觉到，人民代表对朱总理寄予厚望。

既然众望所归，我们有理由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中国人民的事业将无往而不胜。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1998 年 3 月 24 日上午主持召开第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会议通报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工作分工，讨论通过了《国务院机构设置和调整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方案》，讨论通过了修订后的《国务院工作规则》。

朱镕基在讲话中，首先要求国务院全体的工作人员，不辜负党和人民

赋予的权力，认真履行宪法规定的职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历史的重托。

“朱镕基说，本届政府总的任务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制定的跨世纪战略部署，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朱镕基指出，本届政府任期的五年，是跨世纪的五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许多领域进入攻坚阶段和决战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有相当多的棘手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的工作任务重，难度高，风险大，同时又前景光明，充满希望。这五年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就可以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上届政府在李鹏总理领导下，成绩显著，为今后的工作创造了好的条件。我国的物质技术基础大为增强，外汇储备和粮食等重要物资储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回旋余地明显加大。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被实践证明正确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全有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我们过去经受住了国际国内种种严峻挑战和考验，也一定能够在新的挑战 and 考验中赢得胜利。

朱镕基强调，做好本届政府的工作，第一年是关键，务求初战必胜。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的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必须认真完成，特别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坚决执行中央研究的方针，确保今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八，物价涨幅低于百分之三，人民币汇率稳定。要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主要是适当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重点增加农林水利建设投入，增加铁路、公路、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比重。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居民住宅建设，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稳定和加强农业，保证农业生产有个好收成。加强扶贫攻坚工作，争取今年再有 1000 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解决温饱问题。积极引导居民消费，拓宽消费领域，特别要重视开拓农村市场。要努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千方百计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继续深化外贸企业改革，充分挖掘潜力，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和加工深度，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稳定吸收外资规模，合理引导外资投向。

第二，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要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三大改革事关全局，中央分别提出了三年要达到的目标，必须如期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步骤已经明确，要继续认真落实。要建议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这是实行政企分开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对企业领导人考核、奖惩、任免制度的一个改进。要着力抓好纺织行业的改革和扭亏解困。

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和监管职能，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步伐。医疗保障制度和完善财税制度等五个方面的改革。国务院将要召开会议，对这些改革进行具体部署。在实施中，要把握好各项改革出台的时机和步骤，精心组织，使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能力相协调，实现稳中求进。

第三，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切实抓好再就业工程。这是国务院今

年要抓的一件大事。要集中力量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占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提高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能力。宣传和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广开就业门路，从政策上支持和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各级政府要充分体谅和理解下岗职工，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第四，把政府机构改革工作做细、做实、做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要抓紧实施，做到不动摇，不走样，不变调。要真正转变职能，实现政企分开。该交给企业的权力要下决心交出去，不能只在部门之间搞权力转移。各部委的内设机构，领导职数要减少，人员要精减，“三定”工作在年底以前完成。新组建的机构要抓紧挂牌工作，内设机构调整较大的部门，要尽快理顺职能，正常运转。省级政府的机构改革方案也要加快制定。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各个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到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间断，国有财产不流失。现在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所有干部都应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通过“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的办法，全面提高公务员队伍和企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朱镕基最后说，本届政府的任务十分繁重和光荣，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国务院组成人员，必须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旺盛的斗志，坚定信心，励精图治，高效廉政，做好跨世纪的一届政府工作。

朱镕基提出五项要求：第一，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第三，要从严治政，敢于得罪人；第四，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第五，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朱镕基还与大家约法三章：第一，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第二，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第三，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及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不为各部门工作会议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名，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处理重大问题上。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国务委员迟浩田、罗干、吴仪、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以及国务院全体会议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上，王忠禹和人事部部长宋德福分别就规则和方案作了说明。

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下篇

一、一个人与一个世界

翻开一本广东某县最新的干部花名册：部委局办共 73 个，正副职领导 508 人；其中，县委办公室主任 1 正 14 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1 正 13 副，建设局与人事局的局长分别为 1 正 9 副。在这个处级县中，科级干部近 1300 人；其中县纪委与组织部这样的副处级单位，科级干部分别为 25 人和 19 人；县口岸办公室共有编制 9 人，正副主任就有一人。广东省省长卢瑞华一针见

血指出：“不再需要什么触目惊心的事实，这组数据足以证明机构非改不行。”顺德市市长冯润胜曾为两个现实而困惑：顺德是甘蔗产地，特设农委、农办、农林局和糖业局等 4 个机构管蔗农。冯润胜因此感慨：“农民该听谁的呀！”另一现实是，外商洽谈投资会上市长出面试判，项目谈成由市长签字，奠基或剪彩还由市长舞锹弄剪；全累市长一人，别人不顶用。冯润胜又感慨：“我是哪家企业的法人代表？我究竟是谁呀！”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是 8000 人养 1 个官员，唐朝是 3000 人养 1 个官员，现在是 40 个人养 1 个公务员。食者之众，生者之寡，国家财政自然入不敷出。”新总理朱镕基被错划为“右派”而下放劳动，他 51 岁时才是副市长。也许独特的人生经历，在他的行为中体恤民情是非常突出的一面，他反对机构臃肿给百姓增加负担，更痛恨腐败官员滥用权力搜刮民脂民膏。他个人也以清正廉洁著称，早就宣布：“不题词，不剪彩，不吃请。”另外，朱镕基的一贯风格是雷厉风行，他厌恶层层扯皮和有令不行，他把盲目指挥重复建设视为“万恶之源”。他任上海市市长时就提出“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在吸引外资方面只设立了一个“外资委员会”。因此，建立一个廉洁、公正、精干、高效的“小政府”是他内心深处的愿望，也是他人生阅历的深刻积淀。

记得 1993 年那次机构改革，只有轻工部与纺织部改为“总会”。当时这两部委的中低层官员曾抱怨“部长太软”。但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参加纺织总会成立大会时发出一个明确信号：这次只搞了两个总会，不过瘾。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透露一个重要信息，中国正在从韩国经济遭受灭顶之灾上得出结论，大集团与金融及政界一体，互相牵连太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说：高层人士也充分意识到，政府向企业直接投资，或以审批项目方式迫使银行贷款，是形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一位更重要的人士透露，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中央高层开始全面解剖经济引导原则，包括近几年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比如，韩国大公司曾被作为大型国企发展的最好模式，并且认为政府直接重组大型集团是一条捷径；为实现这些意图，国有银行应该重点扶持国有大集团，把一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大型国企优先上市，进行直接融资，等等。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仿效“韩国模式”。韩国企业的典型特征是，生产型企业集团与金融界融为一体，形成“财团”；韩国政府为扶持大“财团”，又与其结为紧密联系，进而形成“财阀”。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高度负债的大财团接二连三倒闭，排列前 20 位的企业一共破产 7 家，并迅速累及金融界和政府，导致整体经济危机。

有些迹象已经表现出来，仅在几个月前，中国的各级政府还率领各种代表团前往韩国学习，探索在中国如何建立财团，现在已经戛然而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在媒介上纷纷发表言论，一致的观点是“韩国的财阀制度不可缺”。

中国之所以对韩国感兴趣，是因为两国在经济结构与运行方式上有诸多相似之处。韩国遭受的灾难警示中国不能这样下去，要避免重蹈韩国覆辙，企业与金融与政府的三位一体就必须分解，但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小心翼翼地剥离。

很显然，革除政府机构的诸多弊端与吸取韩国危机的教训，现在不可做，又不必速成。

尽管新总理朱镕基的一贯行为表明，他不回避问题的矛盾，并且敢于

处理重大问题。但这一次背水一战地改革政府，并且力求一气呵成，绝不能仅仅归结为他个人风格的体现；他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领导人，他习惯于知难而进，但他知道一夜之间不可能创造奇迹。那么，朱镕基为何急于大刀阔斧推进国企和机构改革，为何口出慷慨悲壮之辞，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既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威胁，又承受着国内各种经济矛盾的蕴蓄。国内外两种巨大压力正在汇合而一，对新总理朱镕基构成严峻挑战。

二、临危而出

中国的运气很好。亚洲四小龙的金融危机并未重伤中国这条大龙，中国成为这场风暴的一个安全岛。但朱镕基指出：“我们对金融危机必须有足够认识，现在对中国的防范能力估计过高，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没有充分估计。”当记者问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金融风暴的能量是否已完全释放？他巧妙地回答：“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其实，亚洲金融风暴的滞后效应在中国已经显现，外贸出口明显下降，国际资本流入锐减。

出口下降加剧国内生产企业的外部困境，它们正经受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打击，因此要求“人民币贬值”呼吁一浪高过一浪，但均被国务院顽强地顶了回来。

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所承担起的责任，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中国挺身而出支撑危局，对深陷经济危机的亚洲国家恢复信心起着重要作用、一旦人民币贬值会再度引起亚洲其他的货币贬值，使它们在经济萧条中更难以自拔。正因如此，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提前访华，这是自1989年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美国媒介报道，美国政府认为“在保持亚洲政治经济稳定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但是，国内企业的困境着实令人担忧，所以朱镕基决定对国企实施大手术，并承诺3年内救活它们。可很多国企对此信心不足，并且没有做好推向市场的准备，因此新总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强势推动，同时还需要给企业创造一个自我摆脱困境的宽松环境，制止行业经济部门盲目干预企业。

银行的坏帐也是炸药包之一。前不久，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刘鸿儒去日本专门研究如何消除坏帐，日本银行家告知：“先制止不良贷款天天发生，再将现存坏账由银行慢慢消化。”刘鸿儒颇有同感，这位中国人民银行前任副行长，曾对政府部门乱批项目并强迫银行贷款倍感无奈，他曾恳求国家计委有关领导给银行一些选择的权力。刘鸿儒讲起这段往事时说：“我希望他们在审批项目时别一个萝卜一个坑，能否多挖几个坑，让银行选一个放萝卜，但他们说做不到。”刘鸿儒认为，用国有银行贷款用于发工资，根本就没有打算还。刘鸿儒说：“这样下去，坏账天天发生，旧账未了又添新账，银行非破产不可，金融危机迟早爆发。只有尽快拿掉政府部门的投资审批权。让银行真正有自主权，直接与企业打交道。银行哪个人乱放贷款，就让他去坐牢。”更为彻底的金融改革正在启动。新总理朱镕基宣布，银行与政府将加大分离度，政府部门不得再逼迫银行向亏损企业贷款。然而，下岗工人由此又将增多，社会潜在的震荡在蕴蓄。

大量吸引外资是支撑中国持续繁荣的重要因素。在以往的外国对华投资中，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占很大比例，如今其自身难保，对华投资势头大减。不过；中国有可能成为欧美资本看好的避风港，因为资本必须在流动中

增值，而资本正蹲在中国门口观望，中国试图抓住这个机遇，并已经积极行动起来，最近，美国壳牌公司与3家中国公司合资兴办炼油厂的项目获得批准，这个投资额达50亿美元的项目是迄今为止外国在中国最大的投资项目，它曾经被锁在有关部门的抽屉里达几个月之久，现在又奇迹般重见天日。

不过，在欧盟委员会的支持下，香港菲西亚公司对欧洲在华投资的4000家企业进行调查，目的是了解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未来市场的投资环境。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企业抱怨，中国的经济主管部门不仅难打交道且颇多麻烦。德国企业说：“在合资企业作出任何一个决定时，中方的合作伙伴都要征求不懂业务的主管部门批准，许多事情遭到拖延而难以进展。”还有，60%的企业认为，政府部门营私舞弊现象普遍，它们在中国开展业务受到诸多干扰。总之，经济部门的干预与腐败成为投资环境的不良因素之一，这些公司暂时放弃了增资计划。

拯救国有企业，遏制银行坏账，吸引欧美资本，均把政府机构改革推到一个紧迫位置。

而亚洲金融风暴又使国内各种经济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是一颗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朱镕基必须以大刀阔斧的改革来防止国内经济危机爆发，但疾风暴雨式改革必使失业大军扩大，为缓解就业压力就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确定为8%，略低于去年8.8%的增长速度，这虽是1992年以来最低的，但比其他亚洲国家要高许多。

目前，8%的增长率成为一项至高无上的任务，因为这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最低目标。

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意味着大中型国企更加不景气，伴随而至的是下岗职工增多。据保守估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每降低一个百分点，中国领取救济金的人数就要增加，又对中国社会稳定构成严峻考验。但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从今年头两个月的经济指数看，今年可能达不到8%的增长目标。

原因很简单，在1997年8.8%的增长指数中，有3个百分点是靠外贸出口支撑的，如今受亚洲国家货币贬值影响，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三大支撑：出口、消费和投资。出口和消费今年内很难有出色的表现，那么只有加大投资给经济增长以“强大的刺激”，但国家财政连年赤字，庞大的政府机构已把有限的资金吃光了，无法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剩下的办法是松动银根，采取较具扩张性的金融政策，但中国历来一松动银根，各级政府就乱上项目，大搞重复建设，制造一堆没有效益的项目，致使银行坏账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因此，转了一圈又回到机构改革的紧迫性上，必须压缩财政开支，挤出一部分资金扩大内需，同时让银行摆脱各个部门控制，使投资产生有效需求。

从操作层面看，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成功地操作经济“软着陆”，是巧妙地交替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两种手法，而“宏观调控”又带有较为明显地行政命令痕迹，这只有形的手遏制了盲目的投资需求，而“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又逼迫企业提供有效的需求。如果要大刀阔斧调整经济，势必强化“宏观调控”，这就更需要一个高效精干的经济管理体系。

临危受命，朱镕基是总理的合适人选，但总理不是好当的。中国经济目前必须迅速攻克几个顽症，新总理的困难不仅仅是这些沉疴已久的顽症，

而是要在一个困难时期对这些顽症实施手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减缓，因此改革实际上是在逆境中进行，而中国正在承受失业问题的阵痛，推行急剧改革势必加剧阵痛，朱镕基很清楚，他被国外难题所包围，三大改革在操作上一旦失手，哪怕是不大的失误，都有可能出现社会震荡，原本应该更小心地谨慎行动，但亚洲经济危机对中国构成的严重压力，已没有时间让新总理有条不紊地处理国内经济矛盾，他只能以最快速度完成一系列改革动作，防止正在冲击亚洲各国的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

一位观察家认为，朱镕基现在处境是“人气很旺，余地不大”。

朱镕基不仅是三大改革方案的直接设计者，而且把自己置于第一线总指挥的角色，他没有给自己留有余地。朱镕基一贯风格是以硬碰硬，中国也需要这样一个新政府：愿意承担一切风险，哪怕以个人的“粉身碎骨”为代价，也要推动中国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

三、挖萝卜

3 钩率一群人大代表已经五次建议改进我国水泥包装质量。去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他率领 35 人。国家建材局有关负责人在长长的答复中，有一句道出实情：生产企业觉得改进包装会提高成本。正因如此，尽管经过 3 个小时的质询，但“张玺钩”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答复。

他终于明白，自己挑战的不只是生产厂家，也不只是建材局，而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拍案而起道：“非改掉你们这些行业主管部门不可，你们保护的是落后。”这次机构改革中最惹人注目的是，9 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此举意味着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开始瓦解。人大代表普遍认为，拆的不仅是 9 座小庙，而是一座大庙的 9 根支柱。

痛快是痛快，但改革阻力可想而知。1997 年 12 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一番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起来都很困难。

3 代表建议“酒类实行专营”。于是另有代表评价：“此时提专营，纯粹帮倒忙。”道理很简单。国家烟草专卖局官员曾私下对记者说：“新闻界现在猛攻‘吸烟有害’，这非常好。你们攻得越猛，烟草越有必要专卖，我们的位子就越稳。”中国经济目前存在不少问题，市场经济运行体系并未完全形成，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没有那么有力，还离不开那只有形的大手——官员操作。这些都会成为各部委存在的理由，讨价还价的筹码。

权与利是一对孪生兄弟，削权等于减利。据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焜介绍：有权就能生钱，1995 年全国预算外资金收入高达 3800 亿元，这些钱多是各部门乱收费弄来的，本应通过税收收入国库，结果滞留在部门的小金库里，变成“第二财政”。然后，滥发实物，增加奖金，提高福利，小金库的钱源源不断变成个人实惠。正因如此，机构改革剥夺的是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

受到既得利益冲击的不仅是撤并的机构，它们并非势力单保在零点调查公司对 1012 名企业家的调查中发现，仍有 25% 的人希望保留产业主管，它们全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此情绪反映出一定比例的企业家对市场压力的恐惧感，依然留恋原来享受的资源分配特权，渴望行业主管部门继续撑住保护伞尽管他们同样抱怨婆婆管得宽，但婆婆也有温暖体贴的一面。

国家计委附近的“烧鹅仔美食城”，被一位局级干部描绘成“伤感之地”。他说：“我们的好时光过去了，它也好景难长。”说此话时，“烧鹅仔”依然火爆，包间全部客满，大堂座无虚席，门外塞满外地牌照的豪华轿车，毫无衰败之气。

国家计委那位司局级干部这样感慨：“早年间，中国经济部门中最掌实权的是计委和经委。1988年到1998的10年，我经历了这两个部门的一个完整轮回。1988年国家经委撤销，经委人员各奔东西，一部分并入我们计委，他们当时真有一种失落感。1992年，国务院成立生产办公室，一批老经委人纷纷归队，生产办后改为经贸办，1993年经贸办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迅速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到1998年，整整10年过去，专业经济部门大批并入经贸委，计委反倒成了缩编部门。这几年，外人对我们计委已经有一个评价：计划计划，墙上挂挂。如今改成发展计划委员会，干的更是墙上挂着的东西，这回轮到我們失落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企业一直是政府部门的行政附属物，经济运行的主体是无所不管的行政部门，国有企业只是大大小小的生产车间，国营企业实际是“官营企业”。在这种经济运行体系中，国家计委便是大脑中枢。企业的生产计划原料供给。产品调拨，乃至人员编制和利润分配，全由计委一根指挥棒调遣，权倾一时。

正因如此，有人这样比喻：“全中国只是一家大工厂只有一个厂长就是计委。”这次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要职能从直接制定生产和分配计划，转为从事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宏观规划。地位仍重，架子照大，但职能虚了，权力轻了。

据说，在这次机构改革方案的设计时，有人还提出韩国模式，韩国的经济主管部门是经济企划院，有些类似我国计委的形态。前不久，韩国的经济企划院与财政部合并，成立财政经济院，为确保国民经济发展与财政预算相协调。如果中国的国家计委也向这个方向发展，仍是一个颇具实权的部门。

公平地说：经委当年的撤销是一种历史必然，计委今天的削弱也是一种历史必然。经委过去主要管微观调度，当企业自主权逐步扩大，它的职能必然淡化，计委的鼎盛时期恰是计划经济的顶峰阶段，现在搞市场经济，计委当然也要弱化。

尽管经贸委的一些老人还脱胎于国家经委，但经贸委早已人是而物非。日本《东京新闻》记者迫田胜敏分析：从中国经贸委目前的框架看来，非常类似日本的通产省，是一个产业的管理机构。实际上，国内观察家早就注意到这种迹象：1992年，国务院经贸办就曾派大批官员去日本通产省考察，这就是一个铺垫。且不论经贸委能否变成通产省，7部委并入经贸委改成国家局，理顺关系颇为棘手。诸如行文程序，过去各部均有自己带国徽的大章，盖了就管用；如今各国家局自有略小一点的国徽章？前者等于把原来的各部独立行文改为内部行文，处长审批后报国家局再报经贸委，一个章便可号今天下。后者等于是个“桔柑体制”，外面包一张“经贸委”的椿皮，里面各瓣独立。新老机构的并轨运行复杂而繁琐，一环疏漏就会形成权力真空，旧庙拆了又找不到新庙门。下面来人可就转了问。

如果按照通产省的框架来套经贸委，那么经贸委将成为一个经济总协调部门，原有所有经济部门将被统领在一起，这意味着现在归经贸委管辖的国家局也将是过渡的产物，它们最终的归宿可能是行业协会，变成略带政府

色彩的社会中介组织。

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通产省全称“通商产业省”，内外贸全归其管辖，并且管得非常细致。另外，机构设置也带有产业划分的痕迹，比我国过去产业主管部门的“条条”还要细。

而且，日本通产省与大企业大财团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打电话到经贸委几个处室，询问他们对经贸委未来框架与职能如何构想。答案几乎一模一样：日本通产省但经贸委也有人对此并不乐观，一个40岁左右的处级干部审慎地说：“日本通产省是一个相对现代化的行政机构，那么它设1万编制，并使每个人加班加点工作才能胜任，说明市场经济的管理是相当庞杂而细致的，它需要设1万个坑按上1万个萝卜。

我个人认为，通产省是大市场与大政府的构架。”据记者了解，即将并入经贸委的部门，目前总人数在2500人以内，如果精简一半之后只剩1200人左右。经贸委即使全盘接受，再加上现有六七百人，也就是不到2000人的编制，这只是日本通产省1/5的人数。相对日本通产省来说，可谓“小政府”。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开会期间，是地方官“跑部”的佳期，因为各部要员一般此时不离京，人头齐整。3月初，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陆续到京，距开会还有两三天，那些身为代表的父母官岂肯错过天时。

轻工总会成立了一个机构办公室，工作是找局长处长逐个谈话，核心内容是各局各处应保留什么职能，结果没有一个局或处说自己应削弱职能。其实，这种谈话没有什么价值，国家经贸委大职能尚未明确，即将归其下辖的轻工局又何以确立职能，底下的部门更无从谈起，当然要维护现有职能和既得利益。

此次机构改革是国务院的自我革命，因此必须自上而下才能完成这场革命。而且上下必须步调一致，上改下不改，改了也白改，下动上不动，动了也白动。

机构改革的最重要目标是政企分开。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说：“今后三年内，将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明确地划清界限。那么，政府部门现在还管什么？”记者去请教国企老总们，他们回答：政府部门现在已经不干预了，但企业又没有完全松绑的感觉，政府干预原来是一只有形大手，眼下也变成一只无形的手，说不清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向企业伸出来。深圳市一家大型国企的董事长说：“企业不得不寻找一些变通办法，自己创造宽松环境，比如，现在大型企业实行条块管理，在块块上归当地部门管，在条条上又有行业主管部门，行业部门不同意的事儿就找地方部门批，地方上不同意就找行业主管部门批，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另外，一些企业已建立与国务院直接联络的通道，当主管部门设卡时就去国务院拿通行证，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政府机构确实存在职能错位，政府管生产，企业办社会，不该管的乱插手，该管的没管好，用一句俗语比喻：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企业不想管的，政府都该管；企业想管的，政府都甭管。

世界银行最近推出《变革世界中的政府》的报告指出，有效的政府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以促进身份起催化剂作用。

职能转变有一个新旧部门权力交接问题。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事实：云南开远糖厂1983年申报一个技改项目，结果成了盖着588个公章的胡子工程。这个项目历经若干次机构改革，原有的各主管部门盖了一轮公章即将审

批，不料机构改革调整了各部门的职能，新主管部门不认原主管部门的账，只好又盖一轮公章；眼看大功告成，各机构职能再次调整，还得重新盖一轮盖章。

更需小心的是，政府权力的丧失与新权力的扭曲。中国原有计划管理体制正在衰退，它将一部分权力交给市场，一部分权力交给政府的新型宏观调控部门，这本来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新的管理部门有个消化过程，社会也有一个接受过程。可惜，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车到山前，政府必须迅速调整职能。重庆市一位官员私下担忧地说：“现在地方一大部分精力用于安抚下岗职工，大幅度精简人员会显得人手不够，而职能全移交给社会保障部门，他们管得了吗？一旦出现权力真空，便会出现失控局面。”

四、怎么办？

那位国家计委的司局级干部，早在春节前，已获悉机构撤销后，决定放弃仕途，调到北京市一家投资中心。他精明地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被安排到另一部门，至少需要2年才能全面理顺关系；如果去上学再另起炉灶，等于把过去2年打下的基础付之东流，而重新回到起跑线上，年龄又不占优势；最现实的选择是找一个半官半商的事业单位，凭借熟悉政策和官场套路，迅速脱颖而出。既然抱负难展，但求个人实惠。

在人大通过机构改革方案那天，上海市长徐匡迪对新闻界轻松他说：“下海多挣钱，呆在机关里干嘛？”国家体改委的张其光处长认为，时代不同了，目前绝非下海良机，整个国家都找不到投资热点，个人去哪儿寻找暴利行业？经济形势已大大不同于1993年，人人发财的机会很难寻觅。

原纺织部的一位处长范平（曾用名），1993年机构改革时下海，他的经历是当年官员下海的一条典型轨迹。范平回忆，1993年适逢第三次经商潮席卷而来，个个鼓舞人心的传闻铺天盖地，尽是一夜暴富的成功范例，由此形成一种挡不住的巨大的诱惑。也正因此，第三次经商潮的典例特征是官员下海。当时，纺织总会的分流计划主要是部属公司，范平的第一步是迈进“公海”。这些公司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背景；做的是官家生意，管理层依然保留行政级别。范平认为自己第一步是迈得恰如其分，很快便适应官员经商的运作方式。在“公海”里涮了几年，范平觉得初习水性便自创公司，可能经营得一塌糊涂，他这才发现官员思路与商人思路有本质的区别，遂又回到一家国有公司任副总经理。在他之前，一大批下海官员早已纷纷上岸。范平的体会是：“下海前一定做好两种准备，一是积累社会资源，下海后非常有用，人头熟好办事；另一是不要以为在海里涮几下就能成为经营人才，从官员到商人有段很长过程。

除非你是天生的商人，误上官船。”据记者了解，许多部委都有自己办的公司，都是上次机构改革为人员分流而设立的。起初，它们靠各部委的一些特殊政策红火过一阵，如今多不景气，没几个效益好的，所以此次安排精简人员能力有限，更何况十几个部委都被撤销，靠山都没了，今后的日子更艰难。

在人大通过机构改革方案那天，上海市长徐匡迪对新闻界轻松地说：“下海多挣钱，呆在机关里干嘛？”国家体改委的张其光处长认为，时代不同了，目前绝非下海良机，整个国家都找不到投资热点，个人去哪儿寻找暴

利行业？经济形势已大大不同于 1993 年，人人发财的机会很难寻觅。

轻工部最后一任部长曾宪林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人，他在任期间建起 40 余个行业协会。当改为总会时，按国务院方案只需精简 100 多人，所以人员分流未遇太大的障碍，一些司局级干部挺乐意去某个协会当理事长，级别不变，收入增长，在退休年限上也较为宽松。

这些行业协会如今还挺好过，弄一个产品或技术展览会就够吃一两年的，搞一次国际展览还可国外兜兜风。

轻工总会这次精简并不轻松，如果减员 50%，那么总会至少有 150 人要转岗。尽管轻工总会人员的年龄结构偏老，在 3 年内将有 100 人左右离退休，但所剩“富余人员”仍难安排。各种协会目前大多自称“维持生计”，而且从企业借调人员成本更低，因此是否成为精简人员的载体是个疑问。

机构改革中最敏感的是人员分流，因为涉及每个人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发展。国家体改委的张其光处长分析：干部下岗比工人下岗更难安排，工人有个活干就行，干部是支使别人干活的，总不能让干部从工人干起，去当打工仔吧！

一位部长秘书告知，他的“一号首长”最近表面上很平静，不知心里是否闹腾。部长告诉他，活动也没用，这是天命，一静应万变最好。部长要动，秘书也有点心慌，但部长承诺要把部里的同志安顿好，也算有个交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秘书认为，部级这一层不会成为机构改革的阻力，在讨论部门是撤是留时，他们会据理力争。

一旦成为定局，他们也就偃旗息鼓。秘书说：“部长们的退路不用愁，车子照坐，房子照住，子女基本安排妥当，有病去高干病房，到人大或政协谋个位置议国是，关键在于自己调整心态。”秘书还透露：“部长现在谢绝采访，觉得说深说浅都不合适，只暂时答应中央电视台一家，还要看情况。”部长说：“到电视上露最后一面，也算跟全国人民道个别。”秘书不打算跟部长一起退二线，他认为自己是年轻的处级干部，到哪都是“工头儿”，领着人干活，不愁谋不到一份好差事。他分析：“部里的年轻人根本不用急，有位置则干，没位置再去上学。这时候，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怎么调整自己都有时间。难就难在那些 50 岁去当巡视员，又面临知识的全面更新：换个部门哪有那么多空位子，至少降半格使用；如果提前退养，不仅面子不好看，一切原有的待遇也全没了。”据记者了解，国务院序列目前有公务员 3.3 万人，按照精简一半的指标需分流 1.7 万人，其中有 2000 人即将到年龄而自动离退休，仍有 1.5 万人需要安排。

在各部委中大约有 300 名正副部长，他们的安排不应成为问题。一些正部级干部已走进全国人大和政协。另一种安排办法是金融、财税、工商、司法等需要加强的系统，尽管有的国有银行的行长才是副部级，但现在副行长的职位也可派副部级干部任职，这叫“高配”。

还有一批拥有专业知识的部级干部将充任大企业巡视员，拟选拔 100 名巡视员，目前只有 42 级巡视员下设一个办公室配若干人员。有一种说法，他们当中有一大批人将去充当大企业的总会计师，以制约企业普遍造假账的恶劣现象。国有银行总行的职位可以“高配”，分行一级也以此类推。这样一来，司局级干部的分流已基本妥当。

人员分流的步骤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方案一宣布即刻离岗，避免拖延生事。第一个载体是接受培训，有消息说国家行政学院的教室已经腾出，准

备安排第一批司局级干部，培训时间分为半年。一年或两年。然后，再将接受培训的干部陆续调往企业。

在此次机构改革方案中关于精简人员的安排问题，没有鼓励官员下海的迹象。首先是“带职分流”，精简的公务员原有级别和待遇不变，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心理安慰；再是“定向培训”拿着工资去上学，去学财务审计及工商管理等专业知知识，这是一个缓冲阶段；然后是“加强企业”，经过培训的干部肩负着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使命，终有一个最后归宿。

新总理朱镕基有两句话：一句是“今年内必须离岗”，另一句是“三年内负责到底”。

从分流的总体思路看，特别提出“加强企业”，绝无“加强基层”，显然国家机关干部的分流不是层层往下压，而是一步到位于企业。如此设计是为满足一对供需矛盾：目前企业人才匮乏，干部素质普遍不广，而国务院机关集中大批优秀人才，仅博士硕士学位，就占总人数的 10%，机关又人浮于事，一个人干两个人看，大量时间消耗在扯皮上。

在人代会上，来自黑龙江的代表张举大声呼吁：“各部委精简人员不要层层往下压，给下面造成新矛盾。”然而，来自温州的代表钱兴中也四处宣传：“温州的私营企业非常欢迎分流干部加盟，它们认为配合民营企业的行动，已制订灵活政策。可以给分流干部安两个家，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温州。”把国家机关干部大批派往企业不是没有阻力，深圳一位国企老总打电话给北京的朋友，询问是否要往企业派“监事”。北京朋友告诉他，现在是广揽人才的好机会。那位老总却说，最好派没本事的人来作监事，理由是派几个既精明又懂行的只会指手划脚，大企业养几个京官不算什么，待遇也可高一点，关键在于别碍事。

还有一个虽小犹大的具体问题，官员分流是否携带家眷，带财安土重迁，否则两地分居，更为严峻的考验是，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也将在 3 年内完成，人员精简也势在必行。目前，全国各级政府有 530 万左右公务员，如果简一半就是 200 多万呀！

第二章 重提商鞅

上篇

一、法家巨子商鞅

(约公元前 408 —前 338)，战国中期法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和思想家。

商鞅于公元前 361 年从魏国西行入秦，很快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先后施行两次变法，在政治、经济以及家庭和社会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改革，力主“耕战”、“富国强兵”，使秦国迅速崛起，在实力上超过了其他各国，为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汉代的王充说：“商鞅相孝公，

为秦开帝业。”这是对商鞅变法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

当时，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其间经历了长达 550 年的大动荡，大变革，此即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商鞅生于战国中期，正逢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局面已形成，残酷的兼并战争迫使各诸侯国先后变法图强。唯其商鞅“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变法原则一经确立，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即大大地超过了其他各国，后来，商鞅遭诬陷和报复被车裂而死，但其改革的成果仍被孝公以后的几世君王所继承，乃至秦始皇终于完成了兼并六国，统一海内的“帝业”。

商鞅本人尚且善于用兵，曾几次率军亲征，克敌制胜。现传《商君书》中可见三篇专讲军事的论文。《汉书·艺文志》在“兵权谋”中也著录“《公孙鞅》二十六篇”，已亡佚。

后世学者认为，商鞅最大的贡献在于确立了君主集权制。郡县制。官僚爵位制。“什伍”编户。刑律。土地私有和一夫一妻式小农经济形式。由于这些成果在秦灭亡以后仍被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所继承发展，故而可以说商鞅变法不仅“为秦开帝业”，而且更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从秦孝公到始皇帝，秦国六世君主所创建经营的“帝业”只传了二世就迅速灭亡了。汉代历史学家在总结这一教训时认为，这是由于秦统治者没有像汤、武那样“逆取而以顺守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其实，这一观点源于《商君书·开塞》篇：“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力，持之以义。”如果说“持之以义”是“长治久安”之道，那么商鞅早已在自己的著作中为秦统一天下以后的“长治久安”埋下了种子。但是，这颗种子被深埋在商鞅学说关于“力”与“德”、“法”与“义”尖锐对立的大量论述中，大秦帝国还没有发现它就如山坍塌了。

实际上，秦王朝的灭亡只是君主集权制和土地私有制在其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秦以后的历代王朝也终究不能逃脱这一命运，而秦不过是迅速经历了治乱兴衰的一个轮回而已。秦桀短促的直接责任固然不在商鞅，但他专制。狭隘的功利主义文化政策，对传统文明特别是伦理道德的忽视，却正是强秦速亡的一个最大导至于商鞅的车裂而死与千秋功过，历代以来一直为世人所垢玻到了近代，对商鞅的评价才始有转机。章炳麟在其作《九书：商鞅》篇中，除批评商鞅“毁孝梯。败天性”。一进身与交游，诚多可议者”之外，其余都对商鞅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为“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大抱不平。梁启超曾主编《中国六大政治家》，其中第二编《商君评传》的作者麦孟华也对商鞅作了极高的评价，称赞商鞅“固法学之银子，而政治家之雄也”。对商鞅功过以及商鞅之死的不同评说，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进化与变迁。如果商鞅地下有灵，听到两千多年后近人的评说，或许终于可以瞑目了。

二、为秦开帝业

、元前 362 年，正当公叔痤大败韩。赵联军回师魏都安邑之际，秦军乘机进攻魏国西部的重镇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县西南）公叔痤仓促率兵迎战。被秦军所俘。大概时隔不久，公叔痤被秦放归。

因受败军之辱，遂一病不起。在考虑由谁继承相位。辅佐魏惠王时，他看中了身边的家臣御庶子商鞅。

有一天，魏惠王到相府看望公叔痤的病情。寒暄过后，惠王问：“如果你的病不能治好，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痤将自己的慎重考虑禀告惠王：“我的家臣御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但有奇才，堪当相国重任，希望您举国而听之。”惠王闻此话后默而不语，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他心里简直不明白：一个年少位卑的家臣，怎么能承担起相国的重任呢？公叔痤夙知商鞅胸怀韬略，志向高远，不是甘居人下之辈、日后必大有作为。他见魏惠王对自己的举荐不以为然，心中不免浮起一团为魏国的命运担忧的乌云。

魏惠王正要告辞，公叔痤急忙从病榻上起身，示意左右侍从退下，然后在惠王的耳边低声说：“如果您不任用公孙鞅，此人日后恐为魏国大患。请您一定杀掉他，不能让他出我魏国之境。”惠王被这位老臣的忠诚所感动，于是点头允诺而去。但惠王对商鞅本不看重，心中还是觉得公叔痤所说是言过其实。离开了相府，惠王对两旁的侍臣说：“公叔痤病糊涂了吧，可悲啊！他让我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一个家臣公孙鞅，这不是悖谬吗！”公叔痤因举荐商鞅而没有得到魏惠王的认可，怏怏不乐；但想到魏惠王允诺了如果不用商鞅必杀之，仿佛又去掉了一块心病。可是，当他眼前浮现出风华正茂的商鞅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场面时，一种惜才的恻隐心不禁油然而生。他不忍这位身具将相之才的家臣。

就此断送了前程和生命，于是急忙召见商鞅，面带歉意地说：“刚才国君问我谁可以继承相位，我推荐了你，看国君的神色没有任用你的意思。我是以国君的利益为先，以私人的交情为后，所以告诉国君，如果不用你，就把你杀掉，他答应了我。现在你可以赶快离开这里，否则被抓住，性命难保。”商鞅听此话心中怦然而动，但他仍像往常一样在这位相爷面前表现得机智、果敢、镇定。他对公叔痤说：“国君既然不能听信您的话而任用我，又怎么信您的话而杀我呢？”公叔痤觉得此话有理，而且又一次感受到商鞅的工于心计。

不久，公叔痤死。当时商鞅并不在相府内，很可能是为慎重起见而躲避在外，这期间，年方 21 岁的秦孝公即位，励精图治，在国中颁布了“求贤令”。商鞅听到公叔痤死且葬事已毕的消息后，觉魏国已无可留恋，于是应秦孝公“求贤令”之召，怀着要在秦国一展宏图的雄心壮志，收拾行囊，携带着李俚的《法经》等著作，西奔入秦。

公元前 361 年，商鞅穿过魏国在洛水沿岸修筑的长城，来到了秦国毗邻前线的新都栋阳。这里正处在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的前夕，新君的即位，战争的动员，列队森严的士兵，市场上的谷物和铁制兵器、农具，招摇过市的旧贵族，新富起来的商人。地主，穷苦的农民，应“求贤令”而来的士人。保守派和改革家……这些使栋阳城处在紧张、喧闹、躁动不安的气氛之中。

商鞅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为了尽快接近权力的中心，他不顾士人们经常计较的名声的洁污，委身投靠在秦孝公的一个宠臣景监的门下。景监者，姓景的太监也。这到秦以后所走的第一步，就经常引起人们的非议：秦国隐士赵良批评商鞅“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司马迁也批评商鞅“因由嬖臣”。

通过景监这条捷径，商鞅很快得到了觐见秦孝公的机会，第一次觐见，商鞅侃侃而谈，喋喋不休，秦孝公几乎无法打断商鞅的话。

但是，秦孝公在商鞅讲完。起身告退后，孝公把景监叫到面前，恼怒地说：“你介绍来的这位宾客是虚妄之徒啊！我怎么能用这样的人呢。景监

唯唯而退。回到家中，他把商鞅责备一番，问：“你向国君说了些什么不中用的话呢？”商鞅说：“我是向他讲帝道，看来他对此理解不了啊！”所谓“帝道”，也就是孔子曾讲过的，“君道无为”。

“恭己正南面而已”。“垂衣裳而天下治”那套道理。

五天过后，商鞅第二次觐见。这一次，商鞅还是滔滔不绝，谈得更多。更起劲。然而，商鞅所说仍不合孝公之意，孝公又一次责备景监，而景监也再次责备商鞅，“还是不中用！”

你这次又说了些什么呢？”景监问。商鞅说：“我是向他讲王道、可他还是听不进去。讲你想办法让他再次召见我。”所谓“王道”，也就是孔子大力提倡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仁主服天下那套道第三次觐见，商鞅所说不比往先，但在关键的地方却又有些含蓄，引而不发。秦孝公渐渐听出些味道，时时点头称善。等商鞅把一席话讲完，孝公虽然没有立即表示采纳，但面带笑容，彬彬有礼地送客。景监凑过来摸底细，孝公说：“你介绍来的这位宾客还是不错的嘛！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谈了。”景监回到家中，向商鞅转达了此意。

这时，商鞅已胸有成竹，他说：“我刚才向国君讲霸道，他有了采纳的意思。要再召见我，我已经知道怎么接着往下说了。”所谓“霸道”，也就是强化君主集权，使用刑罚，奖励耕战，以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天下的那套道理。实际上，这也就是商鞅从小所喜欢的“刑名之学”。

商鞅经过三试秦孝公，对孝公的心意已经一清二楚，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可以依靠，可以使自己一展宏图的君主。当孝公再次召见商鞅，商鞅就直言不讳，把“诸侯力攻，争相并”的天下形势和平生所学。所思一一道出，并且向孝公提出二条“强国之术”。孝公聚精会神地听，连连赞许，不知不觉地竟然将膝盖渐渐往前挪，离商鞅越来越近。主客二人相遇知己，话说得投机，而且越说越深、越说越细，以致数日不厌，乐此不疲。

景监对孝公和商鞅的契合大喜过望，当再次见到商鞅时，连忙问：“你怎样说中了国君的心意？我们国君真是太高兴了！”商鞅说：“我向国君讲帝王之道，劝他和夏、商、周三代相比。而国君说：‘这太久远了，我可等不到恢复三代之治那一天。有才能的君主各个都是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名扬天下，怎么能悒悒不乐地等数十、数百年才成就帝王之业呢？，既然国君是这样的想法，我也就不讲帝王之道，而改讲强国之术了。国君对此是非常喜欢呀！可是，这样一来也就难以和殷。周时期的德治教化相比了、”商鞅取得了秦孝公的信任，开始绘制改革的蓝图，拟订变法的细则，并且不断地与秦孝公切磋，以便达成君臣的共识。公元前359年。也就是秦孝公即位后的第三年，商鞅认为变法的时机已成熟。秦孝公虽然也决计变法，但他知道朝野有不少的变法反对派，当变法要付诸实施的时候，反对派的呼声也愈益高涨。为了在群臣中申述变法的理由，显示其变法的慎重，他召开御前会议，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于是，一场改革与守旧的辩论便在栋阳城的秦宫内展开。”秦孝公首先申明君臣大义，并且表明自己的变法主张以及遭人议论的犹豫态度。他说：“身居君位而不忘社稷这是君之道。建立法度而使国君光明，这是臣之行。现在，我要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革礼制来教导百姓，可是又怕受到天下人的非议”。

商鞅力争主动，抢先一步禀奏：“臣闻之，行动迟疑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请国君不要顾忌天下人的议论，而急定变法之决心。况且、

有卓越行为的人，肯定会受到世人非议；有独到思想的人，必然会受到民众嘲笑。常言说：‘愚者在事成之后还不明白，智者在事情萌生之先就已有预见。’民众是不可以参与考虑事业的开端的，而只能够在事业成功之后分享一些快乐。郭偃的法书说：‘讲论崇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于世俗，建立伟大功勋的人不谋事于民众。’法度是用来爱护人民的，礼制是用来利于国家的。所以圣人只要有益于人民，就不拘守旧的法度，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沿循旧的礼制。”秦孝公听后称“善”。

保守派的代表甘龙早已按捺不住，等秦孝公的话音刚落，便说：“臣以为不然。我听说过，圣人不改易人民的礼俗来施行教化，智者不变更以往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随顺人民的礼俗而施行教化，可以不劳而成功；依照以往的法度而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百姓也能相安。现在如果变更法度，不遵守秦国的旧制，改变礼俗来教化百姓，我恐怕天下人会指责我。非议看上。愿君上慎思明察。”商鞅立即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甘龙所说都是世俗之言。平庸者总是安于习惯。学究们总拘泥于见闻，这两种人可以居官而守法，却不可以参与讨论常法之外的事情。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的法度各异，也都做了霸主。所以说，智者创立法度，而愚者受其制约；贤者变更礼制，而不肖者受其拘束，我们不能和那些受礼制拘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那些受法度制约的人计议变法。请君上变法而无疑。”这几句话用三代和五霸的历史事实阐明了变法改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把反对变法的一大批朝臣置于庸人。学究、愚者、不肖之徒的行列。甘龙被激怒得面红耳赤。想奋起再争，可又一时语塞，没有找到合适之辞。这时，保守派的另一位代表杜挚进言：“臣闻之，没有百倍之利不可变法，没有十倍之功不可更换器具。我还听说，效法古人就不会有过错，依循礼制就不会有好邪。请君上慎重考虑。”商鞅据理力争：“前世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呢？帝王的治道不重复，我们又依循哪种礼制呢？以前，伏羲、神农只施而不杀人，黄帝、尧、舜只杀有罪的人而不株连妻子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时，各个都是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要依据时势而定，制度和命令要适合实际的需要。兵器、盔甲和各种器具都是为了便于使用。所以我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汤、周武不拘守古法而成就了王业，夏桀、殷纣没易礼制却灭亡了。可见，违反古法的人未必就是错的，而因循旧礼的人未必就是对的。请君上变法而无疑。”保守派和改革派在关系到秦国命运和各集团、各阶层利益的变法问题上，唇枪舌剑，往返辩驳。商鞅理直气壮，雄辩滔滔；保守派不甘示弱，但渐渐有些理屈词穷。

这场辩论的主角是商鞅，导演则是秦孝公。商鞅的道理和辩才博得秦孝公的连声称赞，也愈发坚定了这位君主实施变法的决心。

到了最后拍板的时候，秦孝公断然表态，决计变法，并且对保守派予以不留情面的指责。他说：“我听说过，居住在偏僻小巷中的人遇事总是少见多怪，而蔽于一曲之学的学者对什么事都要争辩不休。

愚者所喜欢的事，正是智者所悲哀的事；狂妄之徒所高兴的事。正是贤人所哀悼的事。

对于那些拘泥世俗观点的议论，寡人不能听从。我已决计变法，不再犹豫”。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辩论以改革派的胜利。保守派的失败而告终。于是，秦孝公下达第一道变法令。从此，秦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革命之精神

商鞅变法既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就必然激起一部分在变革中将失去原有优越地位的社会阶层的强烈反对。新旧势力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历史终将对新与旧、改革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做出公正的裁决。

史载：秦孝公在颁布第一次变法令后，“百姓苦之”；又载：在变法令施行一年后，“秦民”到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盐铁论·非鞅》篇亦云：“商鞅峭法长利，秦民不聊生，相与哭孝公”。这里说的“百姓”和数以千计的到处都哭诉或闹事的示威者，可能有的是出于对新法的暂时不理解，而相当一部分是权益受到损害的贵族子弟。“工商之民”和“游食者”。在这些人的背后，则有一批保守派的“官僚和宗室贵戚撑腰。

秦都栎阳城人潮涌动，反对改革的呼声甚嚣尘上。这时，年少的太子在保守派的师傅和一些宗室贵戚的唆使下触犯法令，公开站在了反对改革的一边。宫里宫外，密切配合；台前幕后，紧锣密鼓。改革遇到强大的阻力，新法受到挑战，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严峻的形势下，商鞅不惧阻力，不顾个人日后的安危，沉着。

果决地向秦孝公陈述自己的意见：“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新法这所以不能贯彻执行，是由于宗室贵戚首先犯法。如果要使新法必行，就须首先将太子治罪。）太子不可施刑，所以下令将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公子贾传来，代太子受刑，其中公子贾被施以面部刺字的黥刑。

第二天，秦孝公治太子罪。令其师傅代之受的消息传开，立即对改革的反对派起到强烈震慑作用，街头抗议的人群逐渐散去，“秦人皆趋令”。

除了将太子治罪外，史书上还有商鞅“日绳秦之贵公子”，一日临渭水将“七百余”人正法，“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的记载。从变法之初反对派的嚣张气焰和变法令中“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的条文看，宗室成员中太子犯法不可能是孤立的现象，其他“贵公子”肯定会暗中鼓动或自己以身试法，商鞅力主“刑无等级”，“刑重而必”。

《商君书·定法》篇说：“不能开一言以在法。”《赏刑》篇说：“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命。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在数千人聚集都城抗议新法的严峻形势下，商鞅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将“七百余”人屠杀于渭水之滨，这是当时可能发生的情况。

在严刑峻法的威慑下，抗议的浪潮被压制下去，新法得以继续贯彻执行，行之三年，新法初见成效，拥护的人逐渐增多，“百姓便之”。秦孝公“乃拜鞅为左庶长”。“左庶长”在秦国的二十级爵制中列为第十级，这在当时是有军政实权的一个官职。

改革给秦国的政治、经济带来了蓬勃生机，军事实力随之迅速增长，公元前355年，即实行变法的四年之后，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洛水之东（河西地区）的社平（今陕西省澄城县东）相会。这次秦魏两国首脑间的高级会晤，打破了长期以来“诸侯卑秦”。“夷狄遇之”。不与之“会盟”的局面。而且，这次会晤实质上是秦魏两国的领土谈判，秦孝公咄咄逼人地向魏惠王提出了归还河西地区的要求。谈判没有得出结果，在两国首脑相互拂袖而去的第二年，秦魏争夺河西地区的战端重开。

公元前 354 年，秦乘魏进围赵都邯郸之机，以商鞅为将，兴兵伐魏，东征河西地区之元里（在今陕西省澄城县境内，与秦孝公和魏惠王相会之地杜平相距不远）。秦军在商鞅率领下，个个争先，奋勇杀敌，大败魏军。斩得首级七千，并且乘势攻取黄河西岸的重镇少梁。

同年，秦派公子壮率师侵韩，插入韩魏两国的交界地区，进围焦城（今河南省鄆陵县北）、山氏（今河南省新郑县东北），在这三个地方筑城割据，兵锋所向，威逼魏国的新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据《史记·魏世家》和《商君列传》，迁都大梁在“惠王三十年”即公元前 329 年，此说实误。按《竹书纪年》，魏“徙都于大梁”是在惠王九年即公元前 361 年）。

公元前 352 年，秦孝公提升商鞅为“大良造。”此爵位在秦国二十级爵制中列第十六级，其职权相当于丞相（秦国正式设置丞相职在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 309 年，见《史记·秦本纪》）。史传“商鞅相孝公”当指从此年开始。同年，商鞅统率大军强渡黄河。兵围魏国的！日都安邑，迫使守军投降。当此时，魏国在东线因中孙臆“围魏救赵”之计在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大败于齐，在西线又屡败于秦，以前魏强秦弱的军事态势已发生重大转变，秦国在河西地区的争夺战中已占据了主动、优势地位。

“诚如《商君书·战法》篇所说：“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战争的胜利必本之于国内政治上的胜利）。秦国之所以在对魏、对韩战争中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实是由于国内实力的增长，政治的稳定，统治阶层中新兴力量的崛起，人民的“喜农而乐战”这些都是商鞅第一次变法所取得的成效。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当此时，秦民对新法“大悦”秦国境内“道不拾遗，出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在改革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原来一些激烈反对新法的人也一反故态，改换言辞。他们甚至再次聚集栎阳城，大唱变法的颂歌，对商鞅尽吹捧之能事。他们没有想到商鞅是一个铁面冷肠、“刻北“少恩”的政治家，也许是商鞅忌恨旧怨，也许是商鞅出于民只可从令而不可议令的考虑，他称这些人都是“乱化之民”、捣乱分子，下令将他们全部“迁之于边城”。

“其后，民莫敢议令。”中篇一、两千年垂拱而治商鞅第一次变法行之十年以后，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已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在对外战争中，秦军屡次进攻魏国和韩国得手，士气高昂，兵威猛震。魏国遭桂陵惨败，正修补创伤，积蓄实力，准备与齐、楚等国在中原再度争雄，此时已无暇西顾。秦国虽然还没有完全收复河西地区，但严峻的军事威胁已经解除，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在握。

在这种形势下，秦孝公和商鞅议定了深化改革。实施第二次变法的方案，以谋求秦国进一步的发展、准备日后挥师东进，不仅仅复河西地区，而且兵伐“山东六国”，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此时，秦都栎阳城的战略地位已经改变。秦献公在公元前 383 年把秦都由雍城迁至栎阳时，主要是出于巩固东部边防，阻挡魏国兵锋，待机收复河西地区的考虑。这里距洛水不远，濒临前线，它实际上带有战时的临时首都和前敌指挥所的性质，随着秦魏两国军事形势的改变，秦国的当务之急已经可以从主要巩固东部边防转移到从长计议日后更大的发展。栎阳东临边境，把它继续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是不适合的，而且。栎阳在渭水之北，偏离东去函谷关的大路，不利于以后出击山东六国。

另外，栎阳作为秦献公时建置的战时首都，其宫室必然从简，不可能大兴土木，建设得很豪华壮丽。与其他诸侯国营建较大的都城相比，它肯定逊色不少。在秦国的经济实力增长、财政收入增加。

军事声威大震的情况下，它似乎已显得与秦国的国力和君威不相称。当然，可能还有秦孝公弃简从奢、商鞅好大喜功等个人因素，总之，他们决计从栎阳迁都，在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兴土木，“筑冀阙”，营建新的宫廷。后来，商鞅把“大筑冀阙，营如鲁、卫”（修筑咸阳秦宫，其规模可与鲁、卫的宫廷相媲美）作为自己的政绩之一。

而秦国隐士赵良则攻击商鞅“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这当然是指责营建秦宫奢侈浪费的一面。赵良还说，商鞅在出行时，有数十辆载满甲兵的车随从，有身强力壮的护卫作陪乘，还有许多持矛操朝的武士紧随车辆夹护而行，“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商鞅的出行是如此，其在咸阳修建的相（大良造）府也可想见是很威严、豪华的。

尽管“大筑冀阙，迁都咸阳”不无可议之处，但此举主要还是出于秦国内政和外部用兵的考虑。咸阳地处渭河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水，东控函谷关口，西拥雍州之地，雄据甘陇和巴蜀通往中原的要津，于内处在秦国的辐射中枢位置，于外可以水陆并进，东出函谷，问鼎中原，这里正是后来柳宗元所谓“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的帝都之所。

公元前 350 年，秦孝公迁都于咸阳。从此，“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在商鞅的策划下，秦孝公开始在秦国实行第二次变法。

商鞅第二次变法是在第一次变法取得成效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刻。全面的社会改革，这次改革的成功，从长远说，是为秦统一中国后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而秦代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经汉代的继承和发展，一直延续到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结束。从近处说，这次改革的成功是实现了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提出的“强秦”、“复纓公之故地”的目标。

第二次变法的贯彻执行仍然受到了保守派和旧贵族的顽强反抗，史载：在实行第二次变法的四年之后，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又一次触犯法令。商鞅仍像以前那样，刚正严明，断然对公子虔施以割鼻的剕刑。

新法施行五年之后，成效大见，“秦人富强”。此时，与秦毗邻的魏国对秦的迅速崛起深感不安。公元前 344 年，魏惠王为了争得霸主地位，在其都城大梁附近召集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市南）之会，宋、卫、邹、鲁、陈、蔡等十二个小诸侯国的国君参加会盟，并一同前往洛阳朝见了徒具虚名的周天子。此次会盟的目的之一是魏国企图以霸主地位威慑强秦，用外交手段解除秦对魏国西部地区的战争威胁，以便集中兵力在中原一带与齐、楚再决雌雄。

秦孝公没有亲自参加这次会盟，而魏惠王大力恼怒。于是，魏挟十二诸侯会盟之威，图谋西伐秦国。当时，魏国的整体实力仍很强盛。如果魏惠王将重兵从东线转移到西线，倾全国之力向秦发起进攻，那么秦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秦孝公闻讯后“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立即命令秦军严加守备，在各要塞和县城的城墙上遍布弓箭等战具，并且组成敢死队；严阵以待魏军，战争一触即发，形势非常危急，商鞅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决定采取缓争霸，晚称王的策略，计间魏与齐、楚之间的关系，使鹬蚌相争，秦

收渔翁之利。他于“尊诂之间”向秦孝公献策：“魏国新与十二诸侯会盟而朝见周天子，其功大而从者必众。如果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能取胜。臣请出使魏国，计问魏与齐、楚，则魏军必败。”秦孝公闻言大喜，立即派商鞅出使魏国。

商鞅身负重要外交使命，快马加鞭，前往魏都大梁，魏惠王好大喜功，才疏，当他见到今日秦国的大良造正是当年公叔痤门下的御庶子时，心中不免有一处魏尊秦卑之感。商鞅知道魏王早有称王之心，便投其所好，用高功虚名诱使魏惠王中计，他说：“大王召集诸侯会盟，朝见天子，令行于天下，功劳太大了！但是，参加会盟的十二诸侯，除了宋、卫，就是邹、鲁、陈、蔡等等，这些都是大王可以用鞭子驱赶的小国，依靠它们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如北联燕国而东伐齐，则赵不敢不顺从；西联秦国而南伐楚，则韩不敢不顺从。

大王先行打出王的旗号，秦、燕、韩、赵听命于大王的麾下，然后再图兵伐齐、楚。”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轻视别国的魏惠王，被这一席话说得陶陶然，美哉，乐哉。

魏国的战略重点本来是首先在中原一带与齐、楚争雄，魏惠王准备进攻秦国也是为了安定西部边境，扫除后顾之忧，然后集中兵力与齐、楚决战，雪洗桂陵兵败之辱。秦魏两国的战端未开，秦遣大良造前来求和，这似乎已经说明秦国畏惧魏国，西部边境的威胁已经解除。如果魏国打出王的旗号，震慑秦、韩、燕、赵，巩固与宋、卫、邹、鲁等十二小国的同盟，再树王旗帜，践天子之位。这样，与秦之战得以推迟，而魏国与其他大国的战争则已势不可免。

商鞅此次出使成功，不仅直关秦与魏和魏与齐、楚等国的战局，而且实际上开了战国“连横”运动的先河；魏惠王以后采纳惠施“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的建议，则是战国“合纵”运动的开端。商鞅、惠施虽非朝秦暮楚以搏一身名利的纵横家，但“连横”“合纵”实始于此二人的外交努力。

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周天子“致伯”，给秦孝公送来了祭肉。这说明周天子已把诸侯霸主的旗帜授予了秦孝公。此举与商鞅第二次变法大见成效，“秦人富强”有重要关系，同时也与魏惠王在前一年擅自称王。激怒周室密切相关，翌年，各诸侯国纷纷仿效周天子，派遣使者入秦祝贺。此时，魏国与韩、齐的中原大战已开始，而秦国由于大改革的成功和外交的胜利，彻底改变了往日“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地位，重现了秦穆公时期“天子致伯，诸侯毕贺”的辉煌。

公元前341年，齐国军师孙臆采用“减灶诱敌”之计诱使魏军精锐追赶到马陵（今山东省范县西南），进入齐国伏兵的包围圈。

“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固乱相失，”魏将庞涓自杀”“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

其明年，商鞅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如同人之有腹心之疾，不是魏兼并秦、就是秦并魏。为什么呢？因为魏国居山势险要的中条山以西，与秦以黄河为界，独占山东各国与秦经济往来之利；形势有利可以向西侵秦，形势不利时也可以向东发展。现在由于您的贤智圣明国家得以强盛。去年魏军大败于齐，国力衰弱。曾经与其会盟的各诸侯国叛离，此时正是伐魏的好时机。魏国敌不过秦国，必然向东迁徙。这样，秦夺取黄河以至中条山的险要之地，就可以东向控制各个诸侯，此乃帝土之业也。”秦孝公认为商鞅所言

正确，于是以商鞅为将，东伐魏国。

此次战役使商鞅达到其一生事业和权位的高峰，同时也为商鞅以后身无退路而遭车裂之死种下了恶果。商鞅死后，受千古骂名。

秦国收复了河西之地，黄河天险就被秦所掌握，东进的路途已经敞开，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提出的“强秦”、“复纓公之故地”的目标完全得以实现。当商鞅凯旋而归时，秦孝公实践其“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诺言，将于（今河南省西峡县东）、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商洛镇）十五邑赐封给商鞅，“号为商君”。

《盐铁论·非鞅》篇中：“孝公大悦，封之于商、于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二、天殇商鞅自公元前361年入秦，先后实行两次变法，由左庶长升任大良造，又于公元前340年受封为“商君”。在这20年中，商鞅不仅为秦奠定了帝王之基，而且使其个人登上了富贵功名的顶峰。正当商鞅心满意足之时，一个恶兆袭来——秦孝公身染重病，“疾且不起”。

秦孝公知道太子与商鞅夙有仇隙，而且其他宗室贵戚也对商鞅深怀积怨；如果自己故去，太子继位，君臣发生内杠，则秦国的基业有可能被断送，想到此，秦孝公打算传位于商鞅，以完成自己的未竟之志。商鞅受秦孝公知遇之恩，在秦孝公临终时，岂敢越君巨大防？而且，夺太子位，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岂能成？因而，“辞不受”。

秦孝公患病的消息渐渐在宫廷内外传播，种种倒鞅的阴谋正在暗中进行。一些郁郁不得志的士人感到秦国政局的变化，在此时也活跃起来。有一天，一个叫赵良的隐士经人介绍来到商鞅的家中。商鞅一见赵良，就提出愿与他交个朋友。而赵良却旁敲侧击，暗中讽喻：“我不敢存这样的希望。孔丘说过：‘推荐了贤能，受民拥戴的人才肯进取；不贤的人聚在一起，讲王道的人就会隐退。’我是个不贤的人，所以不敢从命。我还听人说：‘占有跟自己不相称的地位：就叫做贪位；得到跟自己不相称称名声，就叫做贪名。’我如果接受了您的厚意，恐怕就是贪位贪名了。所以我不敢遵命。”商鞅知道赵良在讽喻自己，便问：“您对我治理秦国不满意吗？”赵良说：“能反躬自问叫作聪，能反省自己叫作明，能战胜自我叫作强。虞舜说过这样一句话：‘知自己不足者为高尚。’您不如照虞舜的道理去办，无须问我了。”商鞅听赵良前言孔丘，再言虞舜，知道他是儒门学士；想到儒家强调父子之别。男女之防；君位之尊；便说：“秦国本来有戎狄风俗，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现在我改革了这种风俗，使其父子分居，男女有别。我又为秦君大筑宫室，其规模堪与鲁。卫宫廷相媲美。您看我治理秦国，与百里奚相比，哪个更强？”赵良说：“一千张羊皮比不上一狐之腋，一千个唯唯诺诺的人比不上一个正色直言之士。周武王因为有正色直言之士，所以昌盛起来；殷纣王因为使众人不敢说话，所以灭亡了“您如果不认为周武王不对，那么你就让我向您讲真话，您不要觉得逆耳就杀我的头：可以吗？”商鞅说：“有言道‘应酬之言是浮华的，至诚之言是实在的。良言苦口是治病之药，蜜语甜言是害人之疾。’您如果肯向我讲真话，那就是送给我治病之药。我将以您为老师，您又何必推辞呢？”赵良见商鞅态度诚恳，便把心中积蓄已久对商鞅的怨望不满一股脑地道出。他说：“您初见秦君时，走劈人景监的门路，这就谈不上名望了；做了丞相，不为百姓着想，反而大兴土木建宫殿，这就谈不上功业了。您施刑于太子的师傅，以严刑峻法伤百姓，这是积怨蓄祸，您不懂得，道德教化对百姓的影响比法令更深切，百姓对上面的效仿也比法令更迅速。

您受封为商君，居然南面称孤道寡，天大用法令来约束秦国的贵公子。《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遗死！’（相鼠还能打拱作揖，人却无礼；人而无礼。

何不速死！)从这句诗看来，您的行为可不能使您延年益寿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自受劓刑以后，已闭门不出有八年了。您还对公子虔用刑，并且杀死其他大臣。《诗》云：‘得人者兴，夫人者崩。’以上种种事，都不得人心，所以您出行的时候，有数十辆载满甲兵的车随从，有身强力壮的护卫作陪乘，还有许多持矛操戟的武士紧随车辆夹护而行。这些东西有一件不备，您就不敢出门。《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现在的危险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难道还想延年益寿吗？我为您着想，归还封给您的十五邑封地，找个偏僻的地方去灌园种地；劝秦君起用隐居山林的贤士，警养老人，优抚孤儿，敬重父兄，叙用有功之人，尊敬有德之士。这样，您可能稍得安全。

您如果还要贪恋商、于之地，专揽秦国的政教，继续积怨于百姓，那么秦君一旦谢绝宾客而不在其位，秦国要收捕您的人难道还少吗？您的灭亡是可以翘足而待的啊！”“山雨欲来风满楼”。在秦国的政局将要发生变化之际，赵良站在野儒生的立场上；对商鞅提出了严重警告。一方面劝说商鞅及早隐退，另一方面要利用商鞅既有的权势，在其隐退之前，影响秦国的政局，改弦更张，“显岩穴之士”，兴儒门之教。商鞅如果听从赵良的劝告，那就是否定自己一生的事业，并且捐弃由此挣得的富贵功名。因此，“商君弗从”。

公元前 338 年，在赵良警告商鞅的五个月以后，统治秦国 24 年的一代英主秦孝公去世。随后，太子驪继位，是为秦惠文王。“一朝天子一朝臣”当时秦国的君主还称得上“天子”，但君位的更迭同样将引起秦国朝臣的重大变动。何况，秦惠文王在位作太子时险些被商鞅正法。新君与旧臣的夙仇很快就演变成秦国政坛的危机，失败者当然是臣而个是君。秦惠文王继位不久，商鞅就自请隐退，告归其商、于封地。然而，商鞅的杀身之祸已势不可免，以公子虔为首的一批商鞅政敌策划阴谋，向秦惠文王说：“大臣权力太重就会危及于国，左右侍人太亲就会危及于身。现在连秦国的妇孺都知道商君之法，而不说国君之法。这是商鞅成了一国之主，而您却反为朝臣。而且，商鞅本来就是您的仇人、愿您及早除掉他。”接着，公子虔等人诬告“商君欲反”，秦惠文王乃“发吏捕商君”。

商鞅携其母及其家人仓惶出逃，行至秦国边境的关口之下，想找个旅店投宿。走进一家旅店。店主人迎上前接客；见来者神情有些紧张，急忙索要官方批准外出的证件。商鞅无证件可启。店主人说：“商君之法规定，如果容留没有证件的客人，店主要和客人连坐论罪。”商鞅不得已走出旅店，唱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一行辗转逃至魏国境内，投见魏国的大臣襄疵。襄疵拒不收留，说：“因为您对公子背信弃义，所以我无法相信你。”商鞅见魏国没有容身之地，便想再投奔去他国。可是又有魏臣说：“商君是秦之罪犯。秦国的兵力强盛，他们的罪犯逃到魏国，如不给送回去，恐怕对魏不利。”于是，商鞅一行又被送回秦国。

商鞅复入秦境，急奔其封地商邑，和他的门徒发动邑中兵士，“北出击郑”。秦惠文王“发兵攻商君”，在郑国的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将商鞅擒获。商鞅被押解到彤（今陕西省华县西南），秦惠文王早已等候在那里。昔日秦国的大良造，今日成为秦君的阶下囚。

秦惠文王声色俱厉，下令将商鞅车裂示众，并且警告臣下：“以后再不

要有像商鞅这样的造反者！”随后，秦惠文王又斩草除根，“灭商君之家”。、...一个为秦开创帝业的改革家，最后竟遭“车裂族夷”的下常其功其过，其得其失，其伟大与渺小，其无辜死，其作法自毙.....这些都留给了后人去评说。

下篇

一、 血祭

以商鞅为首的商鞅学派是战国时期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在经历了“礼崩乐坏”、旧制度衰朽、新制度萌生的春秋时期以后，“诸侯力政，争相并”的旧中国形势迫使各诸侯国进一步实行改革。“变法”，只有这样才能在兼并战争中取胜。先改革者先受益，改革得彻底受益最多而且最终取得胜利。魏国是战国时期最先实行改革者，因而它成为当时的首强之国。商鞅充分吸取了魏国的改革经验，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先后实行两次变法，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其他诸侯国所不能比拟的。商鞅变法的成功是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秦国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从而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所谓“秦法未败”，就是商鞅所建立的这套制度在商鞅死后一直延续，不可逆转。秦国六世君主依靠这套制度终于横扫山东六国，成就了统一中国的“帝业”。秦王朝虽二世而亡，但“秦法”、“秦制”、“秦政”的基本内容仍被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清末的谭嗣同就曾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从制度改革上看，商鞅是历史上“成大功”的“好汉”。但是，从文化建设上说，商鞅及其学派却有重大的缺陷。他们看到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却忽视了文化沿革的继承性；他们抓住了“富国强兵”的关键——“农战”，却以狭隘的“实用”标准排斥一切“不可以强兵辟土”的文化；他们看到了新制度与旧文化的对立，却没有着手于旧文化的转型和新文化的建设；他们急于实现武力兼并六国的目标，却没有为统一帝国的“长治久安”做必要的文化准备。

商鞅学派提出“任其力不任其德”“不贵义而贵法”，这在战争环境和儒法对立的形势下固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他们把“力”与“德”、“法”与“义”绝对对立起来，完全取消或取代道德的社会作用，没有在新的制度下扬弃原有道德的内容，建立新的道德规范，这不能不说是商鞅学派治国方策中所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商君书·开塞》篇讲到“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这说明在商鞅学派的思想中也蕴含着在秦统一中国后其治国方策实行转变的种子。但是，它被深埋在“力”与“德”、“法”与“义”的尖锐对立中，秦国的历史并没有提供发现它的机缘。直到秦灭亡以后，汉初儒生才用它来说服最高统治者，实现了由崇法到尊儒的转变。

从思想文化上说，吕不韦更表现出远见卓识。他在秦统一中囿的大势已成之时，一改商鞅学派排斥“言谈”、“辩慧”的“壹教”方针，“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撰成“兼儒墨，合名法”计20余万言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这实际上是为秦帝国建筑了一座庞大的思想库。尤其重要的是，《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充分吸收了阴阳五行家的学说，借助阴阳

五行秩序和天人感应的思想，节制君主的行为，要求他“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然而，这座思想库还没有来得及发生作用就随着秦始皇与吕不韦的权力斗争而被废弃了。

秦始皇推崇韩非子，李斯的法家学说，而韩非子，李斯的学说不过是商鞅学派思想在同一个方向上的继续和发展。韩非子在商鞅学派关于君主“任法”的治国方策中增加了慎到关于“势”和申不害关于“术”的思想，这使得法家学说堪与欧洲16世纪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的思想相媲美。但韩非子在文化上的急功近利、轻视道德和知识比商鞅学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从他以下的言论可以得到证明：“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毅者也。”李斯与韩非子有着相同的思想倾向，他在告别荀子而西行入秦时就说：“曾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他贯彻法家路线，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的帝业，以后又坚决推行郡县制，采取统一度量衡和统一文字等一系列措施，其历史功绩固然值得称道，但他策划“焚书”事件，用暴力手段解决意识形态上的纷争，终于将法家的文化专制主义推向极端。这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维护新政权的效果，但却丧失了从长远考虑而从事文化建设的时机。新政权由于没有得到适宜的、丰厚的意识形态的辅翼。制导和调节，所以很快就暴露了其自身的弊病，陷入了政治与经济的危机。

商鞅学派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的改革主要是以君主集权取代诸侯封建，以“私田”取代“井田”。这是适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改革，这一改革的成果直至清朝末年不能变更。但君主集权制和土地私有制也有其自身不能克服的弊病，它们运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因某种因素失去控制而出现政治与经济的失序，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周期性震荡，只有通过社会动乱和上朝更替才能使其重新进入轨道。

在“权”与“法”的关系问题上，商鞅学派一方面主张“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另一方面又主张“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君主不能“以私害法”。在商鞅学派看来，君主的权力至上，而君主的权力之所以成立和有效的基础是“法”；君主必须专权，但不能专利，因为“法”是公利的体现，“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这其中的矛盾是：“权”与“法”在理论上是分离的，“权”是君主所独制，“法”是社会之公利；但在实际操作上二者却是统一的，社会之公利没有立法权，立法权独操在君主的手中，“权”实即等于“法”。齐国的管仲学派对这一点表述得更加明白：“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这样，“公私之交，存亡之本”就全由君主是否能“自胜”即战胜自己的私欲来决定。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盛行的封建社会，要求君主出以公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用“天人感应”和“正心诚意”来约束君主的行为，也最终不能扼制君主的私欲的膨胀。

商鞅学派主张法由“君臣之所共操”，同时又主张“明法”“治国者贵家断……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敌有道之国，官不听君，民不从官。”然而，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刚戾自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是，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自矣，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贪于权势至如此……”这与商鞅学派所设想的君主“秉权而立，垂法而治”已有很大的距离。至秦二世听赵高之言，“乃更为法律”，认为“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李斯为求自保，“阿二世意”，上书言“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牵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由于君主集权本身没有对君主权力的有效节制，所以商鞅学派所设想的君主“不以私害法”得不到实际的保障，“商君不法”最终擅变为君主恣意忘为的私法。其结果也就如商鞅学派所言：“君臣释法任私必乱”。

商鞅开阡陌，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民得买卖”，这适应了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与土地私有相伴随的是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以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庶人之富者累矩万，而贫者食糟糠”。这种情况在秦统一中国时已经发生，加之秦始皇修长城，建驰道，封泰山，求仙药，作阿房之宫，筑骊山陵……耗费了大量民力钱财，力役。租赋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秦二世更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致使“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储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自秦始皇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至陈胜、吴广于公元前 209 年在大泽乡起义，刘邦、项羽于公元前 207 年入咸阳。杀子婴，在短短的十几年间秦国六世君主所完成的帝业就迅速土崩瓦解了。随着秦帝国的覆亡，“为秦开帝业”的商鞅学派也就成为历代儒家所诅咒的对象。

实际上，秦之覆亡的直接责任不在商鞅学派，也不在法家学说，而是君主集权制和土地私有制在其运行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秦以后的历代王朝也终究不能逃脱这一命运，秦帝国只不过是缩短了社会治乱。王朝兴衰的一个轮回。汉代统治者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先是崇尚黄老，然后独尊儒术（此时的儒术实已有选择地吸收了道、法、阴阳等家的学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因有了更为适宜。丰厚的意识形态的辅翼。制导和调节，才延长了治乱兴衰的周期。由此看来，秦亡之迅速与商鞅学派、韩非子、李斯等人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缺陷、失误也有一定的关系二、魂兮归来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桩震撼朝野的大事。当时，在京应试的各省行举子 1300 多人，联袂上书朝廷，要求皇帝实行变法，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其实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从酝酿到发动的触点，它的直接诱因来自于清朝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卑躬屈膝、极大地刺激了深藏于民众和学子间的赤诚之心，爱国主义热情随之高涨，于是围绕着救亡图存的主题，催促政府革故鼎新。变法自强的呼声响彻云霄。

为了有效地推动变法，改良主义这动的中坚——维新派组织各种团体，积极开展变法理论的宣传，为改良运动制造舆论’诸如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长沙的《湘报》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从 1895 年到 1898 年，各地组织的学会有 103 个，学堂 185 在维新派的改革主张中，首当其冲的是改变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旧的政治制度。而实行新的楷模，就是学习外国，学习西方，这显然比早期的改良运动要来得深刻，不再把目光盯在人家积累财富的数量和采用手段的奇巧之上，而是在强调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强调学习人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对这种由钦慕物质方化到推崇制度文化的演变，梁漱溟先生看得清醒，他在 1920 年写就的《唯识述义》中说：“起初的

时候，惊于火炮铁甲之利，声光化电之妙，想着不得不学他的。大约咸丰末同治初以至光绪二十几年，都是这个思想。大家试去检看那个时候的名臣奏议、通人著述。书院文课：试场闱墨及一切号为时务书的无非如此；所以曾文正、李文忠的大设施就是上海制造局。马尾的船厂、北洋的海军，以为西洋所长、中国所短不过这些东西而已，但把它学来便了。曾不晓得这些东西有他的来历（西方化），不是可以截蔓摘果就挪到自己家里来的，而实与自家遗传的教化（东方化）大有冲突之点，轻轻一改，已经失了故步。到甲午海军覆灭，始又种下观念变更的动机，慢慢觉悟得问题尚不在此，把眼光挪到学术、教育、种种实业与政治制度上去，而尤归政治制度之改革，较前可以算得一大进步。大约光绪二十年以后到宣统末年民国初年都是这个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有了变革的摹本，按图索骥，实行新政，思想战线上势必要面临一个十分艰苦的任务，那就是对尊孔读经和人治传统的主流文化的批判。郭湛波说，这（主流文化）是中国农业宗法封建思想的“最后一段”，它的特征，“是尊孔，拥护中国旧有之礼教、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要保存‘国粹’，要发扬所谓‘东方文化’。同时排斥西洋之思想。学术：道德。习惯，菲薄科学，反西洋文化——所谓‘物质文明’，因此，国人要想救亡图存。革故鼎新，就要像陈独秀先生说的那样“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于是，在一场针锋相对的思想批判运动中，先秦法家学说作为儒家思想的天敌，当仁不让地来到了交锋的前沿。显见，沉寂两千年后的先秦法家学说，抖落尘垢，走出闭室的那刻，毫无悠然的从容，也无温文的雅致，更像一个惊醒的、匆匆上阵的斗士。

而章太炎首当其冲。

。章太炎（公元 1869～1932 年）原名章炳麟、字枚叔，大炎是他的别号，浙江余姚人，早年从经学大师俞樾，除受业精纯外，还对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有很深的造诣。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加深了民族危机，章太炎满怀救亡图存之志，愤然走出书斋，投身于政治活动，成为维新变法的积极拥护者。章太炎一生著述甚丰，其问涉及先秦法家学说的主要有八篇文章，分别为：《读管子书后》、《儒法》、《商鞅》、《秦献记》、《学变》、《诸子学略说》、《原法》和《秦政记》，前三篇发表于 19 世纪末；后五篇发表于 20 世纪初，正好是在戊戌变法失败、思想启蒙运动左突右冲，奋力开辟道路的困苦时刻。

总览这八篇文章，似乎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偏于学术，主要有《读管子书后》和《诸子学略说》两篇；另一类大多是充满战斗气息的檄文（谁也不会否认其中的学术价值，只是比第一类，不那么专门、纯粹而已）。

细观这几篇战斗檄文，主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洗刷千百年来对法家人物的诬蔑不实之词，讴歌法家学说的历史功绩；二是批判人治，倡言法治，为此，章太炎斗胆逆批龙鳞，第一个站出来反驳“汉兴以来儒家对商鞅和秦的非难”。他说，商鞅受儒家的“谗诽”已经“二千年”，现在到了为他洗冤昭雪的时候，过去以抑民恣君蔽罪于商鞅，多是诬蔑不实之辞。在章太炎眼里，商鞅言行利民，而非“抑民”，是个以刑维法的“骨鲠之臣”，而不是“曲法以求容悦”的“恣君”小人。他说，商鞅“以法家之警，终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终使民膏泽”（法像猛禽一样的严厉，目的在于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根本就不存在压抑剥夺民权的道理。因

为“鞅之作法也，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商鞅制定法律，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来运作官僚机器，审定宪章制度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使得国家有秩序，老百姓有规矩，除非“民有主率，计画至无俚，则始济以攫杀援噬”（除非老百姓不依法行事，出格到了极点，才把他抓起来处死）。可见，商鞅之法，“非以刑为法之本也”。

富国足兵，以利民生才是他的目的，“故太史公称曰：”行法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于是，老百姓情绪稳定。

集中精力发展农牧业生产，使那些平时游手好闲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开始以务农为生。这样一来，储藏丰裕，国家不会因为老百姓穷而收不到税。起初穷的地方，到后来上下都富足了（功坚其心）纠其民于农牧、使向之游惰无所业者，转而簿井田。是故盖藏有余，而目，税亦不至于缺乏。其始也毅，其终也交足）这不是利民，又是什么？至于“恣君”的恶名，那更是无稽之谈。仅以商鞅的行事为例，“方孝公以国事属鞅，鞅自是得行其意，政令出内，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其贤于汤之窥人主意为高下者亦远矣”当年秦孝公用商鞅为相，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他，商鞅便因循法治的主张，颁布法令，执行的时候，他绝不会为迎合孝公的喜怒好恶，在乘坐的车子上不守法度。他的贤明与汉之张汤专门窥伺皇帝的心思行事是大相径庭的）。再比如，他不宽宥太子嬴驷的犯法行为，把教唆太子犯险的公子虔的鼻子割掉，明知日后新主登基操有生杀大权，也不愿使法度走样而取媚于上（“辱太子，刑公子虔，知后有新主能为什福，而不欲曲法以求容阅”）。接着，章太炎对骨鯁如商鞅，庸渠若张汤之类的人物进行了比较，他说：商鞅当年立下法令“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被刑”，为此，商鞅一日诛杀七百多人，渭河的水都被血染红了，要说残酷的程度，超过了张汤，然“吾以为酷烈与苛细者，则治乱之殊，直佞之所由分也”（章太炎以为商鞅的严酷惨烈与张汤苛求枝节。吹毛求疵是不同的，区别就在于治和乱的差异，正直与好佞的界分）。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显而易见，“汤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故瘁心力而裁制之，若鞅则无事此矣”，杀七百人，“盖所以止刑也。”大炎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人用刑的不同出发点，张汤不问理由，单凭猜测论罪用刑，目的是迎合君主的喜好；商鞅则是树立法的威严，以刑止刑。为此，章太炎把商鞅与张汤的区别，说成是法家和刀笔吏的区别，法家者，以刑维法。不媚人主，不害百姓；刀笔吏者，只知以刑“震怖臣下，诛锄谏士，艾杀豪杰，以称天子专制之意”，两者之间，不仅在治国成效上有优劣之分，其心术的曲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通过上述辨诬和比较，章太炎最后得出结论，“鞅固救时之根”，“此骨鯁之臣”是也。我们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像商鞅那样“知大法”，绝不可学张汤之流的“陛狱之制”。

章太炎替商鞅翻案，出发点在于对法家学说肯定，他讥嘲前人，将法家与刀笔吏合伍，岂止目光短浅，还使先秦诸子之学的一大精华流失（“使九流之善，遂丧其一”），酿出了悲剧。于是他力排众口一辞的低毁之议，竭力倡明法家学说的种种长处，他说：“今之儒者，闻管仲。申商之书”，就吓得人发颤，脸发白，却不知“（国）侨、（诸葛）亮之所以司牧万民者，其术亦无异于管仲、申、商也。”显然，法家学说亦为治国之道。“管子曰：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他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又曰：“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此则法以公开明令，赏罚有度，君臣有他施政，

它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人性伎悍，难与为善，非制之以礼，威之以刑，不肃，”因此，法治是必须的。其次，法以明令昭示天下，成文化的特征，使它具有公正性。1906 章太炎在欢迎东京留学生的会议上说到“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时，把“刑名法律”纳入其中。他说：“中国法律，虽然近于酷烈，但是东汉定律（汉袭秦制），直到如今，没有罚钱赎罪的事，惟有职官妇女，偶犯笞杖等刑，可以收赎。除那样人之外，凭你有陶朱。倚顿的家财，都得受刑，总与贫人一样”。这就是法不阿贵。当年“秧挫辱太子，而上不肆行，非令者徙；便令者亦徙，而民不窃议，故《新序》称之，以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秦国之法才能令行禁止：再次，“法家之教，任贤考功，期于九列皆得其人，人有其第，官有其伍，”使得人才能破上而出，各得其所。当年，秦始皇用商鞅之法，“负以断天下”，不任亲贵，“子弟为庶人”，而选拔的重臣良将，如李斯、蒙恬却都出身于布衣。

他们得此殊遇，凭的全是本事和功劳。秦始皇能统一天下，绝非侥幸，他崇尚法治，奖励军功，如韩非所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纺，则官职大而愈治”。

评说了法家的诸多好处，章太炎激情难抑，直言不讳地讴歌起他们的历史功绩。他称赞管仲治齐，“首主法律，以此创业垂统”；秦政任法，“而秦日富”，成为七雄之首（七雄指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大国）；“汉采以至吴魏，法家大行”，再入后，“宋包拯，明之况钟”，他们所以能“传之歌谣，著之戏剧，名声吟口，逾于日月，虽妇孺皆知”，不外乎“慎守法律，为民理冤而已。”由此，联想到眼前，章太炎力陈救国之道，声称：“遭世衰微，不愈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苟卿韩非之说，谓不可易。”态度鲜明地举起了以法为治的旗帜。

章太炎倡法治，特别强调维护法的尊严。他十分赞赏秦昭襄王生病，老百姓知道了，有人买牛为之祈祷，宫中的官员外出看见后对秦王说：“君主德望过尧舜矣”秦昭襄王问：“此话怎么讲？”那官员说：“尧舜爱民，民未至为其祈祷。现在，大王生病，老百姓买牛以祷，故臣自以为王过尧舜矣！”秦昭襄王听罢，即派人去调查，果有此事，便决定惩罚二甲（里正与伍老，是秦国最低级的乡官）。他对身边人说：“我要惩罚二甲，不是责怪他们有爱寡人之心，而是他非令而擅祷。看上去我是有点寡恩无情，但于法令一节却毫无疏担否则，以情在法，法不立，乱亡之道则生，国家还成什么体统”（王曰：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也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足见，“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作为我们后人“要其用意”，那就是为政者不循私情。

“决然循于法律之中”。

如今，要维护法律的尊严，留恋封建旧制的缠绵绝不可有。为此，章太炎猛烈地抨击了人治的传统。他指斥汉代儒家“舍法律明文，而援引经诛心以为断”，滋成“为法之蠹”。

他批评黄宗羲“有治法而无治人”的言论，误导治国经略，等于是“欺世之谈”。为了主体现尊法精神的彻底性，章太炎还公开反对人法兼治的主张。他说：朱元璋“诵滩闽儒家（指宁代理学），又自谓法家”，行的就是儒法相渐，人法并治的门道，其结果愈治愈乱，只能是“败绩之术也。”接着，他振衣愤言，历数人治的弊端，锋芒所向，直逼清朝政府。他说：清朝统治

者也好“濫閩”，“刑爵无常”，视法律为具文，视百姓如草芥，乃使“冤狱滋烦”。另外，在明文规定的法律之外，“多设条例，务为纠葛”，“好恶因于州郡，生杀成于墨吏”，害得百姓“呼天无所”，造成前古未有的大乱。若要避乱趋利，只有上上下下都“专重法律，足以为治”。

章太炎对法家肯定得较多，并非站在个人好恶的立场上去颂扬法家，而是从救亡图存。

维新变法的目的出发，幻想把西方的资产阶级法制与中国旧的法治传统糅合起来，建立一个具有法治秩序的新社会，于是他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制思想，从法家学说中寻找印证。他肯定先秦法家“法不阿贵”、“一断于法”、“任贤考功”的理论，并认为法家就是类似于西方的职业政治家群体（“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为政治峻也、，描摹的就是奔走呼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其间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作为近代史上第一个替法家正名的始发议论者；确实于荆棘丛生的学术之路中开出了一条途径。

最后，谈几点从商鞅身上得到的启示：（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当一种制度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必须对之进行改革。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鞅学派的这一变法原则至今仍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商鞅变法的成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财富。它说明新制度终将取代旧制度；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事业必然取得胜利，并且不可逆转。

（2）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仅具有阶段性，而且具有连续性。阶段性主要表现为生产力水平的不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连续性则主要表现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沿革。

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而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具有惰性的力量。当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革时，这种变革必然与传统文化发生某些方面的冲突。一种制度不可能造就一种全新的文化，而只能对传统文化因势利导，转变其原有的形态，决定其继续发展的方向。当一种制度试图斩断与传统文化的瓜葛，或以一种狭隘的实用标准来对文化进行取舍时，它势必造成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匮乏。

（3）因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所以每一种新制度与旧制度相比只具有相对的优越性，而不可能十全十美。制度无暇论或制度万能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种新制度缺少适宜的、丰厚的意识形态的辅翼。制导和调节，那么这一制度的局限或弊病必然迅速地、充分地显示出来，从而造成运转的失序。社会的危机。因此，一种新制度必须妥善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善于从事传统文化的转型工作，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从事新文化的创造综合，建成自己的意识形态。

（4）传统文化的延续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因而它也具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亦即它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上表现为某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当旧制度衰朽。新制度萌生时，新的历史经验必然产生出新的思想观念。新旧制度的冲突和新旧思想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新制度的建成需要具有新思想的人充分发挥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大胆改革。

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是新制度得以建成和确立的必要条件。新的思想观念产生于新的历史经验，而新的社会进步则有赖于新制度的建成和确立。

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有可能为新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某种逻辑上的可能，但这种可能如果没有新的历史经验的刺激则无法成为现实。传统文化在新旧制度的变革时期也要经历一个自身的转型时期，它直接服务于旧制度的那部分思想内容将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与新的思想观念进行整合，从而上升为新制度的意识形态，一个文化由此得以延续和发展，而新制度与新文化的结合又共同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在这里，新的历史经验和新思想，新的历史创造性和新制度，是传统文化实现转型的决定因素。因此，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宿命论是错误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新旧制度和新旧思想激烈竞赛的历史时期，有可能保留传统文化中一部分有价值的遗产做出积极贡献；但文化保守主义如果不与新制度和新思想结合，那么则必将受到历史的淘汰。

(5)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新制度的建成总是与社会主体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相联系的。

在旧制度衰朽，新制度萌生的过渡历史时期，社会主体总要打破原有的秩序。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而这种背离在新旧制度交替时期尤为严重。

道德理想主义往往与文化保守主义相伴随，而与新制度相冲突。新制度的建成不仅需要冲破原有道德规范的束缚，而且需要形成自己新的道德规范。新的道德规范是新文化的一部分，它同样需要吸取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内容，符合一个民族的传统心理，继承一个民族的传统美德。将新制度与传统道德绝对对立起来，新道德的建设就无从完成；否认道德的社会作用，或忽视新道德的建设，新制度就缺少必要的行为调节机制，从而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卷二 再现革命之精神

“后改变中国”提法的由来

什么是“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真到来了吗？

当后改革中国觉醒时

“后改革中国”提法的由来。

今年是 199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

应该说，二十年后的我们，提到“改革”“开放”这些词儿已经是光荣自豪，再没有了一丝一毫如履薄冰的感觉。但是二十年前，这却是怎样至艰至难的一步呵！

回首当年，几乎不用查资料，我们就可以数出这些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进行各方面改革的转变。

全会讨论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一九六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对如何改革开放进行了探讨。全会还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初技术发展经济的？》以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实行开放、引进的专题材料，作为参考。

在这个基础上，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现在看来，这是怎样来之不易的选择呵！

感谢党中央，感谢邓小平，是他们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选择了这样一条关键的道路。

但毕竟，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二十年了，很多的东西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1998年3月17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出了新总理朱镕基，几天后朱镕基又组建了新一届政府，这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正是在这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之际，我们根据全球大趋势，根据即将步入21世纪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提出了“后改革中国”这一说法。

什么是“后改革中国”？

一句话，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改革中国。

为了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这句话，且先让我们弄清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知识经济”？

什么是“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略称，目前尚不是一个严格的说法，但它被提出来以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知识经济所要表述的是一种新的复杂的经济状态。知识经济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

与以往的经济形态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经济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未来经济要改变和超越现在这种以技术为驱动的发展模式，即改变片面地追求产品技术的极致。

追求生产规模的极大化，而转向把知识做为驱动的主要力量，这种经济是建立在日渐发达的、成为未来经济主流的信息产业之上，强调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主张敏捷制造和个性化商品的规模生产；是能够按用户需要进行有效生产和服务的经济。

所以知识经济是更人性化的经济，是更能体现价值规律的经济。

按照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从本世纪后20年到下世纪前20年，甚至更长，发达国家正处于信息或知识经济的长周期内。可以预见，在此阶段上，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全球的主题。

和平的实现需要以和平为向来应用科学技术，注重用知识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并消除贫困、差异和不平等，这些只有对知识的有效利用方能得以实现。在发展方面，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除需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之外，还都面临着另一个重大课题，即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亦即科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知识经济不仅是发达国家所面对的事实，也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课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加快发展和消除贫困两大难题。加快发展就必须借鉴前人成就，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或发展战略；消除贫困，关键是解决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人的素质提高，这两方面更是离不开科学技术。知识经济的到来，特别是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基础上，人类对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将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先进的知识也将为更多人所共享。

在某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知识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口的确占世界的大多数，但是世界上有 90% 以上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的科技活动却集中在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投入还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一家企业，不少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附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知识经济的到来有一个危险就是有可能加剧知识分配和交易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把知识产权交给发达国家，反过来自己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来求购知识的成果。

知识经济时代真的到来了吗？

近几年来，国外不少国家加强了对知识经济和知识产业的研究。知识经济是在信息技术和知识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未来学家预计，21 世纪的核心产业将是知识产业。据科学家研究，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20 世纪初为 5%—20%，70 年代至 90 年代为 70%—80%，信息高速公路联网后，将提高到 90%。为加速科技发展，各国都在增加研究和开发投资，也更加重视教育。这方面美国是一个典型。

伴随着知识经济日益受到重视，投资也正在流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特别是流向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1990 年，美国在信息业方面的投资第一次超过对其它产业领域的投资，该国在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业领域拥有明显优势，在克林顿提出的 1996 年美国全球贸易政策中，将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列为优先工程。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 1996 年 7 月发表的《科学与国家利益》的报告中强调：到 20 世纪结束时，信息将成为世界经济系统中最重要商品。美国创造知识的速度以及利用新知识的能力，将决定下一世纪美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

1996 年美国对信息技术产业投资的总和。

而早在 1994 年美国研究与开发投资达 1730.2 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16%。由于美国研究与开发经费大大超过其它国家，投资重点又向高技术产业倾斜，美国新产品开发、产业结构调整进展快，始终处于有力竞争地位。据分析，1996 年美国经济增长中约 1/3 是信息产业发展带动的；近年来，为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日本也增加了研究与开发投资。日本总务厅公布的数字显示，1996 年度日本研究与开发投资比 1995 年增加了 3.4%，达到 15 亿日元，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 3%。

美国除增加科研投入，发展知识经济外，很多国家还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教育状况》报告中提供的数字，1992 年经合组织 25 个国家的教育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6.5% 其中美国的这一

比重为 7%。早在 1990 年，美国全国教育开支已达到创纪录的 3530 亿美元。日本在 1948 年普及了初中教育，1976 年普及了高中教育，在此基础上，到 1992 年大学升学率达到 56.6%。

此外，美国还重视进行在职培训，甚至重视终生教育，因为知识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

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每年用于职工培训开支超过 10 亿美元，日本丰田所属各厂的 4.6 万技术工人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同时，公司特别重视岗位培训。

当后改革中国觉醒时

按我国目前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知识化水平和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却是经济的条件是不具备的，但是在我国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已经有了发展知识经济的充分条件，我国的知识经济有可能、也应该由这些地区先发展起来。

当然这些地区的知识经济发展也离不开我国的综合国力，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我们发展知识经济的第一支柱——高技术产业的综合国力条件与近 30 年前日本提出“技术立国”。发展当时的新技术产业时的综合国力条件作一比较。

我国“九五”计划期间（1993 - 1997）经济 5 年连续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11.6%。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于 1997 年达到 9010 亿美元旧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于 1968 年达到 1919 以京、沪、穗为例，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目前按实际购买力与日本 1970 年相当，低于葡萄牙 1991 年的水平；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与日本 1970 年的水平相当；从城市人口来看与日本 1970 年水平相当；而大大高于葡萄牙 1995 年的水平；从恩格尔系数看低于日本 1970 年的水平；从电话普及率来看则大大高于葡萄牙 1992 年和日本 1970 年的水平；从文化状况来看与日本 1970 年水平相当，大大好于葡萄牙 1992 年水平；从每万人研究开发人员数来看则好于日本 1970 年水平和葡萄牙 1992 年水平。

由此看来，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区已具备了开发高技术产业的充分条件，应发挥智力资源的潜在优势。同时，这些地区也必须注意发展经济。提高市场和科技开发人员的收入水平，稳定物价，尤其是食品物价，降低恩格尔系数，保证科技开发人员有一个小康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充分发挥已有的创新能力。

关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临近，我国跨世纪的科技战略将作如何部署的问题，朱丽兰显示出成竹在胸，从容不迫，她说，我国近 20 年的科技事业发展，经历了从 1978 年科学大会以来的第一个春天，小平同志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得到了全国上下的普遍认同，在两个面向方针指导下，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发展高科技方面，在江泽民总书记的“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指示下，我国在高科技的若干领域赶上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取得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并在高科技产业化方面迈出了步伐。

1997 大增强的明证。现在新一届领导人又提出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决心，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跨世纪

的科技事业将会迎来又一个春天。

从朱丽兰部长的这番讲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后改革中国已经觉醒。

第三章 回首一望，遍地鲜花

1978—1998 改革辞典

上篇

一、 纪元，从一个 73 岁的老人复出开始

1977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华国锋著名的“两个凡是”。后来我们知道“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 中说：“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说，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也历来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讲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就像“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而应当从爱护知识分子出发。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信中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55 邓小平还列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加以分析，来阐释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在 1977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极左，否定“两个凡是”，为中国开辟新的道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

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

徐向前在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文章回顾了与张国涛、“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的斗争，说：“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陈云在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这些努力，都是批评“两个凡是”，缩小“两个凡是”的市场。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引起全世界轰动，成为关于中国的最热门的话题。然而，邓小平很少谈自己，他总是把话题引向中国的急迫的实际问题。

此后20年，党和国家的历史及命运，就和邓小平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纪元，从一个73岁老人的复出开始了。

二、转折点

我们现在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但是，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是怎样实现的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了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文献，是中央工作会议伟大成果的集中反映。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成果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

正如江泽民同志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忌，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几天之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乃至以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由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已做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从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只开了 5 天。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 169 人，候补中央委员 112 人。另有 9 人列席，一共 290 人。

在三中全会上和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

在三中全会上确立下来的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经过发展，后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进行各方面改革的转变。

全会讨论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对如何改革开放进行了探讨。全会还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以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实行开放、引进的专题材料，作为参考。

在这个基础上，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全会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全会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全会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全会认为，只有采取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会提出的上述思想和措施，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正式确立。

三中全会深入探讨了农业问题。

全会公报提出了逐步实现农业化的目标。对于“农业学大寨”，则一字未提。

公报强调的是：“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这就从宏观决策层和大环境方面对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给予了鼓励。

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诞生了包产到户的惊人创举。

三、“小岗之夜”——凤阳农村里诞生的一个神话。

1978 一间油灯摇曳的小棚子里，却有 20 名农民正双目炯炯，满头汗水，神色严峻地签写了一份契约。

每个姓名都按上了血手印，契约上另加三个图章。

历史证明，这份契约是惊天动地的。现在，它作为中国当代历史的珍贵文物，已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号为 GB54563。

这就是“小岗之夜”——凤阳农村里诞生的一个神话。

背景是这样的。

1978 提出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局。但华国锋不同意，他认为只有人民公社精神更深地灌入农民心中，抓紧阶级斗争，才能振兴农村。

了解了这些情况，你就会对小岗之夜“惊天动地”的意义有进一步体会了。

当然，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1978 年毕竟不是 1962 年了。

华国锋、万里二人争论时，叶剑英、邓小平在常万里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在插话中再次重申了他的“猫论”。叶剑英缓和地站在邓小平一边。这等于合二人之力，支持万里向人民公社制度挑战。

其实，万里已经在安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包产到户的措施。在万里支持下，安徽省农委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安徽六条），并以省委文件名义于 1977 年 11 月 15 日下发，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之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这些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内容，为安徽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壮了胆。

在安徽制定六条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四川十二条。文件指出：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并特别肯定了四川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

《人民日报》于 1978 年 2 月 3 日和 6 月 13 日对安徽和四川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作了突出的报道，给予支持。

人民公社制度之所以被冲破，是因为它完全解决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1978 年无异于雪上加霜。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

在省委紧急会上，万里激动他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体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经过激烈斗争，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这个大胆的决策，有如及时雨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扭转了被动局面，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

于是才有了“小岗之夜”的一纸契约。

四、特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未久，也就是 1979 年初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

经广东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并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

在 1979 年 4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直接向中央提出了这一项建议。

这一建议引起了争论。

邓小平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有“试办出口特区”一节，提出要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对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要求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

会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调查研究，推动两省制定方案。

1979 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1980 昆、刘田夫、吴甫生、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具体安排特区建设方案。这次会议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同年 8 月 26 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特区诞生不久，国务院相继调整批准四个特区扩大面积，增强了特区的实力和窗口功能。

1980 考察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吸取国外经验，研究我国特区开发管理办法，取得了成效。

1981 和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统一了对特区的认识，并为特区制定了一整套政策措施、包括关税优惠，简化出入境手续，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和金融政策，引进外资，制定特区法规。特区行政体制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等等。

7 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文件为四个特区的建设统一了思想，提供了指导原则。后来特区的整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就是在这个文件基础上发展成熟的。至此，四个特区建设全面展开。

在特区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人对这个全新的事物不理解，甚至怀疑。

有人问：把外国和港澳的私人资本引进来，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吗？有人问：特区会不会成为新的“租界”和“殖民地”？还有的人甚至认为，特区除了那面飘扬的国旗是社会主义的，是红色的之外；其它的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是白色的。

针对这种种“左”的疑问和指责，1984 年 1 月至 2 月，邓小平同杨尚昆、王震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

经过考察之后，邓小平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的这次考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但鼓舞了特区建设者的信心，而且为围绕特区的争论作了权威性的总结。

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结合特区开发建设发表重要谈话，他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说，厦门特区地方大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他还提出要再开放几个城市，要开发海南岛。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这一年 5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从大连到北海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5 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第二步再将辽东半岛、

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准备之后，199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五、革命的呐喊

邓小平在1986年9月29日对来访的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

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悲剧、为了适应新时期多方面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政治体制。

1980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讲话。

这篇讲话，深刻地揭露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根源，强调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

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专门报告，并获得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

邓小平在讲话中郑重指出：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我们国家有很多大的毛病，是不是由于个别坏人如“四人帮”的搞乱所导致的呢？在当时，很多人是这样看的。

邓小平把人们的认识引导到更为根本的制度层面。他在这个重要讲话中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在这里，邓小平批评了前苏联的政治体制。

他郑重地提醒干部和群众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这简明而有力的概括，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邓小平在讲话中猛烈地批评了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方面的五种主要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特权。

他在讲话中论述了这些弊端的危害，分析了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邓小平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邓小平指出，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力义务观念薄弱，“官工”“官商”，“官农”的体制和作风，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不承认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以及宗法观念所导致的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等等，邓小平认为，要通过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曾在讲话中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获得广大的拥护。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解放思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大的成果和发展。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立刻全面实施和展开，这是由于，一方面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任务艰巨紧迫；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复杂，党内尚未就一些具体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正如邓小平在 1986 年 9 月 3 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所说的：“这个问题太困难，太复杂；究竟从哪一点开始着手，我们还没拿定主意。”但是，对于第一次思想解放来说，毕竟获得了最重要的突破。

后来，邓小平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机构正是政治改革的前奏曲，所以可以认为，小平同志最初关于政治改革的倡议，便是革命最早的呐喊之一。

中篇

一、姓“社”，还是姓“资”？

1992 在《深圳纪实》的通讯。

在这篇通讯中，作者以满腔激情，生动地描写了 88 岁高龄的邓小平自：月 19 日到 23 日在深圳特区视察的经过，并在文章中披露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部分重要内容。由于这篇文章写的是最热的热点，并且文笔优美，所以人们争相传阅，先睹为快。

紧接着，北京和全国各地重要报纸陆续转载这篇通讯。

热心的读者一个一个地数着先后转载此文的报纸和没有转载此文的报纸，并以此为依据，猜测着各机关和各地对邓小平南巡的态度。这是有中国特色政治的一道风景。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回答了几年来经常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

南方谈话丰富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使这一理论走向成熟和最终完成。在这一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这一理论写到了党的旗帜上。

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几年来的实践，深有体会他说，学习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的再讨论，是改革开放的再动员，是加快建设的再推进。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着深刻的创造性和鲜明的针对性。

就当时国内情况来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支持下，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开展反贪倡廉工作，稳定了国内局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199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九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 5 年奋斗目标，并勾画了从 1991 年起要实现“翻两番”的基本要求。

1991 年《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再次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提出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稳定了农村的形势。

到此，从 1989 年开始的历时三年的治理整顿基本结束。治理整顿克服

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整顿了经济秩序，取得了成绩。

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开始顺利实施。

但是，这几年的经济工作也存在问题。由于种种原因，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4%，1990年比上年增长5%。发展速度慢了。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邓小平提醒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邓小平之所以说这样一番话，乃是因为此前社会上已出现了一股极左的思想。一时群众的呼声很高——姓“社”，还是姓“资”？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如果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只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就可以解决，那真是太方便了。大家问就是了。

没有经过尝试，没有经过实践，就先问姓“社”姓“资”这是一种什么理论呢？这是脱离实际、不问客观情况发展、死抱着僵硬教条的理论。

而且，“问一问”，是问谁呢？问实践吗？不是。这是理论家们不同意的。问了张三李四回答说这是社会主义的，行吗？也不行。

我们的理论家也是不同意的。只有问他们，“请他们来裁决才算数。

这就不仅仅是主观主义的僵硬了，而且有点武断霸道的色彩。

这种“问一问”的唯一作用，就是阻碍和葬送改革开放的事业。

问一问姓“社”姓“资”，实质上是否定改革。

改革开放正是一次又一次冲破极左的问与答，才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中国也正是一次又一次冲破极左的问与答，才一步一步摆脱了贫穷，一步一步走向富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极左思潮只能导致中国的贫穷。愚昧与落后。

在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左”的代表性观点，除了“问一问姓‘社’姓‘资’”之外，再一个，就是维护计划经济的统治地位，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坚持“左”的一套的人，明明知道，从1979年到1990年，邓小平先后10次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第一次：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经龚育之同志考证，这是党的领导层中以肯定的语气讲采纳市场经济之必要的最早的声音。

第二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在讲到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第三次：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对经济搞得不活。”邓小平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第四次和第五次论述，是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引起的。《决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方针，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确认必须“逐步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在两年前，这

种观点还是受到公开批评的，1984年10月20日，在中共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邓小平讲话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9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全会上讲话，又称赞了这个文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市场取向的创新，只不过暂时还沿用着商品经济这样：—个过渡性的概念。

第六次：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谈话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要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第七次：在准备十三大的过程中，1987年2月6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吗？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第八次：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讲话说：“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这里没有在字面上说市场经济，但在实际上，对宏观控制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适应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新要求。

第九次：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十三大确定的路线不能改。这当然包括多年来形成的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和思想。

第十次：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的意见以及相关指示应该说已经很明确了。

二、邓公南方之行

北国“春寒料峭”，干脆巡行向南，于是有了邓公的南方讲话。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倾思潮，批驳了假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左”的谬论。

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针对—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横加干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现状，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结合创办特区的实践，—步指出：那些起劲地鼓吹问—问姓“社”

姓“资”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他说：了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人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以深刻的智慧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冲破禁区，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难题，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

在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中，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是市场经济。在我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在体制上，在人们的观念中以及一些部门的实际利益当中占有优势。虽然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十几年，但是不少人的思想还是在传统的圈子里打转，缺乏勇气突破。

“左”倾思潮的代表人物祭起姓“社”姓“资”的旗帜，拼命反对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硬拉在一起，更造成了新的思想混乱和政治雷池。

其实，全世界各国的实践都说明计划经济不利于促进生产力持续地不断高效发展。

邓小平正是对大量类似的经济现象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思考，从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他一语击破“左”的障眼法，把人们的思想从禁区当中解放出来。

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邓小平由此发挥开来，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了更为精辟的概括：“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以紧迫的责任感，催促改革开放要大步前进。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

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邓小平提出了抓住机遇的命题。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担心失去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出了台阶式发展战略。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要求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两手抓，扫除各种丑恶现象，不能手软。

他在南方谈话中也就组织路线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邓小平特别指出：“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极为丰富和深刻。

谈话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因而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

南方谈话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精辟论述；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等等，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的新回答，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巨大突破。

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之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黄钟大吕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左”的瓦釜之鸣。

后来，《邓小平文集》第三卷出版，压轴终卷的一篇赫然就是，“南方谈话”，这一铁的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发表的谈话，乃是新的时期标志着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是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三、淘金！淘金！淘金

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学习、贯彻、落实的热气腾腾的景象。

经济发展有如搏战激流的鲤鱼，冲天跃起，跳上新台阶，跃过了龙门。

这一年2月28日中央将南方谈话以中共中央1993年2号文件的名义向全党下发和传达。

3 部署并发表了会议公报。

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会议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应用这些手段，加快商品经济发展。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4 他的讲话以农村改革与发展为主题，批评了“左”的思潮，要求大胆推进改革开放。

反“左”成为此时中国政界、经济界和理论界的热点。

5“这一天，是股市的真正诞辰。”结果是：从21日到23日，仅仅三天，股票价格一飞冲天，暴涨570%。

其中5种新股市价面值狂升2500%至3000%。

狂升的股市，造就了杨百万这样一群新的靠股票发大财的富人。

现在，神话到处流传：“某某发啦！”“某某买股票赚了上千万！”人心都搅得痒痒的。乱乱的。

人们蜂拥而上买股票，8月份，深圳股票交易所发生抢购股票风波，那是后话了。

从3月到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落实谈话的方案。

5见》，作为中央4号文件下发。

在加快改革方面，提出了转换经营机制，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加快物资。商业体制改革，深化经营体制改革，积极扩大市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和科研体制的要求。

在扩大开放方面，提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逐步开放沿边城市，形成周边对外开放的格局后还要继续办好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加快内陆对外开放步伐，省会实行沿海开放政策，扩大开放领域，拓宽外贸形式。

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催动下，由沿海地区带动，全国出现房地产开发热和开发区热。

这一次，广西的一个风光秀丽但过去不大出名的小城成了房地产的热点，这就是北海市。这里虽然起步较晚，但美丽的沙滩既长又宽，况且交通方便，又会发展海南的物资出海口，堪称广西的一颗明珠。种种经过夸大的前景和捞钱机会。勾引了无数来自内地、台湾、港澳的房地产商及投机者来到这里。当时热闹的情形，在有些人眼里，简直像过去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一般，买地、卖地、盖房子、卖房子。

人就在当地，地还没来得及圈，更不要说开发了，买地的已经转了几道手。每一道都要狠捞一把。这里又成了继股票之后制造新富人神话的地方。许许多多的人在这里发了大财，当然，在泡沫破灭之后免不了又有人倒霉，那也是后话。

至于开发区，更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大热特热。人们把大片的地圈上铁丝网，就算开发区。幻想着几年之后这里就要变成香港那个样子，至少也要出现省城那般设施。

6十四大召开在即，各界都知道，总书记的讲话将是十四大报告的基调，所以格外重视。

江泽民在讲话中说，中央和地方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

就是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

他说：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存在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忽视甚至排斥市场作用弊端等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要求，束缚生产力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其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对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

他说，要尽快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江泽民针对新的经济体制的几种提法，说：我想在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

他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要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这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无计划，所以，我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接受的。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

江泽民的讲话，振奋和鼓舞了改革的锐气。

十四大召开之前，改革开放的浪潮继续涌向高峰。

企业改革和配套改革深入发展。

6度、分配制度、人才分流等为重点，大胆进行改革试验。

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促进第三产业全面快速发展。

同月，财政部决定在九个城市、区率先进行分税制改革，以取得经验，再行推广。

9管理的工农业出口计划指标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9例》的通知。转换机制，重点是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不折不扣地把经营权下放给企业。这个条例，是推进改革，促使企业走向市场的一个重要决定。

一系改革措施纷纷出台，大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态势。破除“左”的干扰之后，1992年成了轰轰烈烈又实实在在的改革年。

在对外开放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催动中国经济跃过了高速增长的龙门。

淘金！淘金！淘金！

四、走近十四大

1992上冲破了传统观念和“左”的障碍，开辟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新局面，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新发展。

在十四大政治报告起草期间，江泽民就强调：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是邓小平十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概括和重要发展，十四大报告要以这个谈话精神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

江泽民在十四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圆满地体现了这个要求。

报告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取得了多方面重大成果。

政治报告第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以南方谈话为灵魂，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九个方面作了新的科学概括，使之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这个基础上，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提法，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就回答了近一两年来“左”倾思潮对邓小平理论发动的挑战。

报告评价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中国如何建

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五年之后，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称为“邓小平理论”，表明这个理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更加深入人心。

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所作的九个方面新概括是：1、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 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3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4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 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6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7 的长期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已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9 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这是到 1992 年为止，对邓小平理论最新最全面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次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

十四大之后，89 岁的邓小平亲自审定文稿，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以前出版的两本《邓小平文选》经增补后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和第二卷。

五、“软着陆”

膨胀，膨胀，谈“涨”色变，怎么办？为了尽可能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中央决心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委派懂经济的朱镕基以重任。

1993 年《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灵活利用利率杠杆增加储蓄。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等 16 条措施，要求各地立即贯彻落实。

紧接着，自 7 月初开始召开全国金融会议、财政税务工作会议，贯彻落实 16 条措施。

宏观调控开始在全国实施。

与 1988 年的治理整顿相比，这次宏观调控有以下几个特点：一、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但又综合利用了调整利率。加强法制等手段，是行政、经济和法制的统一，比 1988 年的措施更为多样，更适合复杂的需求。这标志着我们的宏观调控正在走向成熟，走向现代化。

二、掌握了适当的力度。紧，不是紧到底，不搞一刀切。对于那些效益好的有市场的企业，在紧缩银根的同时，该给予资金支持的还要支持，不像 1988 年那样一下子“冻结”。

三、放也不是不分目标的撒手全放开，而是有选择的放。总之，宏观调节的用力点是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因此，这次宏观调控被国内外称为“软着陆”。对于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复杂的经济状况来说，经济“软着陆”当然要比“硬着陆”好。虽然字面上都是“着陆”，但“硬”坠下来显然容易伤筋动骨。

实施宏观调控之后，过度投资得到控制，金融秩序好转，物价涨幅降了下来，出口和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经济增长仍然保持高速度。事实证明，“软着陆”获得了成功。

在改进宏观调控的同时，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1993 年《关于十四大若干问题的决定》，人们又把它称为“五十条”。

又是一个三中全会。是历史巧合还是有内在规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的改革决定多数都与“三中全会”有关。

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用多说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重大突破的好文件。

十四大之后，人们希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和内容有一个

明确的表述。“五十条”就满足了人们的这一要求。

因此，可以这样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五十条”，是把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具体化、系统化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画出了一张通往这个目标的路线图。

据文件组织者和起草人之一的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说，为了写好这个文件，组织了有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同志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共350多人深入各地调查研究，为文件提供内容。

在起草过程中，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多次听取汇报，提出修改意见和要求，并多次召开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座谈会，对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五十条”分为十部分，分别讲述了八个方面的改革目标与主要内容。重点是第二至第五部分，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五个环节。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和中心环节。

二、统一的市场体系，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条件，又是现代企业运行的必然结果。在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的过程中，重点是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规范。

三、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节器；要改革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机构改革。

四、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共同富裕。

五、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阀和稳定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既要有基本保障，又要适合中国国情。从1993年到1994年，改革大步突破。

下篇

一、“1992年以后”

事关改革大业，有一篇题目叫做《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不能不提。这篇文章，也有人称为“1992年以后”——我国当前仍然存在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

为了受“八九风波”的教训，避免重蹈东欧苏联无产阶级政权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

一、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有状况，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小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近年来，随着私有制经济成分的恢复和发展，私营业主和个体生产经营者又在我国重新出现。

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

级的萌芽也已经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含外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剥削和压迫。

三、社会意识的变化从 1977 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

1992 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四、执政党的变化（一）党组织的弱化。

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周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些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这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

（二）一部分党员思想的变化。

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在北京电视台“BTV 夜话”中发出的号召）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

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恢复：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两极分化正在发展。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会使他们对共产党失望。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机时刻像 1991 年“八月事件”时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孤立无援。

（四）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 70 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大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80 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90 年代以来，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

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很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十年。

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于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政治风暴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

或许，这是后来公开的第一封向改革大业“宣战”的万言书。当然，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分，但它同邓小平理论已背道而驰，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历史现在已证明，邓小平理论是伟大的、正确的，是方向和旗帜，是不可

动摇的，那么，这篇“1992年以后”也就无须再加推详了。

二、私营

私营，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在我们国家，它像下雨一样，开始的时候稀疏疏疏，似落非落地掉下几点，逐渐纷纷扬扬，一阵紧似一阵，终于连成一片，这就是私营企业。

政府的官员从来没有说过“搞活”私营企业，也从来没有想过把他们用在国有企业的心血分出几分给私营、可是，私营企业却在以快得多的速度成长着。到了1995年的春夏之交的这个季节，分布在中国大陆的个体工商企业已经有2400万家，有4300万雇员。

在这里工作，此外，还有至少700万人受雇于大约60万家私营企业的老板。

我们国家的个体企业与私营企业，均由私人来投资和经营，其区别仅仅在于两者的规模略有不同。按照政府的规定，个体企业的雇工在7人以下，私营企业的雇工在3人以上，最多者可达数百人。作出这种划分的理由，据说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一个例证，将3人以上的企业列为私营。

在80年代，北京人开始把个体以及私营的老板叫做“大款”。

到了90年代，“大款”之说已经风行全国。在现代汉语中，“大”为多，“款”为钱。据说拥有百万乃至数千万元财产的“大款”当以百万计，其衣食住行之豪阔，如花园别墅，奔驰轿车等等。为今日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私营，一向被认为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水火不能相容，并且不被法律所允许，直到80年代初期，还属被批判和被肃清之列。

无情地消灭了原有的私营经济。这个步骤由1950年对官僚资本的大规模的没收开始，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57年，大陆中国的工业生产总额中间，属于私营经济的部分，只余0.1%，所以共产党能够宣布其“改造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又经过60年代的“文革”，私营经济在中国大陆上已经绝迹。

私营经济的死灰复燃，是30年以后的事，80年代，共产党再一次承认私营经济的存在，从表面看来，乃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令意识形态的压力大大减少，“资本主义”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魔鬼。不过，从政府官员的立场上来看，令他们对私营经济又痛恨又无奈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经济本身的大问题，非由私营经济不足以缓解：一个是整个中国日益膨胀的失业率；另一个是国营企业中普遍的低效率。

前者，依据官方后来的统计，在70年代末，失业率为5.3%，以中国城镇之总劳动力来计算，则当日失业人数约为数百万。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统计，由于人多地少的局面以及农业的季节性，中国农民一年之中的工作时间不足100天，换句话说，他们一年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不能生产的，或者叫做失业。若将这一部分人口计算在内，则大陆中国的失业者可能会在1亿人以上。如果坚持公有经济一统天下之初衷，则须由国家以足够投资来解决失业的问题。据国家工商局的一位官员估计，每年至少要拿出

400 多亿元，为国家财政所难以负担。这表明共产党在经过了 40 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明白，仅仅依靠公有经济无法解决中国大陆的失业问题。

而国有企业中弥漫的消极怠工和化公为私行为，成为最令人头痛的一件事。这种局面造成了至少 30% 的企业亏损，每年的亏损总额当在数百亿元人民币。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有经济失去了信心，所以有人说，“什么国营（赢），分明是国输。”人们期待着更加活跃的经济因素成长起来。“我们的新战略就是开辟新的经济生长点。”辽宁省的一位官员这样说。这里是中国北方国有工业的大本营，过去几十年中曾有过无数的辉煌，而今天，他们却深深感叹自己为“国有”所累。所谓“一个新的经济生增点”，就是私营经济。

尽管如此，私营经济在我们国家始终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理直气壮。随着政治风浪的迭起鼓荡，私营业主也在这中间一会儿耀武扬威，一会儿惶惶不可终日，中国人所说“私营经济是政治风向的最敏感的晴雨表”，就是在说这种情况。

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可由其上交给政府税额的增长趋势来证明。1990 年，这个数字为 120 亿元；1991 年 179 亿元；1992 年，200 亿元；1993 年之后增长得更快。增幅也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不难设想：掌管国体的某些人一方面兴高采烈地把这些钱装进国库，承认私营经济正在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另外一方面又屡屡对私营之超过公有的增长率流露出担忧：倘若非国有经济之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国有经济的状况不加以扭转，社会主义的基础会不会动摇？这多少可以表明中国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面前所流露出来的矛盾心情。

三、所有制

1995 这份报告的第一句说：“经济‘软着陆’的目标正在实现。”“软着陆”是中国人形容自己的经济形势时用的一个词。意思是：让“过热”的经济平稳、和缓地回归正常的水平线上。有如一飞冲天的飞机，缓缓着陆于正常跑道，而不是一头摔将下来，机毁人亡。

“硬着陆”的最典型的例证是 1989 年的治理整顿。它在大约半年当中把通货膨胀率降为大约 3%，但却造成了生产的不能增长甚至负增长，以及市场销售的普遍下降，也即当日人们所说之“疲软”。

这一次，情况大不一样。

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 1992 年至 1993 年的增长高峰和通货膨胀高峰之后，从 1994 年开始回落。这一年，通货膨胀率大致为 10%，回落了大约 10 个百分点，增长速度也渐渐回落至 10% 左右。这是一个“软着陆”的典型案例。其“着陆”的行动从 1993 年夏季开始，大约持续了 24 个月，结果形成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和一个小不高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

也许是由于这个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苏、世界银行副行长施蒂格利茨、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等人认为，中国人对西方市场经济这一套了如指掌。他们甚至认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在中国。

施蒂格利茨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在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曾经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对访美的上海市长徐匡迪说：“我看你们中国领导人才应当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操纵中国经济“软着陆”的

关键，有如中央政府所说，是“宏观调控”。

自从 1993 年 6 月下旬，中央政府颁布了“十六条”，稳定便成为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目标。

当时的经济局势，看上去有一触即发的危险：通货迅速膨胀，投资螺旋上升，信贷几乎失去控制，人民币不断贬值……很明显，治理经济过热成为当务之急，姓“公”姓“私”的争论暂时地搁置一边。

副总理朱镕基主持金融大局，宏观调控大幕开启。“十六条方针”的目标是，在短期内纠正混乱的金融秩序，控制迅速升温的经济。其具体措施，包括货币、金融、财政、汇率和投资管理等方面。

核心的问题是金融。

短期的办法在行政指令之下行于全国。

接着是颁布长远之计。1994 年初，税收、银行、外汇、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办法一起出台……由于“软着陆”的成功，宏观调控从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但是，没有人会料到，一些久已埋藏的问题，由于这一局面浮现出来。

中国公有制经济内部之百孔千疮的局面，从此再也不能掩盖国有企业首当其冲。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说，截至 1996 年底，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的库存产品总值已经达到 13276 增加的贷款几乎全部增到了仓库里。

也说明了，我们的很多机器，是“为仓库开动”，不是“为市场开动”。

宏观调控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为仓库开动”的机器全关了。

于是，工业领域里，“压”、“限”、“关”、“停”之声，不绝于耳。

让国有企业来应付这种局面，它能好受么？1995 企业的利润减少了 23%。

全国 38 万多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虽然也在下滑，但其下滑的幅度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下滑。

1985 152 企业不能赚钱甚至亏损，成为让政府最头疼的问题，90 年代，总计全国的企业亏损，每年以大约 15% 的速度增加，年均亏损逾 500 亿元，利润总额当中大约 47% 的部分被亏损抵销，而全部亏损中，国有企业占 70% 以上，其亏损额分别为：1990 年，348.8 亿元；1991 政府的报告说，“软着陆”宣告成功，但是，工业的问题更加突出，国有企业的问题更显严峻。

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杨宜勇主任说：中国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宏观好微观也好”。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是“微观不好，宏观也不好”。宏观调整的政策实行之前，曾经有人说：“微观好，宏观不好”。现在，人们评价目前的经济状况，常说：“宏观好，微观不好”。

宏观好不好？人们大致有定论。微观好不好？人们至今还在说三道四，没有一个结论。

1995“抓大”，就是集中精力抓好一批关系国家命脉。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大企业集团。

“放小”，就是将一般国有小企业，扭亏无望的。产品无市场的，将之或者兼并、或租赁、或承包、或卖掉、或破产。

在全国 800 多万家企业当中。有 32 万家是国有企业，也即政府所说“抓大放斜”的对象。

国有工业企业中，列为“大中型”者只有 1.4 万户，其余均为小企业。

即使是 1.4 万家大中型企业，也不全在“抓”的范围。根据中央政府的计划，所谓“抓大”，只是 1000 家大型骨干企业。言外之意，其余都是“小”都可以放。

已经实行的种种办法证明，所谓“放”，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

从经济的局面来看。这是一条不得已而为之的路；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就成了是否要化“公”为“私”，而这已涉及到了所有制问题。

捍卫“传统之道路”，还是开辟“新兴之道路”？

四、跨世纪的十五大

1997 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不出世人所料，这个报告的主旨，也就是江泽民在“五·二九”讲话当中阐述的精神。

其中很多话，比如关于“旗帜问题至关重要”的一段话。中国改革“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一段话、“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没有出路”的一段话，与“五·二九”讲话完全一样。

也有一些话，“五·二九”讲话中提到而后来未见公开发表。这一次则在报告中公开重申，比如“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报告说，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报告的论述相当全面和详细。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最有新意：第一，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重申 10 年以前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

第三，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江泽民在报告中建议，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称为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称为邓小平理论。

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江泽民回顾了 1978 年冲破“两个凡是”的过程，回顾了 1992 年冲破“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的过程，尽管他没有使用“第一和第二次思想解放”这样的提法，但是他接着说：“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加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说：“这样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

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应当说是理论方面最具突破意义的一段。江泽民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意质的提高。”“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

其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 10 个方面：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九、非公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对于十五大，让我们引用官方的一句话作为总结——“又一次思想解放。”

第四章 大方略

上篇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由来自

1997 年 7 月 3 日以来，以泰国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为导火索，一场金融风暴从泰国骤起，横扫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

韩国、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并波及台湾、香港、巴西、阿根廷及希腊，连美国的华尔街、英国伦敦、日本股市也相应发生暴跌。这场风暴震动全球，造成了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货币体系崩溃的巨大灾难！它的余波还将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产生影响，要想彻底摆脱，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提起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潮，人们就情不自禁地大骂起一个实力强大的货币投机商——索罗斯。他此刻是千夫所指，万人愤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曾提出：索罗斯应该对这次金融风暴负全面责任！但是最为有趣的一点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他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没有使用暴力、贿赂等肮脏的手段。他只是象炒股票一样一个一个地炒作某国的货币，直至该国政府投降认输，被迫将货币贬值。于是乎，他便轻而易举地赚取到暴利！国际金融经济学家称这位具有敏锐头脑的匈牙利裔美国人为“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

东南亚这次金融风暴的国际经济背景是什么？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结果如何？波及的范围，特别是对中国有无影响，导致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东南亚国家的泡沫经济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借助于西方经济学家犀利的眼光，我们也许可以获得一个简单明了的认识。

在危机暴发前的去年 6 月 9 日，在瑞士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年度报告曾指出：“世界经济前景看好，但金融市场尚有隐患。”该报告全面而深刻地指出。

“国际市场规模扩大，国际游资急剧增长，总数达 7.2 万亿美元以上，平均每天就有：万亿美元在活动。”这些游资有寻求短期套利套息的特征，特别是流动迅速。故称之为黑驹基金（Hedge - Fund）”。黑者——不干好事，驹者——跑得快也。这些巨额的国际游资，就是金融投机的巨大温床。试看：这样的黑驹基金，全球一共有 3500 个。

“国际股市的活动表现异常活跃，投资热潮高涨，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的股市、房地产过度活跃，大借外债来强烈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这些过度求快的做法就直接地导致了东南亚经济发展的“泡沫”大量生成：——而它就是危害东南亚国家的罪魁祸首！这叫自食其果！

私人资本作用日益增强，以著名投机人索罗斯为例，其领导的“量子基金”就控制着 40 里的腥味，它们是“黑驹基金”之中的领头黑驹。

黄金市场疲软。

银行业改革与监管作用急需提高和增强。

由于历史原因，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起步较晚，工业化革命也比西方晚了半个世纪。确实，这些国家的经济一度以两位数字奇迹般的增长。但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用了 200 年走过的工业发展之路，东南亚国家用 10—20 年就能赶上并企图超过！就象一辆汽车去追击一架飞机一样，如果只是一味地加快速度，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车翻人亡！正确的作法应该是：给汽车也装上翅膀！

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威尔认为：东南亚国家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金融结构还很成熟，当然地存在着很多漏洞。这些国家的上层人物只是看见了自己的经济以两位数猛增的骄人战绩，却一叶障目，没有看见前进路上的许多陷阱。快速的增长使他们导致兴奋，头脑过热，纷纷悄悄地做起了 20 年追上英、美的“白日梦”。制定政策，加速前进，迅

速与国际接轨。把自己本来就早已有很多泡沫的经济，用“盲目加速”的空心针筒，进一步地加大泡沫，然后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将一个个特大号的泡沫放在了诸强面前，其结果是可想而知！

这些大泡沫，有“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短期外债泡沫”等等，当初真是好看之极，现在剩下的只有破裂时的巨痛和深深的自责与反省！

说到产主过程，又要提到索罗斯之流的超级货币投机者。他们是早就发现了东南亚的泡沫经济及金融体制，产业结构。国家经济调控政策的巨大漏洞与裂缝，就象苍蝇一样，早就盯上了这一只只有缝的蛋！

这里，就以始发国泰国为例，讲一讲索罗斯阻击泰国铢的过程和操作手段。英国经济学家马克斯绘制了一份简图加以说明：首先，索罗斯在国际金融界散布谣言：“泰国金融不稳！泰铢要贬值！”随即暗中向泰国银行以美金为抵押，巨额地贷出泰铢，然后在货币市场上大量抛售泰铢，买入美元，制造出一种寻求保值的假象（实际上是在残暴地打击泰国的固定的、稳定的货币汇率制度）。

索氏乃国际巨额资金的掌管人及代言人，他的一句话，非同小可，足以带动大量的中、小户纷纷效从。这样，索氏利用其仅有的 40 亿美金的淡仓，利用人们对泰铢的信心危机，轻易地在泰国银行抛出上百亿美金的泰铢，带动中、小户一共有上千亿美金的泰铢抛出！

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泰国政府感叹：自己从 300 亿美金的外汇储备中，拿出 50 亿美金投放救市，结果竟象一盆水泼在了夏日滚烫的沙漠上一样无济于事。终于泰国政府宣布投降—放弃国家汇率，实行浮动汇率。泰铢则应声贬值：从 7 月 1 日的 1 美元兑 25.9 泰铢，狂降至 11 月 1 日的 1 美元兑 40.6 泰铢，几乎快贬至一倍！于是索氏自己一个人净赚 40 亿美金！天文数字，金融风暴发生是迅速的，就象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倒了引起一连串的反应。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日本、香港及台湾等地纷纷出现大量外资外逃，大量内资逃出股市，寻求保值。于是乎股市汇率大跌。造成大量失业。如日本的最大的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倒闭后，即刻造成了 7500 名员工失业。股票跌至历史的最低点。以菲律宾为例，8 月 28 日一日创下了 10 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9.28%，差一点点击破 2000 点大关。就连美国的华尔街，英国伦敦，日经指数也暴跌！

总之，其波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持续的时间之长，是空前的。这一点在以后的几年里，人们会逐渐感受到！

其结果，损失惨重的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货币体系崩溃，必须依靠国家紧急贷款；韩国政府忍辱负重，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AMI）苛刻的条件，丧失了相当的国家自主权，以此为代价向 AMI 贷款 570 亿美元；泰国同样也需要几百亿美元的贷款；其它东南亚受害国也与此类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给他们这样巨额数目的贷款，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比如：韩国 1998 年到期外债总额为 900 亿美元，570 亿美元的贷款是远远不够的！

同样，要想在短时期里解除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谈何容易？人们不能挥洒自如地把它“扫地出门”，就像当初谁也阻挡不住它的不速而至一样。一句话，东南亚金融危机就那么厉害——“找上你没商量！”

二、思考

短短几个月之中，东南亚地区为什么会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明星跌落到目前的境地呢？对此，各方经济学者、政府官员、商界精英一直在苦苦思索。

应该说，东南亚国家的总体宏观经济水平并不很差，1996年，它们都继续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通常通胀可以接受的水平，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也保持得比较好。其问题主要出在外部平衡方面。

如前所说，东南亚国家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对外经济的平衡关系到整个经济的走向。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的外部环境和国内因素有了几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而它们自身的反应不及时，最后被投机者看中，一举击溃。

首先，东南亚国家的汇率体制调整不及时，80年代东盟四国经济进入起飞之后，为了减少外部经济环境的波动，汇率都采取了与美元或者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挂钩的方法，浮动的幅度很小，在过去10年中，由于美元对日元、马克等货币的汇率不断贬值，强大的日元不断释放出来，很多就投资到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产业和贷款给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美元贬值，这些国家的货币实际也跟着贬值，出口价格相对便宜，出口越来越旺盛。

但是，从1995年中开始，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汇率迅速回升，到1997年中美元对日元大约升值了50%对马克升值了30%。东南亚国家的汇率联系美元，也随之对日元等其他货币在实质上升值。但它们并不具备汇率实质升值的实力，造成本国货币严重高估，出口竞争力受至第一重压力。因为本国货币高估，出口增长下降的同时，进口大幅度增长。第二方面的压力来自国际电子产品市场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受到电子产品市场周期性调节，国际电子产品价格普遍下降，对出口电子产品为主的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东南亚国家的出口普遍下降，泰国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下半年的25.8%下降到5.8%，马来西亚则从26.8%下降至11.2%。到1997年上半年，泰国的出口为零增长，而其他东南亚国家只有个位数增长。

而在其产品的国际市场方面，在东亚区内；由于中国出口的崛起，东南亚地区的出口竞争力已经明显下降，在很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上退出来。在区外的欧洲，东欧国家逐渐融合到欧洲统一市场中，取代原来来自东亚的进口；在北美洲，北美洲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的产品大量销往美国和加拿大，都使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面临严峻的竞争形势。

然而，在东南亚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同时，一直实行比较高伪利率政策，近年来美国却实行低利率政策。由于几年来东南亚四国迅速向外资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大量外资应声而来。

这些外资，既有传统意义上的直接投资，更多的则是以股票、贷款性质进入的短期外资，其中包括大量来自日本的贷款（日本国内的利率只有2.5%的水平）以及西方国家专门在金融市场上运作的共同基金和退休基金。这些基金把东南亚地区称为新兴市场，为了把它们进一步炒高，各大金融研究机构的分析员不断写投资报告，吹捧东南亚地区市场的发展前景，吸引越来越多的短期外资进入。

金融市场越来越旺，令当地政府喜出望外，认为经济前景一片光明，

更加放心大胆地开放资本市场给外资进入。例如，泰国政府 1990 年正式取消对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的限制；1991 年银行获得国外的低利率资金，立刻吊起了人们借贷低息外国资金胃口，大肆借入外债；允许外资银行在泰国各城市开设分支机构等。1995 年，泰国部分人士甚至认为香港面临 97 大限，曼谷将取代香港成为这一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大有发展前途。

这种短期外资进入，势必需要见效快的回报。很明显，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是他们的首要选择。因此，在过去几年中，曼谷、吉隆坡、雅加达等地的资产急剧膨胀，经济过热的现象十分严重，股市高涨，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基础设施建设大发展，各国都推出了宏伟的发展计划，泡沫经济的现象愈演愈烈。

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的后果，是各国在出口竞争力下降的同时，进口大增，导致经常帐户逆差严重，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它们在乐观的预期下，更加开放本地金融市场，吸引短期资本流入，因为利率差别大，本地金融机构和商业公司也放手大借外债，特别是它们借入了大量短期贷款（约占外债总额的 1/4）。这样，形成了经济过热、进出口失衡、外债增加、经济继续过热的恶性循环。1993 年以后，东盟四国经济外部平衡出现了两个危险的信号：它们的经常帐户连续 5 年出现赤字，经常帐户的赤字约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8%。它们的债务偿还比率（每年需要偿还的外债占当年出口额的比重）偏高，除了马来西亚外，基本都在国际公认的危险线的 25% 上下，印度尼西亚过去 5 年都接近 30%。

在经济泡沫化下，在过去几年中，实际上东盟四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已经停滞，取代工业投资的是以千亿美元计的短期基金的组织式投资和外国银行贷款。据国际金融协会和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1996 年流入亚洲新兴国家（包括除日本外的整个东亚地区）的基金有 1418 亿美元。1990 年泰国的外债只有 200 亿美元，1997 年上升到近 900 亿美元。对此，泰国总理差瓦立承认：“过去 10 年中，我们一直在挥霍借来的钱。我们欠了很多，只有精明、正确地使用这些钱，我们才能减少债务。”由于成本上升，1994 年以后东南亚（印尼起步较晚，还有较大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停滞局面，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形成的比重越来越低。1985~1990 年，马来西亚外资占 43.7%，1991~1993 年保持在 20% 以上，1994 年以后降低到 20% 以下；泰国在 80 年代后期为 10.2%，1991~1992 年为 4.8%~4.9%，1993 年为 3.4%，以后降到 3% 以下。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整个投资还在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也保持 8% 左右的增长水平。如此高的投资积累，除了本国居民的储蓄之外，便只有举借外债了。

与外国非制造业短期资金进入对应，东盟国家对本国金融业也采取放手发展的方式，允许金融机构数目大扩张，取消企业的贷款限额，银行体系兼管不严，大量的银行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项目上。而且，由于部分国家政治上的腐败，大量银行贷款被浪费，而很多问题又不能及时公开解决。问题越积累越多（危机爆发后，泰国一半以上的金融机构需要关闭，令储户苦不堪言）。

据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估计，到 1997 年底之前，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五个国家的银行坏帐总额将达到 730 亿美元（新加坡没有多少），占五国银行总贷款的 15%，相当于这五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13%。其中，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问题最严重：马来西亚 1998

年的银行坏帐总额可能达到 190 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0%；印度尼西亚达到 19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

另一方面，各国的金融监管又十分薄弱。例如，银行的坏帐如此高，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却没有增加贷款的损失准备金。过去 10 年中，银行的贷款在逐年增加，而贷款损失准备金却在逐年减少。例如，从 1994~1996 年，在菲律宾所有银行的平均贷款增加了 38%，而贷款损失准备金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却从原来的 3.3% 减少到了 1.5%，最高的马来西亚也只有 2%。

因此，市场人士这样评论东南亚（主要是东盟四国）的金融业：如果把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业比作一座木楼。它的外表很漂亮但内部已被白蚁至空，随时都可能倒塌。投机者正是利用这个薄弱环节乘虚而入，一击即中。

受到信心膨胀的影响，各国领导人对出现的外部经济失衡和金融风险并不在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于 1996 年分别向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提出警告，指出它们的国际收支经常帐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对外负债的偿债率等指标都高到了令自身经济很容易受到冲击的地步。可惜，这些建议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例如，1997 年 3 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访问泰国时表示，泰国经济很稳定，所谓泰国有金融危机是西方媒体制造出来的。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的领导人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对国际经济知识的认知程度上都是最高的，尚且如此轻敌，其他国家可想而知。

在投机者进攻东南亚国家货币时，各国中央银行为了保护货币汇率，采取高利率政策，令银行坏帐问题更加严重，房地产的过剩。泡沫经济现象显露无遗，大量进入的外资竞相撤退，对美元的需求骤增，对汇率的压力更大，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在最后放弃对汇率的干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投机者的作用也绝对不可低估。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游资的规模越来越大。据估计，这股游资的总额已达到万亿美元以上，它的特点是流动性强，善于钻营，通过左右外汇、期货、股票市场的行情获利。一般认为，1992 年欧洲的英镑和里拉危机，1994 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投机者挟庞大的游资在作怪。不过，投机者身份隐蔽，手法诡秘，行踪无定，各受害国政府对其毫无办法。

最典型的投机者是对冲基金。对冲是在对外贸易和商业活动中为了避免汇率和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投资技巧其目的是避免风险，防备损失。对冲基金则是利用这一技巧来进行投资活动的基金，其投资策略是在避免风险的同时，达到基金本身套期保值即增值的目的。

对冲基金除了利用对冲技巧投资外，也针对各种金融产品（如外汇、外汇期权、股票、股票期权等）在不同市场的差价来进行投资活动，达到增值的目的。从对冲基金的投资技巧看，其运作过程通常是基金持有某些金融产品（主要是期权、期货等衍生工具），在不同的产品之间对冲，实现增值的目的。一般来说，对冲基金与普通投资基金遵循的市场交易原则是相同的，但它的特点是投资高风险产品的比重比普通投资基金高得多，而且常常以大量借贷形式进行，其可动用的资金常常是本身资金的数倍或者数十倍，可以调动数百上千亿美元的资金。因此，对冲基金的投机性特别强，市场越是波动，获利的可能性越大。而由于对冲基金可以操纵的资金规模巨大，它们往

往又可以影响市场走势，使其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对冲基金多以美国为基地（在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少量），在全球的各个市场上寻找机会。

在对冲基金中，最有名的是索罗斯（Georges Soros）旗下的量子基金和罗伯特森（Julian Robertson）管理的老虎基金。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很明显两者都从最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另一方面，美国的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的投资银行在看准市场风向之后，也会从事投机交易，由于它们资源更大，对新闻媒体的影响能力更强，更能够左右市场心理预期，对新兴市场的杀伤力也更大。

因此，可以将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两个。

1 东南亚国家的问题是在经济过热，外贸逆差严重。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它们在 1994 年以后更大幅度开放资本项目，利用短期资本项目进入填补外贸逆差和资金缺口。而短期外国资本进入之后，只能选择投资收益快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股票和房地产的泡沫。但是，随着泡沫经济升温，出口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该国的外贸逆差越来越大，只能再借外债，特别是短期的商业性贷款，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这时候，短期资本的流动便可以急剧影响该国的汇率，终于被国际投机资本一举攻下。在被投机资本打击之后，内外资的信心发生严重动摇，泡沫崩溃，整体经济更趋失衡。

2 衡不稳，内外投资信心容易动摇又因为资本市场开放，给美国的投机资本有机可趁。它们利用自己可以动用的庞大资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庞大剩数作用，针对个别最薄弱的环节如泰国进行攻击。在泰国得手之后迅速转战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利用期货（包括离岸市场）与现货市场在汇市和股市之间对冲。它们的声势更带动了其他投资基金和本国资金的牛群心理，而信心一失，崩溃之势便无法收拾。

汇率失守和股市下跌之后，其内部经济的问题就更原形毕露。而在防护汇率时抽高利率，又会打击企业和正常的工商业，令企业负债加重，个别企业及与之联系紧密的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流动资金问题，趋于倒闭。到最后政府都不得不放弃汇率，这时候又造成进口成本增加，通货膨胀上升，外债问题更难处理，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援助。

实际上，上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看到了东南亚地区宏观经济的问题，国际投机者才可以放手攻击。而它们攻击之后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东南亚地区宏观经济失衡的偏差。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基本经济越好的地区，实质经济受到的冲击越小。

在东南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马来西亚可以勉强度日，新加坡则基本没有太大问题，对实质经济影响并不大。

因此，这次危机的开端是个别国家的经济困难，如果没有美国投机基金的冲击，不会酿成全面的区域性危机。如果在危机开始阶段，区内的大国给予足够重视，如日本和中国共同资助泰国，危机恶化的程度和扩散的机会应该可以降低。而区内的经济强国日本和中国既不大规模介入帮助，又不带领东亚地区的中央银行合作，个别国家根本无法抗衡投机基金，一旦失守，便形成骨牌效应。

对于东南亚危机的严重性，国际上一直有两种看法。主流的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短期的，而且是金融层面上的，经济的实质面没有被摧毁，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之后，东南亚经济会恢复正常，再次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一

些国际金融机构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调低，除了泰国是负增长之外，其他国家都还保持4%~5%的水平。新加坡保持6%以上的速度。经过1998~1999年的调整，这些地区都会恢复到6%以上的速度。尤其是，经过汇率大幅度贬值后，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会更上高速增长轨道，带动经济继续增长。

另一种看法认为，东南亚这次危机的后果是长远的，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国家今后几年经济会进入一个低增长期，告别原来年均7%~8%的平均水平。一方面，东南亚经济要消化原来建设起来以及尚未完工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清理出现问题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支付因为货币贬值而带来的通货膨胀，需要一个比较痛苦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严格条例监管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时间需要更长一些；另一方面，东南亚经济中外资的比重很高，特别是出口中外资的比重很高，因为汇率风险。政治风险加强，今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投资）的速度会明显放慢，令汇率贬值，对出口和整体经济的刺激作用相对减少。另外，加上汇率贬值，造成这些地区的财富缩小（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按照美元计算的财富可能会缩小50%中心，肯定也会受到周边地区经济衰退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东北亚的影响下，没有太大的缓解迹象，第一种观点在逐渐向第二种转化。

例如，世界银行对1998年泰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危机开始时的2.5%下降到了现在的负增长；一些金融机构对马来西亚1998年的增长率的预测，从原来5%下降到了现在的2%；对印度尼西亚的看法也大致如此，尤其是苏哈托健康不好；更令人担心该国会出现政治动乱。

不管哪种观点占上风，东南亚国家要再创奇迹，肯定不可能再像90年代以来那样继续依靠短期外资的投入，必须面对严峻的国际挑战，靠自己勤劳的人民，严格的政府管理，共渡难关。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肯定是不现实的。

三、人民币如何才能确保不贬值

1997年别达到23%和11%，马来西亚吉特和印尼盾也一度下降到三个月和近两年来的最低点，就连堪称硬通货的韩元和新加坡元也大幅度下跌，这场危机进而冲击拉美市场，使巴西股市出现三年来的最大振荡，尽管东南亚各国政府迅速调整外汇政策。公布新的经济稳定计划，并向东南亚各国求援，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也日趋平稳，但这场危机所造成的破坏和恐慌，却不能不令人深省，据有关专家预测，泰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从去年的约7%降到1%，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的经济增长也将放慢。而反观我国外汇市场在市场危机中尽如人意的表现，不能不令我们感到庆幸与欣慰，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94年的平均8.70元左右上升到今年的平均8.30元左右，且还有走硬趋势。8月15日，面对动荡不安的东南亚金融市场，我国政府宣布向泰国政府提供10亿美元贷款，以帮助其渡过难关，我国外汇市场的表现在这场危机中能如此令人刮目相看，分析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1. 良好的经济形势近年来东南亚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生产费用增加，成本提高，商品竞争力减弱，出口额下降，经常项目国际收支急剧恶化，股市低迷，外来投资回流，再加上房地产投资过热，造成银行大量坏

帐，资金周转不灵，给国际投机者可乘之机，而我国近年来经济一直稳步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9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3.4%，94年增长11.8%，95年增长10.7%，96年增长9.7%。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9.5%达33180亿元，另据国家经贸委公布预测今年下半年将比去年同期增长9.4%，外贸出口高速增长，94年出口额121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5%，96年速度放慢，出口额151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也逐渐回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由94年21.7%，下降到95年的14.8%，96年的6.1%，直到今年上半年的1.8%。

2. 符合现实国情的金融政策在当今世界金融市场迅速融合，流动资金日益庞大，特别是私人企业资金迅速增长的大环境下，一些亚洲国家大多有经济过热现象，房地产过热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帐，进口势头强劲，导致贸易赤字剧增，进入1996年，当泰国经济面临过热之后的调整时，泰国政府放开了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全面允许外国银行进入泰国市场，而泰国多年来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降低了其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作用，再加上经济发展走入低谷，结果国际投机资金乘机炒卖泰铢，以至泰铢大幅度贬值，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而我国经济自去年胜利实现“软着陆”后，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大力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动作，货币供应量增长适度，外汇体制改革也取得成功，自94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后，96年年底又进入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在迅速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严格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对短期资本严格管理，严格控制非居民持有本市，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特别注意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能力的提高，吸引外资一直坚持以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为主，据有关统计表明，中国现在利用的3200亿美元投资中，64%来自外商直接投资，外债余额1200亿美元中80%以上为中长期贷款，短期外债仅为10%，这种投资导向和外债结构，减少了大规模国际游资套利投机的可能性，去年人民银行决定降低存款利率，也抑制了外来资金的投机行为。

3. 雄厚的外汇储备泰国等东南亚各国过度追求高速发展，过多依赖外债来支撑经济发展，造成财政赤字激增，外汇储备减少，无力抵抗国际投机势力的“狙击”，1万亿泰铢呆帐、900亿美元贷款对世界各国都不啻为一记警钟！而我国近年来出口逐年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资料，93年我国外汇储备211.99亿美元，94年516亿美元95年736亿美元，97年1050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雄厚的外汇储备，使国际投机者不敢轻易对我国发动攻势。

夏秋之交，由泰铢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动荡余波未平。近日虽有缓解，但这场金融动荡已引起了世界对东南亚经济的反思，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这场金融动荡地动山摇，虎虎生气的“亚洲第五小虎”泰国大有被压成，“病猫”之势。自7月以来泰铢贬值幅度已超过38%，除新加坡之外，印尼盾下降21%，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货币也都贬值9.9%，现在看来，引发这场金融动荡的因素很多：从内部看，东南亚国家经济结构普遍失调是金融动荡发生的根本原因。首先，一些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泰国“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坏帐、呆帐大量增加，严重侵蚀了这些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基础。

其次，东南亚一些国家贸易结构单一，出口竞争力削弱，导致出口增

长率陡降，国际收支平衡失控。第三，金融基础薄弱，汇率政策不当、金融调控体系滞后，汇率杠杆是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制度性原因。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银行存款的增长速度，金融基础进一步受到削弱。

面对国际市场美元汇价不断上升，国内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的新情况，一些东南亚国家没有及时对原来的汇率制度作出适度的调整，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很容易诱发货币投机。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名义上是实行与一揽子货币挂钩或保持浮动区间的汇率制，实际上则是实行基本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完全开放资本市场，投资者在这个地区投资可以没有汇率风险，确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变化，贸易赤字猛增，货币实际已在贬值时依然坚持固定汇率，投机者就会有机可乘，抛出手中持有的当地货币，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保持本国货币市值，只好大量吃进本市，抛出外汇，而固定汇率制又加大了央行调控的难度。到实在敌不住市场力量时，只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这等于是让本国货币贬值。从外部看，日本股市的复苏，美元持续走强，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纷纷撤离，构成了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的国际短期资本投机性的兴风作浪，终于挑起了这场金融动荡。

东南亚的金融动荡对东南亚经济的直接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投资者的信心。提高了通货膨胀率，使政府不得不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和增加税收，这些因素将汇成制约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合力，可能使世界上最富活力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放慢，但是，这次金融动荡并未对东南亚地区的总体经济构架和经济发展产生毁灭性的冲击，以前经济赖以高速增长的储蓄率高。人力资源充足，有处在最具经济活力的亚太地区的地缘优势。有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作后盾，有谨慎管理其宏观经济的良好形象等方面的优势依然存在。货币贬值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加上对金融动荡已采取对策并有相关国际组织积极援助，因此，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动荡后对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仍然抱有信心、东南亚经济经过短期喘息后仍将稳定增长。

东南亚金融动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无疑提供了宝贵的警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资本市场开放要非常谨慎、警惕国际短期资本投机。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在微观和金融机构的管理上存在缺陷，加之目前世界存在高达1.5万亿美元的短期资本借助现代通信技术到处投机造市，这严重威胁着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稳定。二是要建立金融风险防范机制，警钟长鸣，及时发现和疏散风险，三是要切实调整经济结构，防止出现泡沫经济。

四是要充分估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影响，以防范出现“一个没有国界的地球可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场所”的局面。

四、警示录

1997 饥，其实，早在泰国之前，就已发生过震惊国际金融界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虽然泰国的货币危机与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存在着某种差别，但是，就它们形成的机理与产生的后果来看，却非常相似。这两个国家都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选择了不当的经济开放政策，忽略了外部经济的均衡，从而在国际收支逆差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终于爆发了一场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

法加以应付的货币或金融危机，中国自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国际国内要求中国经济与货币实现自由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当怎么办呢？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与泰国的货币危机或许可以为我们找到一些答案。

1. 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由来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具有厚积突发性。

(1) 在 70 年代与 80 年代期间，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造成了债务危机。70 年代前后，墨西哥与其它许多拉美国家一样，也试图运用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来快速实现经济发展，以便迅速缩小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差距，但令人遗憾的是，凡是推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拉美国家，几乎都陷入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也未能摆脱这一不幸的结局。

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为什么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呢？第一，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且缺少必要的中间投入品（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工业化程度低。社会产业分工欠发达所造成的），因此，国家一旦选择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首先就必须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某些中间产品，有时甚至还需进口某些关键的原材料。结果，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所产生的第一个经济效应将是大量的外汇支出。

第二，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技术和中间产品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由于不具有比较经济利益，往往缺乏国际竞争力，这将使它们无法通过出口其进口替代工业的产品而获得进口技术与部分中间产品所需的外汇，从而产生外汇供给短缺的效应。

第三，当发展中国家只能将其进口替代工业的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时，又会因为国内人均收入水平过低，市场需求规模过小，而产生产业规模不经济的效应，其后果将是国内产品的平等成本远远高于同类进口商品，这样，人们最终将会发现，进口替代生产方式的实际用汇可能要远远超过直接进口国外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生产的制成品所需花费的外汇。

第四，当发展中国家为实现本国的工业化而全力支持进口替代的工业部门发展时，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将被重新配置，即传统贸易部门的资源会被不断地转移到政府保护与支持。

从而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进口替代部门，而这将使国家的外汇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

第五，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迟早会遇到严峻的国际收支问题。最初，这一问题似乎可以通过国际举债来加以解决，但是，只要这些国家不改变既定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那么它就必然没有能力来偿还到期的国际债务，因此，进一步做法就只能借新债还老债，等到债权方了解到这一事实真相之后，他们就会断然终止新的贷款，于是一场真正的债务危机就发生了。

回顾一下墨西哥的债务危机，可清楚地看到，它就是在不切实际地选择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之后，一步一步陷入债务危机的。

(2) 针对日趋严重的债务危机，墨西哥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下决心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变过去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为自由化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内实行自由市场制度；二是对外实行自由的开放经济政策。

自由开放经济政策主要涉及这样一些内容：参加由美国发起的美、加、墨共同市场，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外汇管制，实行货币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等。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并未给墨西哥带来好运气，反而在 90 年代中期产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原因分析如下：第一，墨西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失败，再加上世界石油价格的大幅下降，使得墨西哥已经没有什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可供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匆忙实施自由的贸易政策必将导致进大于出的局面，进而产生严重的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赤字。

第二，从理论上讲，一国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在短期内是可以资本项目的顺差来加以平衡的。但从长期来看，经常项目的逆差必须通过经常项目的结构调整来加以平衡。然而墨西哥在实施自由的开放经济政策时，恰恰忽略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它试图通过开放资本项目，引进外国资本，在一较长的时间里用来平衡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逆差。为此，墨西哥不仅放松了对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控制，而且也放松了对于外国资本（大多为游资）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的管制。

第三，由于墨西哥的市场经济不够完善，在当初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时所遗留下来的许多结构性问题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在墨西哥开放资本项目以后，进入墨西哥的外国资本主要是些专事货币与证券市场投机的游资，真正从事产业活动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非常稀少，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而国际收支资本项目顶差又不断增加（由国外游资不断进入证券市场投机所致）的情况下，国内的产业活动事实上要大大小于虚拟的金融活动，于是通货膨胀就将不可避免；随着通货膨胀的发生，以购买力平价计量的本市汇率就会下降，而这意味着墨西哥的货币将要贬值；这时，墨西哥货币与证券市场进行投机的外国资本就会全线撤出，以避免即将来临的汇率风险，随着外国资本的撤出，原先勉强平衡的国际收支马上就出现了巨大的逆差缺口，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金融危机就在墨西哥发生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墨西哥在 90 年代以后，及时地调整其发展战略，变进口替代为经济自由化，这一做法应当说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墨西哥的问题在于其开放策略的错误，那就是当墨西哥还没有能力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平衡，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时候，就匆忙地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从而导致了国外资本的进入，并最终在国际投机资本的作用下酿成了灾难性的货币金融危机。这本应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牢牢记取的经验教训，然而不幸的是，在 1997 年 7 月，泰国“虎”步墨西哥的后尘，重演了这样一场悲剧。

2、泰国货币危机的原因泰国是亚洲“五小虎”之一，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以来，它紧随着东亚“四小虎”之后，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颇为显著的发展成就，在已经过去的十几年里，泰国经济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年均近 10% 的水平。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泰国却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1）由于十几年经济快速增长所造成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导致了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2）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所造成的外汇收入的迅速增加，导致泰国货币的不断升值；（3）泰国的出口商品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

。面对这许多的新问题，泰国并没有及时进行结构调整，反而自以为

外汇储备增加了，就可以大胆地实行经济与货币的自由化，终于酿成大错。泰国之错主要在于：第一，在外汇收入增加，国际收支盈余，但收入来源并不稳定的情况下，就放松外汇管制，开放资本项目，允许私人部门自由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第二，政府对私人部门从国际金融市场借来资金如何使用并未加以指导和管理，而是听任私人部门将其投向非贸易的房地产业。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一方面，大量资本进入房地产业，造成经济虚假繁荣，泡沫经济逐渐生成，另一方面，贸易部门由于缺少资金支持，不能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以至其国际竞争力每况愈下，渐渐丧失了其以往所具有的创汇能力。

如果我们把泰国以上两个方面的错误综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泰国的货币危机是迟早要发生的，美国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对泰国货币的投机只不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泰国的货币危机之所以必然要发生，道理与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十分相似，简单他说：（1）泰国与墨西哥一样，不能正确处理国际收支短期平衡与长。

期平衡的关系，在长期国际平衡缺乏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就试图开放资本项目来实现短期国际收支的平衡与国内经济的均衡，这样做是很容易导致外国投机资本侵入的。而外国投机资本作为一种短期套利资本，它们的大量流入不仅无助于泰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长期性的经常项目的改善，反而会阻挠这种调整。不仅如此，国际投机资本对于一国的汇率往往具有助涨或助跌的作用，而这正是投机资本大量进入，国家极其容易发生货币或金融危机的原因。

（2）按照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可以通过引进国外资本而加快其增长的速度，然而，这里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到满足；其一是引进的资本必须投向实物产生部门，真正形成社会的生产能力；其二是引进资本必须主要投向贸易部门，以便形成足够的创汇能力来保证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尤其是在引进的资本主要为信贷资本时，这一条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是，泰国与墨西哥一样正在开放资本市场，引进外国资本时就没有按照这两个条件去做，墨西哥在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时期，把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借来的资本主要投到了非贸易性的工业部门，而在改变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内外经济自由化时期，又错误地让国外资本进入非实物的资本市场常由于在以上两个时期，墨西哥引进国际资本都没有能够满足以上两个基本条件，从而导致长期国际收支难以平衡，短期国际收支受制于国际投机资本，并最终爆发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泰国开放资本项目以后，允许它们投到了非贸易的房地产部门，并且也未对国际游资进入泰国的资本与货币市场加以必要的干预。因此，泰国这样做同样没有能够满足我们在前面所提出的两个基本条件，以致终也无法避免早年在墨西哥所发生过的货币与金融危机。

（3）最后，泰国爆发货币危机的必然性还在于其对外开放政策与经济管理体制的不协调。泰国既然开放了资本项目，就应该选择浮动汇率体制，并放松对国内利率的管制，当然，这必须以国内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充足的外汇储备为前提条件，然而，正是因为泰国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这已在前面作过分析），以至在开放资本项目的同时，它又不敢实施自由利率的浮动汇率制，只得继续实行有管制的利率制度与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由于经济开放政策与经济管理体制坚挺，泰国为维持泰铢对美元的一个较为固定的汇率水平，就不得不高估铢的价值，并人为地维持一个较高的利率水平，以

防止泰国本市的过多发行而导致其本市的贬值。但这一错误的做法至少产生了两种不良的后果，并使货币危机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泰币汇率高估导致泰国金融市场投机猖獗；利率高导致国内私人部门不断对外借款。

这两个不良后果的组合，便使得泰国货币危机在劫难逃。

从一错再错的墨西哥到先对后错的泰国，可以看到，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若不能正确地处理好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很容易在外部经济的冲击下发生货币与金融危机；(1) 能否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要素禀赋的变化，及时地调整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经济增长的方式；(2) 当一国为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决定引进国际资本时，能否选择正确的引进方式，如尽可能多地引进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并把它们尽量地配置于贸易部门，以免引起债务危机或国际收支危机；(3) 一个国家如果因储备增加过快而需要实行货币自由化时，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这种储备增加究竟是由短期因素造成的还是由长期因素造成的；然后还要考虑为实现货币自由化必备的经济与金融条件是否具备。

3 的金融危机方面是做得相当成功的，首先，从引进外资的方式来看，除了世界银行贷款等少量的构成国际债务的间接融资之外，我国自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所引进的数千亿美元的外国资本基本上都属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

其次，外国跨国公司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资本主要被配置在实际的贸易部门，按照我国政府的规定，外资在中国大陆是不能参与证券投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不仅如此，外资进入非贸易部门也会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

第三，我国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还对国内的外贸体制与汇率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出口能力，改善经常项目，以保持国际收支的长期均衡。

第四，我国在积极地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把货币自由化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我国货币自由化的进程是极其谨慎的，在国内经济转型未最后完成，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调整，以经常项目彻底改善为基础的长期国际收支均衡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以前，我国正确地选择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这二做法，对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暂时不予开放，从而有效地减少了来自于外部经济的冲击。

第五，在连年大量引进外资，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出现持续顺差的情况下，为减少储蓄在短期内急剧增加所造成的巨大的货币发行压力，我国也允许部分企业进行对外投资。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做法正好与墨西哥和泰国相反，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在经济对外开放。外资大量进入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国内经济迅速增长，储备不断增长，通货自由的经济的发展进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也开始遇到一系列新的，与泰国经济起飞后所面临的十分相似的经济问题。这些新的问题是(1) 由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引起的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 由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持续顺差所引起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3) 由以上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再加上后起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所造成的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的趋势。

面对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认为，中国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应当是调整经

济结构，而不是急于进行货币自由化与经济国际化的改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发生像墨西哥与泰国那样的金融与货币危机，根据日本与韩国成功的经济以及墨西哥与泰国失败的教训，中国的结构调整目标首先应当是迅速地按照已经变化了的要素禀赋实施出口替代政策，以保持国际收支经济项目的长期盈余。考虑到中国的企业制度比较落后，生产技术也不够先进等现实的制约因素，旨在实现出口替代的结构调整完全可以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来进行。

中篇

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所以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是因为企业体制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心环节，它必须和整个经济体制相适应。改革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决定了企业只能采用缺乏自主权的传统国有企业制度。在改革初期，党和政府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的经济体制模式。与此相适应，也就提出了企业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企业体制。因此，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三大”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

为适应这种经济体制的要求，并提出了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目标；在实践上，则对企业采用了承包制。租赁制等多种经营方式。但是，许多人认为，由于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对企业还必须进行计划管理，而且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资产拥有全部所有权，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企业与企业的关系，可以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关系；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仍然只能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关系。

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现代商品经济，它要求有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完善的宏观管理系统。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同样，没有真正的企业，市场体系也难以形成，间接的宏观调控也难以实现。所以，独立的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要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实行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负盈亏，在企业改革上就必须转变观念。转变思路、转变战略、由扩权让利转变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由单纯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转变为重组企业的产权关系；由推行承包制转变为创新企业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重新构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要知道，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

到现在大体上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经济责任制，实行利改税和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等四个阶段。

在改革的前三个阶段，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走的是扩权让利，以利益刺激为主的路子。当然，这绝不是说不需要调整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关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财政上实行统收统支的政策，企业没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经营好坏一个样，挫伤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

性，不调整三者的利益关系，企业就不能产生内在经济动力，搞好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职工也缺乏长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问题是调整利益关系必须以机制的转换为根本前提，离开机制的转换去单纯调整利益关系，不是完全依靠自身的经营努力，而很大程度上要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谈判。而且，由于企业内部没有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当外部约束减弱以后，企业不合理行为就泛滥起来，盲目投资，滥发奖金、财物等。

1986 要求要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中心环节，分阶段进行配套改革，逐步形成新体制的基础框架，使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到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阶段。随后，国务院还颁布了《企业法》的实施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等文件，赋予了企业 14 项经营自主权，这是人人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但是，这一阶段的实际做法是推行和完善承包制，这种经营方式虽然对落实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种经营方式存在着某些先天性的弊病，如政企难以分开、不规范、缺乏平等的竞争环境，竞争受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短期行为严重，资产存量不易调整，等等，它仍然未触动传统的企业制度本身。实行这种经营方式，虽然使企业经营机制有所改善，但是并没有达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目的，企业改革仍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一阶段有开创性的工作是进行了股份制的试点。试验证明，股份公司落实企业自主权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到 1994 年底，我国已经有 3.3 万个股份制企业，其中，有限责任公司约 2.66 万家，股份有限公司 632614 业经营机制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很大变化。国有企业改制成股份公司后经济效益也有大提高。全国有大中型企业 8.51 万家，股份有限公司占总数的 10.65%，1944 年在全国纯利润超过亿元的 226 家企业中，有股份有限公司 63 家，占 27.88%。另外，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均利润为 8.4 万元，最高达到 88.4 万元；人均劳动生产率为 74 万元，最高值达到 346 万元，均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足以证明，不解决产权问题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重塑市场主体，使企业成为完全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经营机制不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就要求企业改革必须从利益刺激为主转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主的轨道上来。所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既为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又标志着我国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央银行实行监督

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按照《中自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实行监管是为了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这就是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直接目的，也就是说，一是促进实现金融业的合法性，保护我们金融业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实行依法经营，依法保护，反对金融行业的一切非法行为，防止金融行业的秩序混乱。二是促进实现金融业的稳健运行，保证我国金融业务的安全。稳妥健康地发展，防止金融业大起大落，避免银行信用危机，宏观失控，微观死板，加强监管，振兴金融。这两个目的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最终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

金融监管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金融机构的合法胜。稳健性进行监督管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

更。终止其业务范围。二是对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进行监管，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结算、呆帐等情况随时进行稽核、检查、监督、三是对国家政策性银行的金融业务，进行指导和监督：四是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五是中央银行自身的内部监督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本系统的稽核、检查制度，加强内部的监督管理”。

（一）金融监管范围。

在现阶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对全社会信用秩序的监管。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上存在着两种信用方式：一种是银行信用，一种是非银行信用。《商业银行法》第79条明确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这一规定表明，对社会办金融的管束已由原来的经济处罚上升到刑事处罚，中央银行的监管手段上升到更高的法律角度，监管职能更加明确和强化，法律依据更加充分。

（2）对金融体系的监管。金融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成份复杂，业务既有基本分工又有交叉，基础不同，发展水平不一，经营效益参差不齐，因而竞争更为激烈，必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督管理，形成规范的。科学的金融体系。

（3）对金融机构准入市场的监管。鉴于当前社会办金融较多的现象，人民银行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批设金融机构，确定市场准入的主体资格，同时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尽可能提高最低注册资本金标准，并保证全部到位；严格法人资格。股东资格审查；严格限定其业务范围，从严格市场准入条件入手，加强市场准入管制。

（4）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对其经营行为的监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金融机构执行法律、政策情况的监管，是对金融机构经营过程的监管。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必须实现由外延到内涵。由数量到质量的转变，把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的结构与质量。管理者的经营水准，资产的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作为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切实维护金融业的稳健运行。

（5）对金融从业人员的监管。对金融从业人员的监管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央银行内部人员，一是其他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

今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人事干预应当列入法律，赋予中央银行对违法金融机构责任人的弹劾和强制调整权，从而为中央银行行使其他监管权力提供补充和保障。

（6）其他监管。

（二）中央银行进行金融监管的原则和手段人行法。商业银行法和票据法的规定告诉我们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监管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 公平性原则。公平性原则就是要求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一碗水端平”。

严格地讲，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公平性还要体现在对金融自身运行环境的保护上，它要求中央银行自觉抵御各方面的干预，铲除其他社会信用对金融的渗透和干扰，建立金融业安全稳健运行的外部环境。

2 界监督之下，金融监管的各项措施。命令和规章也应公开，以增加各项工作的透明度。

3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联系《商业银行法》。《票据法》的有关规定，我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工作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实践中，中国人民

银行的监督管理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1. 法律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之一是发布有关金融监管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从而赋予了中央银行法律监管的权力。中央银行通过制定部门规章，规范各金融机构的管理制度和业务制度，运用法律的手段监督、管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监管力度。

2 附，缺一不可。经济手段作为中央银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金融监管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对金融业自身，社会违反金融法规。法律的经济处罚条文非常明确、具体。

3 地，作为金融执法机关的中央银行，其监管手段也要随之变化、提高。因此，探索有效的监控操作程序和内容。

以现代化手段预测、分析，监管金融业应是当前中央银行工作的重点之一。

4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要求金融机构按规定报送资产负债表。操作效益表以及其他财务会计报表和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有责任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金融统计数据，报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以此掌握情况和信息，科学决策。

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是反映商业银行经营特征，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行为准则。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基本原则，一般都是由《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了的，也集中体现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实质，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结算业务均应严格遵循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原则。

《商业银行法》第 4 条明文规定商业银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此三性原则是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基本原则。第 5 条规定商业银行与客户往来，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第 9 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

三、实现政治变革

改革政治体制，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作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它不仅是“第二次革命”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及时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方针。并有计划、有步骤、有指导地推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和民主法制的建设，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总结近 20 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将现阶段乃至下个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对现阶段乃至下个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的战略部署，将建设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978 年 12 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将会被葬

送”。据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

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候：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 1980 年 8 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的纲领性文件。

这篇指导性文献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深刻地揭露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分析了产生这种弊端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在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同时，还要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良好的政治保证。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强调指出：“领导制度。

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及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和现行体制的重要弊端，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这种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党的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实行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克服这些弊端，只有果敢地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兴利除弊”，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善党的领导、完善民主集中制、改革人事制度的干部制度、调整机构、下放权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认为，党的十一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和重要措施作出了重要部署。

从 1986 年 9 月到 1987 年 9 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谈话，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指导方针。1986 年 11 月，邓小平同志会见外宾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就是始终保持党

和国家的活力，重要的是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

这个目标 15 年内完成就很好了，十三大要前进一步，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这个期间，邓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1. 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的。“总的目的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

2 的实际出发。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论多党性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便利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

3 走。”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规划蓝图，分段实施。要因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4 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围绕这个目标，党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各项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党中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苦复杂的任务，“必须采取坚决、审慎的方针，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展开，尽可能平衡地推进。在旧体制的交替期间，特别要注意防止工作上的脱节和摩擦。各项改革都要注意试验，鼓励探索，注意找到切实的过渡措施和办法，做到循序渐进。”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政治。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十四大以来，我们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等职能，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中的作用。

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抓紧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法律和法规。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加强执法监督，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水平。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所有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使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为巩固稳定的社会政治

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发挥重要作用。

下篇

一、反思“米袋子”

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是中央对我国粮食管理体制进行的重大改革。粮食部门在实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粮食企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一）值得重视的三个转变 1 年，“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正式实施。各级政府加大力度抓粮食生产，1995 年和 1996 年，我国连续两年获得丰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增长的第三个高峰。粮食的丰收和其它有关的因素奠定了解决我国 12 亿人口吃饭问题的物资基础。一是农民家有余粮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二是中央粮食储备已超过历史最高纪录，地方储备也普遍增加。三是这两年国家较大幅度提高定购粮食价格，我国市场粮价已与国际粮价基本持平，进口粮食增加充实了国内市常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消费与供求结构性矛盾显得突出。尽管我国粮食供求形势在今后一段时间总体上仍处于紧张平衡状态，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粮食相对过剩与短缺。买难与卖难的交替发生是我国粮食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特点，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下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使政府对粮食的调控由量的调控向结构、品种的调控转变将成为一个新特点。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粮食经营的放开，使粮食部门一家独占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粮食的多渠道经营，多主体竞争，给粮食市场带来了五彩缤纷的局面。国有粮食部门原来独立承担的确保市场供应的责任制，被众多的不同经济形式的粮食经营者在追求经济效益前提下客观地分担。粮食部门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不得不从“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清高位置上走下来，为争取市场，谋求生存，增强发展后劲而投身于市场的大潮之中。粮食部门工作重心的转变和正常情况下市场责任的“减轻”，给“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下的粮食流通企业保持和发挥调控市场的主渠道作用提出了新课题。

3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下的国有粮食部门，从稳定市场的职责出发，经营粮食“保本微利”，不可能由此积累发展资金，增强实力。但是，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占领市场，又必须凭借雄厚的实力基础。这就要求国有粮食部门必须在坚持粮食本业经营为主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形成资本积累，发展和壮大粮食经济。随着粮食部门两条线运行机制的建立；各级粮食部门把发展粮食商业性经营作为发展粮食经济的重头戏来抓，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说明这个经营方向的战略性转变已经得到了各级粮食部门和广大粮食职工的认识和接受。从保持政府对粮食调控的有效性和全面发展地方经济等多角度出发，关心、支持和促进粮食市场发展壮大，似乎也应当成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当前存在的三个问题 1 界定，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省一级政府负责的主要内容是：保证稳定粮田面积；提高粮食单产，增加粮食总产；收购掌握 70%—80%的商品粮源；建立和管理粮食风险基金；完成地方进出口粮食任务；安排好当地粮食市场，确保供应，稳定粮价；组织省

间粮食调剂等。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政府承担的责任，主要是从抓生产。求平衡、保市场的角度，即粮食少了怎么办的角色来确定的，而对粮食丰收产生相对过剩情况，政府该如何调控的责任则没有明确。国家的宏观调控，应该是利用一定的手段和措施，使社会所拥有的对象实物总量与结构趋于合理。多了。少了都不能认为是合理的，都应在调控的范围之内。从去年以来出现的粮食调销不畅，胀库、压库负债重的情况，就应当列入政府的责任范围，通过采取适当的调控手段来予以解决。

2 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共同解决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地方的责任，在省一级，是省长的职责。在省以下，是各级政府首长负责制。没有各级政府首长的负责制，“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就是空的，各项调控措施就得不到落实。

但是，在实践中，有些地方确实又存在责任难落实的现象。比如前两年粮食相对紧张时出现的粮食“调拨难”，地方性的利益关系和行政的不合理干预，抵消了上级政府的调控作用。还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出现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争占土地的现象，擅自搞开发区违法占用土地的现象，粮食部门出现“卖粮难”无人过问，沉重负担企业背的现象等等。这些现象，有的是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有的影响到粮食的正常流通和地区范围的总量平衡，也影响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3 补败。按照国务院关于粮食部门实行两条线运行的改革精神，省长负责制下的地方性粮食政策性业务所需要费用，由地方财政按量拨补，或通过粮食购销差价解决。本省大多数地方是采取后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在粮食购销价格有一定差价的情况下，除能应付正常开支外，粮食部门尚有少量盈利，利于发展生产经营或向地方财政作一些贡献，但是从去年国家较大幅度提高定购价格，而销价因种种原因到不了位的情况下，粮食购销价格倒挂，粮食企业不仅没有盈利，而且正常的利息和费用也得不到补偿：产生了巨额的政策性业务亏损，由于相当一些地方政府掌握着粮食的实物量指标，而并未把粮食财务纳入当地财政和预决算范围，政策性亏损根本得不到财政的补贴，一些中央和省级政府给予的一些政策也难到位。更有少数政府的领导还错误地认为：粮食部门业务是由省里，中央管的，亏损再多也是国家的，也会得到国家补贴。因此不仅不解决粮食企业的亏损问题，反而还伸手向粮食部门要钱，使粮食财务的包袱越背越重。

（三）完善粮食流通体制的几点思考 1 加强政府对粮食的调控责任。

二、投资与通货膨胀

投资体制，在我国一般是指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的总称，它主要包括投资主体行为、资金筹措途径、投资使用方式、项目决策程度、建设实施管理和宏观调控制度等内容。投资体制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对我国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投资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其目的就是在保持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有效调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投资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它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投资体制改革在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中处于中心地位，投资体制改革取得成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保证。

第五章 奠基百年

上篇

一、世纪末的重要决策

1978“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这不仅奠定了新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也带来了科学技术工作新的春天。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大大解放了科技界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推动城乡改革逐步开展，形成了全国性的改革开放大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研机构进一步向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方向发展，同时也涌现出大批非全民所有制的民办科研机构，广泛从事各种类型的技术经济活动。民办科研机构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形式，具有全新的运行机制，对促进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进入长入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科研机构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是，由于政策不配套，管理制度不健全，以及受社会主义经济环境的影响，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把这些技术经济实体与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严格区别开来；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划清所有制的属性，理顺资产关系和责权利关系，加强管理。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还进一步加强了技术市场管理机构、中介机构、仲裁机构，逐步实现了管理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20年的科技体制改革使我国科技工作旧貌换新颜。

另外，确定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地位，培育技术市场，这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突破，也是社会观念的一大更新。通过实施《技术合同法》、《专利法》和开拓、培育技术市场，确立了技术成果的商品地位，建立按价值规律、以合同形式有偿转让的市场调节机制，为科学技术成果的研究开发、应用注入了新的活力，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国技术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健康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3上。技术作为商品通过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以及技术入股、技术经济承包等多种形式，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的广泛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据统计测算，目前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率已从改革前的20%—30%，提高到50%—60%，技术成果应用于生产所创造的产值是技术交易额的10—15倍。

随着技术市场的发展，国家对技术市场的管理不断加强。根据《技术合同法》及其实施细则，健全了技术合同制。规定了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和服务等各种技术交易的基本规范和准则，加强了技术市场管理，建立健全了技术合同管理机构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制度，全国技术市场正处于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

二、科技第一，教育为本

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1.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与任务。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的基础上，保持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 8%—9% 的速度增长。具体目标是：(1) 继续以保证粮食。棉花持续增长为重点，促进林、牧、渔各业全面发展。粮食产量将达到 5 亿吨；(2) 一次能源产量达到 14 亿吨标准煤，发电量增加 13000 亿千瓦时左右，特别要发挥水电优势，发展热电联产以及核电；同时大力推进节能工作，使年节能率平均达 3% 以上；(3) 铁路、公路、水运和空运组成综合运输体系，铁路货运量要增加到 21 亿吨左右，沿海港口吞吐能力达到 11 亿吨以上。以发展长途电话自动化。提高电话普及率为中心，形成方便的通信网络；(4) 钢产量达到 1.2 亿吨以上，化肥达到 1.2 亿吨左右（标准肥），乙烯产量发展到 400 万吨左右，产品质量也要全面提高；(5) 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力争科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目前的 30% 左右提高到 50% 左右。

2 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

根据《中国 21 世纪议程》，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扩展目标是：(1) 努力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改善人口结构，在 2000 年前力争将人口增长率控制在 12‰（配制度）同时引导适度消费。(2)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致力于文化的革新。(3) 发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改善政治和社会环境，保持全社会的安定团结。(4) 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开展职业培训。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5) 发展城镇住宅建设，同时改善城乡居民居住环境和提高社会综合服务及医疗卫生水平。(6) 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特别是各级领导人员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实施能力，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建设。

3. 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目标与任务。

中国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侵害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预防和控制环境破坏和污染，积极治理和恢复已遭破坏和污染的环境；同时积极参与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活动。到 2000 年，使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到 2000 年的具体目标如

下:(1)工业废水排放量控制在300亿吨左右,工业废水处理率达到84%,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20%左右;(2)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2100~2300万吨,工业废气处理率达到90%,城市居民燃气化率达60%,集中供热面积达到4.7亿平方米;(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45%~50%,控制有毒有害废物污染;(4)交通干线噪声等效声级维持1990年水平,城市环境噪声达标率比1990净增有林地面积19万公顷左右,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15%~16%左右;(6)预防和控制荒漠化扩展;加强水土保持工作,今后每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万平方公里;(7)保护耕地资源,控制建设占用耕地,2000年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22亿公顷,扩大耕地面积,1991国土面积的7%;同时注意保护所有自然生态系统。

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十分光荣而艰巨,必须切实地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把科技、教育放在优先发展位置,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科技投入,到2000年使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科技工作的领导,并设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不仅十分必要,迫在眉睫,而且具有坚强的科技、教育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日趋雄厚的科技、教育实力是科教兴国的前提。

建国以来,我国已建立学科门类齐全的科研体系,形成了2500多万人的科技、教育队伍,其中230多万人从事科研活动。每年取得3万多重大科技成果,批准3万多项专利,十年来,科技体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我国80%以上的科技力量已投入与经济相结合、自主发展的道路。已取得两弹一星、杂交水稻、HJG—04大型程控交换机、曙光高性能并行计算机、工业机器人、生物免疫和医药、200兆瓦低温核供热堆、功能材料等一大批在世界领先,市场前景广阔度有望形成大产业的成果,并取得象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清洁生产技术等可促进整个行业技术升级的高技术成果。高新技术开发区年产值已达580亿元,比上年翻了一番。民营科技企业产值、利润每年以30%—50%的速度增长。科技在农业经济增长中贡献额已达到30%左右,在整个经济增长中贡献额也达30%左右,而且在不断增加。日益壮大的科技实力,是科教兴国的前提。

2,社会主义制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全社会力量为办几件大事提供了根本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科技工作的方针和政策。1985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1年发布了《科技进步法》,这些法律、文件都是科教兴国的根本保证。

3.30个省(市)实施科技兴省(市),为科教兴国奠定了基础。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各级政府依靠科技的自觉性逐年提高。全国已有30个省(市、自治区)颁布了科技兴省(市、区)的决定规定或条例,全国520余个城市中,已有300一些经济部门也提出了依靠科技振兴部门经济的计划,科技兴农已提出10年了,科技兴化提出4年了,许多厂矿还提出了科技兴厂,兴矿的计划,这都为科教兴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科教兴国国策的实施,必然使这些科技活动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富有成效,必将掀起一个依靠科技振兴经济的新高潮,开拓新局面,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富民强国。

4. 亿万人民呼唤科技是科教兴国的社会基础。

计划生育，少生孩子，环境保护部门花钱为大众创造优美环境，群众接受起来都比较困难。而科教兴国，应用科技成果则是一件“用他人之水，肥自己之田”的美差，民众乐于为之，因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成熟，靠假冒产品，靠仿制别人产品、靠不正之风赚钱的方式，必将退出历史舞台。靠大量劳力、资金、资源消耗来维持的生产，也将逐步让位于以技术集约、管理集约为主导的内涵式、集约式的经济模式、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使数代科技工作者报国为民的夙愿，得以更加充分的实现。亿万人民正在不自觉、自觉地认识到这一客观规律，广大农民把科技人员视为财神，不少城市重奖科技人员。上海民意测验表明，最受尊敬的职业是科技工作。亿万人民自学成才。

望子成龙已蔚然成风，学科学、用科学、盼科学的热情日趋高涨，给科教兴国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百年树人

在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年时间里，我国教育曾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绩，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经济迅速地由计划体制转轨到市场体系的过程中，教育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如果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得以解决，不仅会影响教育自身的发展，而且还会影响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因为，20世纪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在现代化的条件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而各国之间的竞争又最终将归结为科技、人才和教育的竞争。

（一）教育如何全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问题如何全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当前我国教育所面临的最紧迫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表现为如下若干个基本方面。

1 调一致起来。

234 在实践中脚踏实地地贯彻下去。

（二）思想品德教育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必然会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的变革。因而从封闭状态转向开放的状态，从一种经济运行体制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体制，正是整个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当前的思想品德教育正处在这一时期，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特别是学校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当前我国在思想品德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 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开放时代的思想道德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2 法，德育效果差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三）农村教育问题我们之所以把农村教育列为跨世纪前后我国教育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出于两种考虑。

一是农村和农业问题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涉及国家稳定和全局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农村教育将在其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是农村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当前教育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在农村有突出的表现。

12 当艰巨。

34 (四) 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问题职业技术教育近些年在我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1 (五) 成人教育的改革、发展和提高问题 1 念和思路,还没有全面建立起来,整个成人教育的结构和发展节奏与社会需求发生错位的现象还相当突出。

23 (六) 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教育经费短缺是当前我国教育所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和紧迫的任务。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教育经费短缺的状况,并非但不能适应加快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甚至难以满足现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需要。据国家教委发布的《1993 年教育事业统计公报》,近年来,教育经费紧缺,学校公用经费所占的比例连年下降,不少省市都出现过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现象。1993 年全国中小学危房比例虽然比上年略有减少,由上年 1.97% 下降到 1.96%,但农村中小学危房的比例已经开始回升。由上年的 2.19% 提高到 2.27%。另据统计,由于经费短缺,使全国 73% 的中学和 90% 的小学未能按教学要求配齐仪器设备,1500 多万平方米的危房未能修缮。同样是由于教育经费短缺,使教育系统教职工的平均工资,在全国 12 个主要行业中,长期徘徊于倒数第 2 位左右。笔者认为,在教育经费的筹措、调配和使用上,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1. 如何进一步强化教育投资意识,使教育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234 育浪费。

(七) 有偿教育问题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正在逐步推行有偿教育制度:即所有学生一律按照统一的录取标准和收费标准入学。这一重大改革举措已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能否很好地解决它们,将直接关系到高校招生和办学制度改革的成败。这些问题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1 阻碍着这一改革的深入进行。

234 (八) 教育竞争问题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领域内的竞争愈发为人们正视和关注。然而,目前我国的教育竞争还处于自发、盲目的状态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较长时期内我国教育竞争机制能否顺利形成和运行。归纳起来,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234 (九) 教育效益问题教育资源的奇缺在我国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有限的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发挥出最佳效益。因此,笔者认为教育效益问题是中国教育界面对现实走出困境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23 (十) 民办教育的发展问题在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消失了几十年的民办学校再度复兴并蓬勃发展起来。但它在发展中,还面临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123 中篇一、任重而道远第一,从历史发展进程看,“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规划,是一个跨世纪的规划,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抓住这一时机,发展科技技术,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在世界舞台上所处的地位,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 1994 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科技进步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也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长期规划,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第一个中长期规划，所以，在编制规划思想、方法和内容上，以及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上，都要赋予新的内涵，与历史上的几次规划有实质性的差别。

第三，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发布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明确了今后一个较长时间的科技发展方针政策、目标和任务，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要充分体现党中央、国务院的意志和全社会对科技发展的期望。

第四，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确定了实现两个具有历史和全局意义的转变。这是促进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的根本战略，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要充分体现科学技术在转变中的价值，并能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五，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已经十分明确，并且已经摆在科技界面前，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要努力做出切实的贡献。

总之，制定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是在一个环境十分有利、任务十分繁重、具有挑战性的形势下进行的，这就是与前几个五年计划制定的不同之处。科技发展“九五”计划的历史条件和客观要求不同，所以在计划规划编制的方法和步骤上都有大的改进，吸收了过去编制计划规划的成功经验，又创造了一些新的做法。在组织机构上，成立了国务院领导下的部际协调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提高了编制规划的权威性，为科委、计委的密切合作，创造了组织保证。在具体操作上，针对国民经济中的重大科技问题，进行了专题和专门研究。除科委相关司牵头负责外，不少专题由计委、经贸委等共同牵头，如计委的产业政策与长远规划司、财金司、科技司、农经司、国土规划和地区经济司，经贸委的技改装备司，财政部的公交司、文教司，国家统计局的社会司等均作为不同专题的牵头单位。这样使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有较好衔接。

在编制《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期规划纲要》之前，花了约半年多的时间，比较集中地研究了10个专题：1. 国民经济建设重大工程及其主要技术的选择；2. 研究和基础工作；7. 关于我国的科技投入问题；8. 建立新的科技体制；9. 切实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10.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

这些专题在研究过程中，从分析形势入手，着重考虑了面向经济、服务经济和提高科技自身水平两个方面的工作，重点提出了“九五”期间的目标和任务。各部门、各省市都重视和支持专题采纳。可以说这些专题以对形势的分析比较客观，目标任务比较明确，为编制《规划纲要》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次规划的编制，正处于全国科技大会前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发布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我们努力在规划中体现《规定》的精神。

二、最宏伟蓝图

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历史性转折点上，将从现在走向新世纪的未来。可是，“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走向未来，就是要架设通向未来的桥梁，实现从现实向未来的转变。对于 21 世纪的中国和中国教育来说，这种转变更具有深刻的、历史的内涵，它将经历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深刻变革。因此，研究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教育，既要展望和预测其未来走向和理想目标，更要着重探讨从现实走向未来将经历哪些转变？我们该为这种转变做些什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 21 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基本保证，两者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教育现代化，以教育现代化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发展 21 世纪中国教育的基本立足点。如果说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到本世纪末，经过曲折的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框架；那么，进入 21 世纪，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这就是跨世纪中国教育的总体性转变。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过程。教育现代化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实现的教育系统和教育制度的全面进步，其核心是培养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社会主义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这种双向连结表明：教育现代化就是通过培养人，最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从 8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和改革，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困境，这是工业化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急需人才）与资金紧缺（教育投入不足）这个经济建设主要矛盾在教育上的集中反映。这个矛盾在工业化过程中会持续一个时期，教育仍将处于经济和人口的两极推动和双重制约之中，加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年轻型人口结构就业压力增加，这样，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同有限的财力供给之间的矛盾将会继续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估计会在基本实现工业化阶段后有所缓和），加上社会二元结构带来的社会知识差距，更使教育面临一系列两难选择：1. 在战略地位选择上，教育发展与经济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 70 年代发表的《学会生存》中就提出了著名的“教育先行”的观点。这种观点为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所证明，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世界银行在其 1990 年到 1991 年这两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都具体举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得出结论：“教育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使其他发展目标得以实现。”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不足，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要以较短时间走完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现代化路程，只能依靠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把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而我国现在的教育投入水平远不能保证教育的优先发展，1990 年人均公共教育经费约合 8 美元，世界平均约 220 美元，平均公共教育经费 48 美元，世界平均 1230 美元。没有必要的教育投入，教育现代化就没有基本的物质保证，要在确保教育投入上体现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作出具体选择：在工业化时期，把教育列为基础设施建设，同基础设施同步超前，为经济起飞用好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准备；工业现代化阶段，教育同科技同步超前，为经济起飞作好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准备；教育发展同科技进步相辅相成，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经济增长集约化，并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2 总需求由于经济加速发展、结构调整提高、城市化过程以及人口因素等可持续增长；而教育总供给的增长却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及国民收入分配等因素的制约。在这种供求关系下，教育发展目标就存在需求导向和供给约束这种两难选择。前者会满足于一时的数量增长而牺牲持续协调发展，后者，则会使教育严重滞后而影响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应起的作用，这就要寻求一种使两者积极的、动态的平衡，即尽力扩大社会教育总供给，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有效的教育需要。

3 及和提高双重任务，不过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侧重。在基础教育尚未普及的时期，要把普及教育作为发展的重点，满足人们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而在普及教育之后，则逐步把提高作为重点，包括提高教育程度，直到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提高教育质量，促使高质量教育，在努力办好所有学校的同时，重点建设少数高质量、骨干性学校等等。把握这些关系的“度”，是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策略原则。

4 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它的实现程度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联系，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在现阶段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公平首先体现在满足社会成员基本学习需求，保证义务教育的入学机会均等，并尽可能为更多的人接受更高级教育提供公平的机会：在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种教育，则依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选拔有条件入学者接受更多的教育，即在入学机会上采取竞争性入学、择优培养的原则。以后，根据经济和社会可提供的条件，将在教育程度，教育质量上提供更为公平的机会，进一步缩小和消除知识差距。

5 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据预测，在 1995~2010 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比例为 1.5:1，不同地区教育发展和将来所面临的问题和条件也不相同。实行区分规划、分类指导，从各地实际出发确定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经济上地区之间梯度发展格局对教育发展有影响。但是，教育受资源、区域和基础设施的制约较小，只要具备起码的办学条件就有普及教育的可能，尤其是教育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要适度向前发展。因此，教育的区域发展应有自身特点；在改革政策选择上向发达地区倾斜，让这一地区进行超前改革试验，积累经验，带动欠发达地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投资政策选择上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力争逐步缩小区域知识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和区域教育的协调发展，最终共同实现教育现代化。

三、当务之急

近十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完善，各种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组合，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大一统的教育，面临着许多严峻问题。

（一）教育管理体制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目前仍是教育计划管理体制。

教育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制性，也就是从事的一切教育活动必须按计划进行。这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可行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显得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系统的运行与

市场机制无关，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系统（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运行中，市场机制通过劳动市场人才市场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和影响着教育的规模、结构和人才的数量、质量。

这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压力要求学校及时地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诸如学校的招生。学生的就业、教师的招聘等要适应市场的人才需求。而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却仍然很大程度上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运行，国家包得太多、政府统得太死的局面并未有根本性的转变，在非义务教育阶段许多重要环节仍在大框架中进行。例如在招生上，市场经济建设急需的一些专业想多招学生但无法多招，而社会需求不多，甚至毕业生已难以分配的专业却还在源源不断地招。教育管理权力的过份集中，难以调整千变万化对不同局部的需求，这势必造成人力、财力和物资的浪费。市场经济要求人才的流动，也就是允许人们的择业自由，而现行的毕业生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人们的择业自由，如在每年的毕业生分配中，都有一条硬性规定，对不服从国家分配的学生取消分配资格。如果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感兴趣，很难对它尽心尽力，尤其是在我国各行各业普遍对劳动者工作态度缺乏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二）教师队伍后继乏人世界上国民教育搞得比较成功的典范当属日本。日本搞好教育的三大法宝（师资问题、教育立法、教育投资）之一就是抓好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日本，教师是最受尊重的职业之一。

一个教师职位，要引起几十甚至上百人的竞争。而我国，愿意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高素质人才却寥寥无几。现在在教育系统供职的人员，有相当数量是初分派到岗位上的，并非出自志愿。从报考高校的学生填报的志愿与师范院校计划招生的比率看，亦呈下降趋势，据对全国 14 个比率还不到 1，如黑龙江省 1992 年师范院校计划招生 5814 人，而第一志愿报考师范院校的考生为 5067 人，仅占招生计划的 87%。华南师范大学 1992 年计划招生 113 人，仅占录取总人数的 10.8%。尽管师范院校在录取分数、学习费用等方面有些优惠条件，但仍没有改变这种师范院校招生难的现实。即使志愿报考师范院校的考生，其各自的心态也是比较复杂的，有因自身学习水平不高担心考不上大学的，有因家庭生活条件比较困难的，等等。就是师范院校的学生到了毕业分配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拉关系、走后门力求改行，而国家制定的师范院校毕业生改行须交回培养费，从反面也说明了在我国搞教育的人不被社会重视，当教师不被人们羡慕。现实也是如此，全国师范院校的生源日渐萎缩，毕业生改行的日益增多，就是改行不成，也要设法留在大城市，造成农村中小学教师严重匮乏。北京师范大学初中教师供求预测课题组的预测结果表明：1990—2000 年这 10 年间、设计的 7 种方案的平均值是：农村初中教师净缺口累计达 62.11 万人，年净缺口 6.2 万人。农村的小学情况更糟，大量的不符合师资要求教员有 300 万人，约占小学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农村中学毕业生当中学教员、高中毕业当高中教员的现象屡见不鲜。除此外，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原在职的教师，尤其是大中专院校的中青年教师，相当一部分人弃职经商也有被急用人单位用重金挖走的，如师院的外语教员奇缺。这些，导致教育人才大量流失，教师队伍不稳和后继乏人的状况日趋严重。这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不说是提出了一个相当严峻而又紧迫的问题。

（三）教育投资增长缓慢教育是国家的事业，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民

族的盛衰。近现代世界上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一条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大力发展国民教育，舍得在教育上花本钱，其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一般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且保持这个增长的持续和稳定。

我国对教育的投资，近年来虽在一定程度上呈递增趋势，预算内教育投资平均增长 12.8%，以 1990 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1.4%，受高中教育的是 8%，文盲、半文盲的绝对值为 1.8 亿，且每年仍以 200 万人的速度递增，而日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 36%，受过高中教育的为 95%，相形之下，我国教育落后的程度可想而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其增长部分，往往要被物价上涨（相应的货币贬值）和新增人员的工资开销等因素所抵消。如高校新增人员的工资就抵消了对高校教育投资增长部分的 77.7%，真正投入到改善教育环境（校舍、教育设施等）方面的资金几近为零，甚至出现负增长。小学教育事业费从 1985 年的 19.11% 下降到 1989 年的 16.3%，中学从 31.62% 下降到 24.8%，轮到在校学生的人均公用经费，中学只有 24.27 元，小学只有 3.25 元。

我国的教育经费开支，若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看，并无增长，而是在徘徊，1952 年为 1.52%。至 1980 年缓升至 2.55%，而 1988 年又降为 2.37%。而美国、英国、日本三国的公共教育投资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1980 年分别达到了 8.1%、7.5%、7.2%。在这里，不仅仅是数字比率上的差距，还有国民生产总值在总量上的差距，三者合起来，便可明显地看出我国在教育上的投入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是何等的悬殊。也许有人会说，我国经济不发达，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搞教育。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给自己在教育上的短视寻找借口。就是与世界上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相比，我国也低于这些国家的平均 2.6% 的比率。由于我国长期在教育投入上的不足，现已严重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并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如目前经济建设急需的人才短缺，劳动者素质较差，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不强等，就是突出的表现，此外，从政治上讲，它影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因社会成员文化素质偏低），本来我国的教育基础就比较薄弱，再加上需接受教育的人员总量大，教育的负担重，压力大，长期维持教育投资的低速增长，将无济于教育的改善发展，经济早日实现腾飞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四）教师素质现状堪忧《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建设一支具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长远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运行规律的客观要求。我国各类学校的教师，其素质从目前看已呈下降趋势。据 1991 年统计，小学教师的 19.75%，初中教师的 48.2%，高中教师的 52% 提到的初中毕业教初中，高中毕业教高中的现象。在高校，以北京地区为例，大部分教师知识面还不够开阔，开课能力有限，其中青年教师 74.8% 的人不能开设两门课；有一半左右的青年教师周教学时数不到 6 个；教育科学理论功底不扎实，教学研究意识和能力不强，教学经验不丰富，有 60% 左右的青年教师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科研课题；98% 以上的青年教师没有出版过专著；90% 以上的青年教师没有在国内一级刊物或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获各级科技大奖、发明奖的青年教師更是屈指可数。我国教师队伍素质的这种现状，已严重影响到我国各级各类学

校的教育质量提高。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各行业的竞争愈演愈烈，竞争的焦点又大都集中在人才和知识上，因此，各行业对教育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问题的根源是在教师素质上。那么，影响我国教师素质差的原因在哪里呢？首先是我国教师的社会地位偏低，有人做过“您最喜欢从事的职业”的问卷调查，对于可选择的十二种职业，被调查者表示愿意从事教师职业的人数最少。偏低的社会地位，使得高素质的人员很难向教师队伍充实，原来在教师岗位的也有相当部分改行。这种差来好走的循环，是导致教师素质日渐下降的根本原因。其次，由于教育经费不足，教师的进修和再培训计划很难得到落实，或受师资数量不足而顶班下不来，没有机会进修。第三；教育管理体制对教师缺乏激励机制。教师素质的高低对教师的工资，晋职晋级等影响不大，教师身上无压力，使得教师缺乏上进心和敬业精神。

（五）社会分配不公产生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有些法规尚不完善，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不尽合理，脑体倒挂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与全全国营企业职工平均收入相比，以 1990 年为例，教师的平均工资收入也低 8.86%，在国民经济 13 个部门中居第九位。而小学的民办教师的平均工资只有公办教师平均工资的一半。这种分配不公的现象，给教师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深刻的，它使教师的心理失衡，甚至震撼了教师和学生的价值观。千百年来教育神圣的光环日见暗淡，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现象有增无减。以上海高校为例，1987 年为 1259 人，到了 1991 年增加到 2249 人。

虽然我国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问题不少困难重重，但我们也不应该失去信心。国家已经把发展教育作为百年大计，从战略的高度把它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这就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前提条件。教育为非物质生产部门，它周期长，见效慢。因此，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面对现状，国家应真正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快对教育的改革步伐，全面地、切实地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改善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条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加快教育立法，使我国的教育事业相对于经济建设有一个超前的发展。

四、令人担心的现状（一）大力推动科技进步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市场经济是科技进步的活土，科技进步的速度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关。可是，由于我国商品经济素不发达，解放后，又被计划经济束缚了几十年，虽然近 20 年改革开放使我国科技进步出现了转机的好苗头，但从总体看，我国尚处在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过渡的起步阶段，经济对科技的需求还是浅层次的，局部的。

一是我国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没有形成，旧体制的惯性很大，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模式、新体制，与旧模式、旧体制形成尖锐的矛盾。谁都知道，在 70 年代以前，科技成果是无偿地向生产单位提供。

80 产品、新工艺。可是，当科技人员把成果送上门时，有不少企业家又瞻前顾后，摇摇摆摆，积极性不高。

正鉴于此，出现了文物拍卖市场看好，而科技成果拍卖往往只有三分之一的成果有人问津。1992 年初在深圳搞的那次技术成果拍卖会就是如此，有人提出能否通过炒卖使科技成果香起来，当然可以试一试，能否如愿以偿

还很难预料。

二是我国在 80 年代中期具有短缺经济的许多特点。有人对某市当时上千个产品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企业追求的主要是产量，这是计划经济的特点。只要实行计划经济，问题就不会得到很大的改观。在 1988 年以后，我国一跃而成为买方市场，只要有人买就有人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技术的影响，很多企业怕风险，科技成果还是滞销。

三是价格扭曲，优质不优价。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许多以次充好，通过种种手段把次等产品用高价卖出去；而另一方面，即使是优质产品，如果不采用相应的措施，也同样卖不出去。优质不能优价，这些问题非常严重。

四是政策不配套，管理水平低，经济秩序混乱，许多企业可以通过种种非技术进步的手段求得生存和发展。

由于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停留在口头上的多，落实在行动上的少，企业有效需求不足，是科教兴国的严重障碍。

（二）科教兴国需要全面打总体战与协调困难的矛盾依靠科技进步与人才开发来振兴经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从全社会的规模上统筹，协调教育、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规模、结构、速度和水平，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模、结构、速度和水平相匹配。为此，既要做好系统与环境，即中国与国内外的“协调”，又要做好各部门、各战线上下左右的“协调”，使中国对物质、能量、信息、时间和空间的利用率最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打好科技兴国总体战。

但我国条块分割的旧体制、各自为政的不良作风割裂了教育、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双轨运行，使它们之间的协调十分困难。中国的现实是分工有余，协作不足，内耗丛生。

外协调困难，内协调更困难，是科技兴国必须解决而又很难解决的一个突出矛盾，制定一个科教兴国方案固然不易，有效实施这个方案更难。

（三）科教兴国需要打持久战与不少短期行为的矛盾科教兴国决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根本战略，要求上下左右历任干部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但是，我国的干部任期制导致行为短期化是一个通病。本来，干部任期制是世界上最流行的做法，在国外并没有发现因此带来显著的经济与技术的短期行为。可是，在我国由于政治与经济密切联系，形成一体化的旧习惯，使政府人事变动严重影响经济活动。

同时，我们有些干部的自我任期目标不是如何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几件好事，而是如何搞几个短、平、快的项目，快见成效，经济上能早点得好处，政绩上也能早日表现出来，引人注目。由于这些心理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起步阶段困难重重，步履艰难，效果不理想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进入良性循环之前）比传统战略效果还差，反映强烈威胁到个人的升迁和荣辱时，能否持之以恒地实施这一战略？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制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并努力探索，付诸实施，但要有措施保证各级的下一任领导会按既定方针办。

（四）科教兴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与资金短缺的矛盾 1985 科学技术拨

款，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速度逐年增加”。10多年过去了，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已由1984年的6.1%下降到近几年的4%左右。在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仍占科技总体投入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种下降必然导致R&D占GNP（即研究开发经费比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回落。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P&D占GNP的比例，1985年为0.84%，1991年为0.72%，1993年为0.62%，1994年降到0.5%。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也呈大幅度下滑趋势：1992年为2由于财政对科技投入比例降低，致使科研单位和科研工作出一系列问题：一是“生计”负担沉重，无力顾及事业。据有关调查材料反映，从事公益事业、技术性社会服务和社会性基础工作的第三类科研机构中，有近半数单位用于工资、公务、医药费方面的开支占总开支的1/2以上，其中工资类开支占总支出的20%以下，最高的达44%。加上离退休人员多达20%以上，费用开支居高不下，生计负担日益沉重，致使用于业务工作的费用已经所剩无几，科技方面的正常工作都难以维持，何况发展？二是自我求生能力弱，事业发展的后劲差。实行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不少科研院所纷纷“下海”、“断粮”，企望“放开搞活”，反而“活不成”。某省19个研究所创收的绝对额低于50万元的12个所，占63%，其中有50%的单位人均创收额在2000元以下，还不够工资开支。如果单纯依靠创收维持开支，将有14个所的经费缺口达百万元；三是情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滑坡。近几年来，某省11个科技情报所中，有6个所的文献费每年不足60万元，最低的少于10万元。在事业费中自行安排文献费的7个所，文献费均不超过55万元，最低的两个所仅10万元。由于国家拨款严重不足，文献价格暴涨，已经使各情报所的文献优势丧失殆机。这种状况如何使科技情报信息事业发展起来？四是科技长入经济的难度加大。由于经费原因，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大大减慢。1993年，某省176个县以上自然科学与开发机构，全年共开展各类研究与开发课题2371个，投入经费9.6亿元，完成项目833个，取得科技成果365项，实际已得到生产应用的223项，占成果总数的63.8%。

1994年现实生产力的有12项，占42.9%。

总之，逐年下降的科技投入，妨碍、制约了科技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经济基础和科技基础都很薄弱的地方和单位发展科技的难度更大。可见，增加科技投入，对于实施科教兴国、科教兴盛科教兴市战略，至关重要。

（五）科技成果多与新优产品少的矛盾全国每个省大都有各类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所属科学研究机构和技术开发机构200来个，科学咨询、开发、服务机构100多个，自然科学和技术协会400个左右，但这些科学研究的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相应的经济优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差。

全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根据这几年的统计，某省自1987年以来每年的科研成果数目相当可观，获国家、部、省级奖的每年260项左右，而一般性科研成果每年都有几千项。但在产品中，数万个产品（含品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项产品的产量在全国领先，市场占有率较高。在市场上，50和60年代出现的产品就占市场的50%左右，一些明显淘汰的产品占10地摆在我们面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认为一是科学研究系统比较发达，而生

产技术系统，尤其是生产技术开发系统非常薄弱，没有形成以技术创新为内在机制，经济和技术共轨运行的发展模式。美国、日本等都有 70% 以上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在企业，而我国绝大多数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独立于企业之外。1987 年，我国各类科技研究与技术开发人员共有近千万人，其中，工程人员和农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逐年有所下降。而且，其中大多数是近五至六年才从事技术开发工作的。二是我国技术开发投入少；三是生产技术管理薄弱。

几年的实际调查，甚至实际参加工作使我们体会到，当前技术成果推广的效果不尽人意，最关键的因素是中间试验问题，可以说这是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的瓶颈。因为目前的专利产品都是拿样机去申请的，而样机又是用手做出来的。既没有定型，又没有一套模型，可要进行规格化生产，必须定型，样机与定型机在性能上难免不无差别，特别是这时还无法计算生产成本，企业家要划得来才干，因此，不定型的产品就难免有风险。但只要是经过了中试的产品，其他服务就大多了。这是该矛盾的集中点。

（六）科教兴国追求结构性技术进步与现实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系统论告诉我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系统的功能。科技与教育兴国必须首先追求结构性技术进步，其次才是技术性进步。只有在结构合理的前提下，科技与教育兴国才能产生最大整体效益。

可是，我们处处面临着结构失调：教育结构、科研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产业组合结构、技术结构不合理。教育、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匹配，既影响科技奖状、经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配置，又妨碍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宏观效益的提高。

（七）科教兴国需要科技进步的时代精神与科技意识淡薄的矛盾科技和教育兴国的战略能否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动员程度，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科技与教育兴国就会落空。但是，我国素有重文史轻科技工艺的传统，而在科学技术系统内部则有重理论轻实践，“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传统。加上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市场先天不足，发育不全，商品短缺。领导干部的考核、晋升、奖惩不科学等等，使得人们的科学意识淡薄、对于科技进步问题，目前的实际状况是，少数比较成熟的领导；者考虑得比较多，而比较幼稚的领导者考虑比较少、非主管领导考虑。配合得比较少；科技部门考虑得比较多，非科技部门考虑、配合得比较少，没有形成合力。因此，科技进步雷声大。雨点小，步履艰难。

（八）科教兴国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矛盾。

21 和技能，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而我国省前中等教育的现状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只会解题，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学生动手能力差。创造水平低、应用知识能力弱。会做考题的学生夜以继日地苦学，却往往处理不了身边出现的实际问题。

升学时的高分，两三年后很多却变成了低分。这种“高分子潜伏着危机”的现象必须迅速改变。否则，我们的初、中级教育将不能完成《纲要》提出的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重任，也会严重影响科教兴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下篇

一、 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一)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新体制要使中国科技经济体制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科技体制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经济体制要有利于科技进步。我们已经明确了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应该把有利于科技进步作为首要目标，即：使企业成为有动力、有能力推动技术进步的市场主体；建立完善包括技术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发挥包括价格、供求、形成各个企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环境；逐步建立主要的和适度的宏观调控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将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符合科学技术发展客观规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科技新体制；促使科技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推动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使科学技术真正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科技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可以设想为以下几点：(1)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科技组织机构。这种组织机构应是多层次、多功能、多种所有制的，既有面向全国的，也有面向地方和行业的，其中面向一个产业、行业和某些地区的应该是主体；既有从事基础研究的，也有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但更多地发展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发明—研制—推广一体化的组织；既有国办的，也有集体和个体民办的。坚持以公办科技组织为主体，鼓励和引导民办科技组织健康发展以作为中国科技事业的重要补充。

(2) 科技工作要以市场为引导，即科技工作要服从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的需要，市场需要什么，科技领域就应规范地进行研究与开发，尽快更好地满足市场的要求，并通过有效经营取得好的经济效益。科研单位要从市场取得和选择课题，并将研究成果，包括创造发明、新产品、新技术等主动在市场上实现价值，取得效益。市场暂不需要的课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3) 完善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与调控系统，转变政府职能，把制定和执行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规划。计划及法规放在首位，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推动科技进步。

(4) 改革国家对科技人员统揽的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开放科技劳务市场，造成人尽其才的环境。形成有利于调动科技人员创造、发明积极性的新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对经济发展却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得到较高的报酬、其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5) 建立研究开发机构与企业。农村结合的研究、开发推广服务体系，以促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因为技术本身并不能保证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只有把技术在生产和流通等各个领域推广应用，使它们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时，技术才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因此，要建立和加强科技咨询、中介工作，发展科技中介人（机构），使它们成为推广应用科技的得力机构。

(6) 形成由政府、民间、企业、金融等方面组成的科技投资体。

(二) 运用税收、价格、信贷、折旧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和

财政的主要来源，办好大、中型企业，使他们充满活力，是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的基础，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需要。当前，迫切需要做的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大、中型企业真正成为产品开发和科技进步的主力部队，成为采纳科研成果的主要场所，以提高其素质和竞争能力，实际上，如果企业没有开发先进产品的竞争能力，就没有真正意义的自主经营和自我发展；没有众多的先进技术进入生产领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大发展。但是，目前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还相当薄弱，在一万多个大、中型企业中只有一半的企业有技术齐发机构，其中真正具有开发现代产品和工艺能力的数量更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和科技投入并未作为生产要素投入进入成本核算。近年来，国家规定企业可以从销售额中提取技术开发费和从固定资产金额中提折旧费，但是，由于这些费用不能摊入成本，加上企业承包后提取技术开发费用会影响职工福利，因而许多企业不愿提取，为了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政府有必要采取一些鼓励或强制措施，例如，应明确规定企业可按生产实践需要自主提取技术开发费，并按产品发展周期该算摊入成本，参照发达国家快速折旧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建立政府匹配投资和风险贷款机制，支持企业推广那些有推广应用前景，但需要资金多。风险大的科研成果，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工程化商品生产，促进科研单位与大中型企业的结合时，免征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等技术性收入的营业税；对科研机构及企业的研究开发等技术性投资，以及国家确定的新产品商品化生产所需资金给予贴息或低息贷款。

（三）提高科技投入，在保证国家财政拨款稳步增长的同时，逐步增加全社会对科技的投入。

近年来，中国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0.7% 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应争取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提高到 1.5~1.8%。同时改变完全由国家财政投入的状况，形成财政拨款、企业自筹和金融部门贷款组成的科技投资的三大支柱，还要吸取民间和海外资金，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资体系。金融机构要设立科技信贷科目，增加科技贷款，使科技贷款额度在近几年能有显著的增长。要调整科技投资结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要达到研究开发总经费的 10% 左右。

要加强对中间试验及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资金投入。对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应大幅度增加投资并实行风险投资。

（四）加强科技法制建设，使科技工作纳入法制轨道这几年，先后制定和颁布实施了一批科技法律和法规，对科技进步起了积极作用。如 1987 易活动，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陆续颁布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发明奖励条例实施细则》、《关于中试产品减免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等，都促进了中国科技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为持续、稳定地发展科技事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的科技立法工作刚刚起步不久，法规还很不完善，实施得也不尽如人意。当前，应尽快制定《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有关科技工作的法律，完善有关科学技术组织、劳动、奖励、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规。在近几年内形成比较完备的科技法律体系。加强科技法规的实施与监督，建立技术合同仲裁机构和各级科技法制机构，以及科技法规的研究、咨询服务系统。

（五）开发人才资源，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科技人员是第一

生产力的“载体”，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开发人才，尊重人才，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是实现科技进步的基本力量。一个国家、地区或企业，如果没有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员来开发、推广、应用新技术，就不可能有第一流的优质产品，也不可能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科技人员合理流动，要求科技人员管理社会化。结合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采取必要的措施使科技人员的实际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投入科研工作。要善于发现人才，大胆起用德才兼备的科技人员，同时要积极吸引出国学习并有所成就的中华儿女回国工作，还要有计划地聘请国外的专家来弥补国内某些学科高级人才的不足。

（六）“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谁掌握了 21 世纪的教育，谁就掌握了 21 世纪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为了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从现在起就要立足于教育事业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在教育结构上，要以 9 年义务教育为基础加强基础教育，同时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要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调整和加强高等教育，培养出更多的高级专门人才。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已经耽误了一代人的培养，现在社会上又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教育遇到了新的挑战，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轻视，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加速教育改革，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使教育事业能力“四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继力量和优秀人才，变中国沉重的人口负担为丰富的人才资源。

科技与经济结合，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是当代世界潮流，是中国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

二、困难与问题

当前，科技体制改革面临转折。以前的改革内容，是以科技运行机制改革为主线；在改革的操作上，以单项突破为主要特点。当前，科技系统结构调整问题已经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这个问题，不仅对于我国今后的科技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它又牵涉人事、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和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因此，科技系统结构调整必将成为今后科技体制改革的主线。在改革的操作上，我们已不可能沿用“单项突破”的手段来推动改革的进程，必须采取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因此，系统性和综合性将成为今后科技体制改革的最显著的特点。

这一转折，标志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及其操作方式均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把握改革的全局，使今后的科技体制改革步步引向深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以上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同时，在这一转折关头，要求我们清醒地估计改革环境和改革形势，以便采取正确的策略，掌握改革的进程。反之，如果对这一转折缺乏足够的认识或者对于面临的改革环境和改革形势判断失当，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改革引入误区。

改革任务及操作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决战阶段。过去的改革好比游击战、运动战，哪里可能突破就往哪里打。改革的结果已取得多方面的重大突破，为全局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这毕竟仅仅是局部性的胜利。目前我们正在着手进行的改革好比攻坚战、

阵地战，改革的目标已经确定，前进路上的障碍必须一一扫平，其结果将决定全局的成败。

在目前，进行这场决战的条件是否具备呢？从改革的大趋势，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看，形势令人鼓舞。

——中共中央已发布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十条》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已经明确，并正在逐步贯彻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并将逐步为科技体制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的势头很好，国家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正在按预期目标实现。这将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比较安定。虽然改革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但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和心理承受能力也正在逐步提高。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要想立即进行系统的、配套的科技体制改革确实面临重重困难：一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稳定运行都需要有一个过程。目前的情况是：人事、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搞活，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调整的速度相当缓慢。这些问题都与科技体制改革息息相关。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科技体制改革也难以有大的作为。

——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状况欠佳：国民经济高增长、低效益；国家财政还很拮据。这些情况，既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影响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

——我国多数人民生活不富裕，全国还有几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因此，改革必须兼顾安定。实际上，我国社会不安定因素很多。从根本上来说，改革是根本大计，是长治久安之策，一些不安定因素最终要靠深化改革来化解矛盾。但有些改革措施，如企业破产、关闭机构、解雇员工等等，又有可能引发新的不安定因素，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必须慎之又慎，恰当掌握改革的广度和力度。

三、“瓶颈手术”

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这是我国建国方略上的重大决策。

从国际范围来说，世界格局已由“冷战”时代进入所谓“冷和平”时代。国际间的争夺，已由军事优势争夺转为经济、政治尤其是科技优势的争夺，而科技争夺的实质是人才的争夺。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分析21世纪的国际形势，必须把握这一特征。

我国的国情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物博”而“人多”导致了“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地大”而“人多”导致了“有效生存空间”（指人能正常生活的地区）相对狭小，我国人均“有效生存空间”只有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1/10或1/15。所以，我国的经济只能走“高度节约资源型”和“高度保护生存环境型”的道路。再加上我国的“地大物博”多半集中在西部北部，“人口众多”又多半集中在东部南部，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

联结人和物的重大科技问题，如交通运输问题，能源运输问题，生存空间改造问题等等。中国的“人口众多”也突出地提出了“节制人口”、“提高人民素质”、“开发人力资源（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资源）”等一系列重大科技问题。尤其是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如果能充分发掘出来，那将是一支震惊世界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发展要靠科技，要靠教育。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要满足若干客观规律，其中重要规律之一是生产力中的诸要素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如果片面地突出了某一因素，某一侧面，最终导致生产力发展的迟滞。这一思想在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中清晰的体现。例如，他从战略高度来研究分析农业、科技和教育问题，并将三者联系在一起考察。

这是因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而且在投入问题上，这三者往往是容易忽略的方面。邓小平同志说：“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卷三 为了中华之崛起

二十一世纪当真是中国人的世纪吗？
中国的明天究竟会怎样？

二十一世纪当真是中国人的世纪吗？
近年来，常常有人这么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而且，这还并非是空穴来风。

1993 年基金会等，都曾这样把中国看作已经是或将要成为世界第三、世界第二，甚至是世界第一的经济超强，他们都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但是，英国学者保罗·甘乃迪在他的《挑战世纪》一书中，却彻底否定了这种说法。

诚然，甘乃迪看到“太平洋地区”的升起，并了解如果中国大陆能将国民所得提高到今日韩国的水平，中国即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他认为“这很难想像，但理论上是可能的”。

不过，甘乃迪指出中国到 2025 年的人口将增至十五亿，而中国像印度一样，很难跳出“马尔萨斯的陷阱”，人口与资源的‘差距’将愈来愈大，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将会见到持续性的衰落与病弱。中国为二十一世纪准备的中心计划是工业化，但中国有 2 亿 2 千万人的文盲，而没有普及的教

育，更无法培育足够的技术人才，很难在科技工业上有突破性的发展。更大的困境是，即使中国在工业化上有飞跃发展，并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准，这却又必然会对环境产生惊人的危害。总之，甘乃迪认为中国为二十一世纪大转变的准备，在最好情形下，也是喜忧参半，成败同在的。

读罢此篇，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者一定会失望。

但是，或许读罢了甘乃迪的另一段话，你必定又会产生另一种想法。甘乃迪说：“到了二〇二五年，谈论谁是世界第一强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的政治人物以及下一代能充分了解眼前的问题，人类终将在二十一世纪走向复兴。”尽管21世纪不一定就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在21世纪，中国的明天会更好，人类的明天会更好。

而这，已足够了。我们还祈求什么呢？中国的明天究竟会怎样？

中国，遏阻人口爆炸上的成绩较为卓越。毛泽东主张“人多好办事”，并倡言在社会主义经济下，再多的人也养得活。于是，因为生活改善及几近普及全民的基本医疗照顾，使中国人口激增。可是随后的“大跃进”把人口划分为许许多多的人民公社，使经济元气大伤，食物减产且流通困难，饥荒四起，收成欠佳接踵而来。随着经济好转，60年代中国家庭又积极添丁，因而回复到1949年之前的水准，出生率高达3.3%至4.2%。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提倡优生优育。这一切的目标是在公元2000到80年代中期，由于6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此时又到了适婚年龄。一方面每个家庭生育的子女多了（尤其在不易控制的乡下地方），另一方面25岁以上青年也比以前多，于是生育率又从1985年年增1.78%，增至1987年的2.11%。1987年有2200万新生婴儿，却仅有700万人死亡，净人口增加数居然接近整个澳洲的人口，可是，过去20年间若不曾采行节育政策，中国的人口还会多出2亿4千万。

依各种不同的估计，中国的土地约可养活7亿5千万至9亿5千万人。中国的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农地却仅占7%，而且其中大部分土质瘠薄。中国人口的密度也是全球平均密度的三倍，每个人却未分配到相同比率的资源。一位华人学者的观察是：如果把资源平均分给每个中国人，那么平均分得的领土仅及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一，农地四分之一，牧地四分之一，林地九分之一，水资源四分之一。与美国相比更低得可怜：平均农地仅及美国的八分之一，林地为十分之一。以中国现有生产力与技术水准，人口过度成长必然会加剧对环境与资源已嫌沉重的压力。

对中国大陆上的政治家、政策规划人员，或任何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分享太平洋边缘地区，‘繁荣’的人而言，经济成就被人口吞噬的威胁可是千真万确的。

个体户或负责耕种小块农地，经营小型企业者，很自然的会想多生孩子，如此才能拓展家族事业。

未来人口结构的不平衡也会很严重。目前出生的许多新生儿都是中国资源所难以供养的，但就算在20世纪末人口可达零增长——但届时60年代大量出生的人口，及90年代一胎化的后果，会使人口结构严重扭曲。有位人口学家曾估计，假若公元2000年时人口增长为零，则到2035年时，中国

大陆 60 余岁的老人将是 20 余岁年轻人的两倍，这种组合会令最敬老尊贤的人都难以接受！

尽管中国的人口压力增大，环境与资源的矛盾突出，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政策，妥善处理和认真解决改革过程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就一定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昨天很美好；历史同样可以证明，中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对此，我们深感自豪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第六章 未来之路

上篇

一、 质朴的施政原则

历史是一面镜子。

现实源于历史。

而近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史为鉴，研究近代中国的兴衰得失，于展望 21 世纪中国的未来大势尤为重要。

先谈质朴的施政原则。

崇祯十六年（1644 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军兵临城下，但百官之中已无一人上朝。

此时，崇祯帝方知情势危急，置酒对皇后说：“大事去矣，你赶快去死吧！”一旁的袁妃惊惶失措，急走。崇祯帝拔剑追上，一剑砍在她肩上。袁妃并未摔倒，帝又砍一剑，方扑倒在地。皇后见状，只得返坤宁宫自缢。接着，崇祯又到了寿宁宫。公主年方十五，崇祯怒视良久，曰：“你为什么要在生在我家？”举剑想砍，又实在难以下手，踌躇再三，方挥剑砍去。

公主用手一挡，只砍断右臂，扑倒在地。然后，崇祯又杀了坤仪公主，径直赴煤山自缢，临死前叹曰：“吾待士不薄，今以到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但从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来看，明朝腐朽统治的败亡，就又是历史脉动的新契机。毕竟，在传统中国的历史上，中原王朝大凡溃于内者，必决于外。明朝社会日益深重的历史性困窘，对此时崛起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建州女真部来说，正是重建华夏盛世的天赐良机。

溯其渊源，建州女真作为明朝的一个藩部，正统年间（1436 年—1449 年）南迁至土地肥沃。雨量充足。宜于农耕。并接近于内地的浑河平原（苏子河上游，今辽宁新宾县境内），与汉族有着比其他女真各部更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当时，明政府在开原、广宁、抚顺、清河等地开设互市，以粮食、家禽、刀剑、铁、锅、布帛与其交换人参、貂皮、牲畜、药物。通过这种互市贸易，建州女真的经济形态迅速由渔猎社会发展为农牧社会。至 16 从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来看，这种部族之间的征战，正是一个统一民族形成

的必要方式，所以平定女真各部之纷争，完成部族间的整合则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完成。重要的是，与此时明期衰朽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勇武奋进，生机勃勃；在道德上的质朴公忠，讲求实用。

就前者而言，这一特征开创于努尔哈赤时代。主要体现在他本人当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权威由征战英勇而确立。努尔哈赤本姓爱新觉罗氏，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起兵之时，只有其父塔克世“遗甲十三副”，率领近百人的士兵，却能节节取得胜利。万历十二年（1584年）六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翁鄂洛城，被敌将射中头部，他拔出箭来，仍坚持作战。忽然，另一敌将乘烟掩护，偷偷逼近，又以一矢射中。这一箭砰然有声，直穿其锁子甲护项，箭拔出后，箭头如钩，血肉迸落。周围部下纷纷向前搀扶，他担心为敌所窥，予以制止。此时颈下已血涌如注，努尔哈赤则以一手们创，一手抚弓，奋力杀敌，后因伤势过重昏倒，只得弃垂下之城而还。待至伤愈，他又率部攻打此城，城破之时，两位射他的敌将被俘，部下请诛之。他却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们也是各为其主，今倘为我用，即能为我去射敌。如此勇敢之人，临阵死于锋镝都很可惜，岂能因射我一箭而杀之？遂命这两名敌将为牛录额真，各隶三百人。所以，其兵势日益强猛，逐渐发展到拥有几万精锐之师。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他又正式称汗建国，用金国国号，建元天命。此时，他已从伺处建州左卫一隅之地，扩大到统一女真各部。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诸部始合为一。”重要的是，天命三年（1618年）以“告天七大恨”，公然宣布与明为敌。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他率兵围攻明之山海关重镇宁远，被明参将袁崇焕炮火击中而不久病逝。这时，后金军队已饮马辽西，明在东北的战事疲于招架，难以支持。

就后者而言，这一原则由其继任者的皇太极发展出来。主要体现在他沉机独断，适时完成由女真部族诸王共治转向民族国家专制集权的制度创新。为此，他即位之初就着力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满洲人歧视和排斥汉人和汉族官僚的政策，在汉族官僚们的建议和帮助下，仿照明朝政治制度建立了内三院、六部和都察院，以及理藩院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体制。当时最能体现这一政权道德气度的，是其煞费苦心地笼络明朝降将降吏为已所用，崇祯五年（1632年）明监军道张春被俘，皇太极欲给他官职，被张拒绝，并对所赐饮食、用具、衣物摒而不视，只是向西南正坐，日夜哭不绝声，皇太极派人好言相劝，不时自往拜之，春都不为所动，骂以为常。左右谏曰：“春只一囚也，岂有万乘之主为一囚所屈？”皇太极则说，“这是什么话！我一向只从史书看到文天祥，以为是神人，今天乃得见真的文天祥了。”几年后，张春仍着出关时的服装，至弊而不涉易，并总面向西南。其病至临终，皇太极派人问他有何要求。张春说：“如能让我移居辽阳，得近中国，则死无恨矣。”皇太极表示同意。但有部下奏道：“张春在这里住了多年，知道我们的底细，若移居辽阳，真让他逃走，若何？”遂不许，不久，张春绝食而亡，皇太极十分懊恼，说：“我对于张春，从未违其意愿，然竟未让他移居辽阳。”即命将其葬于辽阳。

与之相应，明朝政府的君昏臣庸，残杀横行，又将人心驱之于清朝这一方。崇祯六年（1633年）孔有德等人率兵十万叛明归清，葡萄牙大炮自此输入满洲，明之武器装备技术方面已无优势；九年之后，崇祯十三年（1640年），拥兵十三万的明之蓟辽总督洪承畴又叛，明在关外势力全失，而国内

形势又日益恶化。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清探知李自成破演关，积极准备趁机扩张；而当得知李自成军攻克北京和明朝覆亡的消息之后，摄政的多尔衮决定趁新政权立足未稳之际，率军由蓟州、密云一线破墙而入。恰在这时遇上了驻山海关明总兵吴三桂的使者请求清军驰援，以抵挡李自成的农民军。多尔衮随即命令改变进军路线，以一天200里的速度急驰山海关，并在四月二十三日与李自成军交战。当时，自成军猝不及防而被击溃，迅速向西遁去，清军几乎在不战的情况下轻易占领北京及附近地区。

1645年江、湖北、江西等地的占领和地方政权的重建，天下为其所定至此已无法改变。耐人寻味的是。这对于一个重建的统一帝国来说，只不过用了三代四十余年而已。

尤其是，清以金戈铁马夺取天下，又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汉地，定乱求治就更注重质朴少文而力趋事功。一方面，对人民极为笼络，以薄赋轻赋收取天下之人心。早在入北京之前，清统治者就宣称他们是为中原百姓和士绅“复君父仇，诛者惟闯贼。师律素严，必不害汝。”占领北京第二天所出的安民告示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第三日（初六日）即为明崇祯帝发丧，令臣民服丧三日，著礼部太常寺以礼改葬。

同时宣布对明官吏降服者各以升级任用，明室诸王仍保留其爵位；明臣殉难者，予赠溢世荫，立庙祀之；被斥官吏，只要没有贪赃劣迹，以及那些为清望所归和隐居山林而才德可称者，皆征辟录用；同时大赦罪囚，对鳏孤独寡及乞丐市者；给粮养之。不过，最使民心所归者，还是他们宣布减免地亩钱粮，除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尽行蠲免的赋税政策。史载：天下底定，明在北京的赋额籍册俱毁于战火，所留者仅为万历时旧册。有人提出到直隶寻求明散在各地。

载有自万历以后所增加赋额的新册籍，被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否决。范文程奏道：“即此为额，犹恐病民，岂可更求哉？”所以，清初天下田赋悉照万历时故籍，一举废除了明自天启崇祯年间无限制的各种加派，民获苏息。康熙五十一年二月（1712年3月），清统治者又诏示天下，确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税制改革，并为此后历代所基本坚持。

另一方面，对人民又极尽压制，以严酷之政磨锁天下之气节。

入北京之初尚有“礼俗衣冠，暂从明制”，顺治二年六月初五日（1645年6月28日）当清军攻占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自感明已无回天之力，即下诏发令强迫所有汉族男人剃掉鬓角上的头发，脑后梳一长辫，其态度之蛮横竟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

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发令所到之处，各级地方官令剃发匠挑着剃头挑子在街上行走，见蓄发者而剃之。稍一抵挡，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以示众。甚且孔子后裔以执行孔庙典礼不便，呈请蓄发，用先工衣冠，也遭清廷下旨切责，只因圣裔免死，著革职永不叙用。

在江南诸省，则激起了已被平定地区的强烈反抗，江阴、嘉定等地民众纷纷举起义旗，致被清军屠城，被杀者数十万人。在人类历史上为一头发的剃蓄遭致巨大的流血牺牲，绝无仅有；但对于一个以暴力夺取和维持的政权来说，其逻辑即为惟力是恃，严刑峻法，任何个人的情感、喜好。如穿着、饮食、交友都会上升到政治上的顺逆而遭受生杀荣辱。即如清之剃发令所言：

“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与之相应，为进一步在心理上摧毁被征服者的反抗意志，清廷又接着大肆杀戮，如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顺天、江南大兴闹狱；顺治十六年（1660年）的江南奏销案，以及同年颁发诏令严禁士子妄立社名，纠众盟会，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以及旋遁而起的数百起文字狱，都可以说是清廷摧残士气，建威销萌，旨在造成一柔情世界的有意之举。

二、法令暗弛

再看法令暗弛之祸。

乾隆一朝的政治危机最明显莫过于官员的贪污盛行。问题在于，乾隆帝生性聪慧和果敢，再加上他一向十分重视密折制度。引见垂询及巡幸时的省方问俗，其中的弊窳和关碍，应当十分了解。

如其多次明偷要严厉打击贪污在法事件，宣示“严待墨吏，乃以安民”。这也表明，他非常清楚吏治的清浊与帝国统治的稳定，人民的音乐，密切相关，从实际的措施来看，乾隆帝也多次兴大狱处理贪污腐败的官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通省官员贪污案被侦破。首先被处决的就有督、抚、藩等高级军政大员。当年及翌年秋审照“侵盗钱粮千两以上报处斩”的正例，被判死刑的还有102人，执行斩决的有56名人犯（已故免予刑诛的有5人）。薛立升说，乾隆年间侵贪正法者不少。从统计数字来看，乾初期和中期，封疆大吏以侵贪之案被侦查者多达30余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的有20余名。平均每一两年就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侵贪或询私而正法，但吏政却仍未能澄清。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关键在于乾隆帝对州县以至督抚等地方官吏执法甚严，面对和珅这样的亲信贪污贿赂，则听之任之。后来嘉庆下和珅之于狱，夺其最重要的大学士之职衔。又十天，赐其自荆据说，查抄和珅的家产就得银约八万万两之多，人参一项竟使内务府收纳过巨，无法储藏，不得不变卖数百斤，以致市面上一时钱币短缺。紧接着，嘉庆帝下诏命军机处的一般工作人员须经他本人亲自挑选；此外还颁发了各省上陈皇帝的密折不得再带有给军机处另封的偷旨，以强化对权力的控制。

尽管，嘉庆帝每思“三年无改之义”，却在其父尸骨未寒之际，仍将其简用重臣，革职拿问，目的当然就在于力图振奋，在政治层面上重整纲纪。因此，与乃父乾隆帝完全相反，嘉庆帝极力提倡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在他看来唯有如此，国家方能休养生息，百姓康阜，元气日复，并渐臻上理。因此，他常常怒斥政府官员因支度繁费对百姓的科敛，说：“损下益上之举，朕断不为，焉忍剥削。”一次，偶尔忆及随父驾甫游，有留恋江南风光之语，当下苏州籍大臣吴熊光说：“苏州谁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嘉庆帝闻后点头称是，立刻自剩尤其是为励行节俭，当政期间停修行宫，禁在内城演戏。做了二十五年的皇帝，也只举行过十次秋祭大典。嘉庆九年（1804年），江南大吏奏请颁发其（御制诗文集）于江南书院，他以“朕之政治即文章，何必以文字培长那”而拒之。但仅凭统治者个人的刻己俭约，却不能在根本上化解日趋严重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困窘。对这一时期的清廷来说，和珅已诛，然纪纲已替；白莲教起义虽日后荡平，元气早就大伤。其时，官民受困的深层原因，曾因件逆乾隆帝遭

谴的尹壮图在嘉庆四年（1799年）被召回北京后上疏指出，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正如嘉庆十四年（1809年）三个户部书吏竟私刻假印，捏造事由向户部三库及内务府储司领取银两。清制规定户部领取努银有缜密手续，须层层上报，最后由负责大吏亲笔批准。这三个书吏却趁大员仍宴饮谈笑时送上文稿，大员准之。同为他担心处理了这些帝国亲要，可能会影响到四海宁清，天下太平，即他自己作为“千古第一全人”所臆想出来的虚假幻象。但对其继承人的嘉庆帝来说，清除和珅就是化解当时政治危机，建立自己统治威权的首要选择。

然而，在乾隆帝生前，已作了皇帝的嘉庆帝却极尽韬光养晦之能事。乾隆帝继位之初曾向天立誓：若在位六十年，必传皇位于子，归政退闩，以示自己不敢超过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之赤诚之心。

乾隆六十年（1795年），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已在位六十年，决定实践自己的誓言，禅位于皇子。不过，就乾隆帝的个性而言，聪明疏通于太察，寡闻少见于奎蔽，所谓禅让就只不过将一些因年老无法亲历的各种祭祠和礼仪活动交由新皇帝，“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从宫廷礼仪来看，乾隆帝仍自称“朕”，谕旨为“圣旨”；大臣们题奏行文遇“太上皇帝”字样，须高三格抬写，皇帝只高二格抬写，上皇帝生辰称万万寿，皇帝生辰称万寿。而从权力的控制而言，文武大员进京陛见以及新授道府以上的官员，离京赴任还要具折恭请太上皇。甚至连嗣皇帝按期举行的祭礼以及经筵、耕猎、大阅、传炉等礼仪活动，都要奏闻太上皇帝后方得举行。

对此，乾隆帝说，“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总之，此时清廷运作的真实情形是八十六岁的太上皇训政，三十六岁的皇帝敬聆圣训。

但至少从嘉庆三年（1798年）起，乾隆皇帝已时时显出老年性痴呆的症状，昨日之事，今日忘，虽然手颤眼花，批阅奏章的字迹已让人难以辨认，却毫无放松权力之意。嘉庆帝则仍对乾隆帝之宠臣和珅极为谦恭，称为“相公”。和珅前来陈奏政务，故作拿不定主意，让其自行处理。宫廷终日宴戏，整日侍坐在太上皇身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太上皇的一举一动，太上皇笑他亦笑，太上皇喜他亦喜。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帝龙驭天宾，嘉庆帝才真正获得实际的统治权力。明日，先免和珅两职事，初八日下则随手画押，或由幕友代画，以致被盗领带银十四次，总计有上万两之巨。而且，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又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兵部失印案。当时正值清廷照例进行木兰秋狩；兵部官员却在行次途中将兵部行印丢失，负责官员发现丢失也不上报，私下与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将铜钱装在印匣内蒙混，直到半年后才被发现。后来，清廷追查此事时又发现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失职。渎职之事，早已司空见惯。如司员们不按规定在署值宿，平时署吏终日以聚赌为事；甚至兵部皂役娶媳妇，为方便花轿进出，擅自凿穿兵部衙门的围墙，且长期无人过问。而对清廷来说，兵部可谓是国家的要害部门。此外，官廷门禁原应十分严密，层层设防，各门护军侍卫多系八旗子弟或宗室贵胄，可他们业已怠玩成习。各门守卫官兵，各门侍卫平时多不佩带武器，一些侍卫还常常旷班，累日不至，夏天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嘻笑；圆明园的侍卫在大白天还有裸体酣卧于宫门之前的。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嘉庆帝赴宫斋戒，内务府厨手持小刀从顾贞门径奔轿前行刺，御前侍卫百余人，只有六人上前护卫，其余均惶然不知所措。

鉴于此，整顿官场中因循怠玩之习，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就是嘉庆

帝行政的重心所在。他多次下诏痛斥群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自古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面对嘉庆皇帝来说，司堂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即意味着现实政治上无道理，下无法则，必将“大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然而，嘉庆帝的重振朝纲又在道德风气日益颓败的背景中展开，成败并不主要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德行和意志，而在于相应的文化和精神转换，否则所有的努力将不过为历史惯性的延续而已。恰如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就曾从风俗日趋卑下，赏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四个方面，批评嘉庆帝施政不勤，法尚未尽及未改和硃当国之时的用人行政。并直率地指出嘉庆帝自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以来，视朝稍晏：退朝之后，俳优近习大都蛊惑圣听，前后左右独缺犯颜极谏之人，从而使得政府“办事效率太低，千百中无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此谏上达，龙颜大怒。洪亮吉被视为指斥乘舆，大逆不道，部议照大不敬律拟斩决。后因嘉庆帝网开一面，洪氏方免死遣发伊犁。当然，它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还是“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

特别是“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盲者。”与之相应，被嘉庆帝重用的则是董浩。虽然他以科举正途出身，嘉庆四年入值军机，嘉庆十六年（1812年）晋太子太保。父子两代历事三朝，声势显赫，家产未增一亩之田。一椽之屋，为官极为清廉，中枢任职四十年，深悉一切典章制度，每逢咨询答疑，口若悬河，如数家珍；但同时也深谙韬光养晦。明哲保身之术。时人记有：如有献纳，他一律面陈，决不采用奏犊；待人极为谦恭，数十年如一日无疾言厉色。“礼貌之周到，虽于童亦不肯忽也。”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京里发生天地教起义，京师震动，某大臣事后总结原因，上疏指斥朝政说：“夫吏情卒骄，文武并驰。而法制禁令为虚器，则事之可忧，岂独在贼？”此疏先至董浩处，读后却劝那位大臣道：“公言虽是，恐不能合上意。”该大臣答之曰：“此等何时，尚以迎合为言隙？”无独有偶，另一位重臣乃嘉庆帝的老师朱圭，一向以清廉高洁自许，生活相当俭朴，从不接受馈赠。住宅门庭隘小，终生未娶侍妾，以至嘉庆帝有诗赞曰：“半生为独宿，一世不贪钱”。辅政才略却极为有限，与皇帝独对，大谈唐虞三代，从不涉及时政。身为户部最高长官，任职期间除驳回一些要求增加赋税的奏章外，并未做过一件实事。兼管吏部，又不识人才。那时，有一贪官知其特重清廉，故换一破旧衣衫求见，谈些安贫乐道的大话，即得信任。不久，此人贪纵事发，被致遣戍，但朱圭对他仍深信不疑，并竭力为之洗刷罪名而终使其人官复原职。

三、正天下人心

反之，则可见正天下人心之功。

历史的深刻哲理也还在于，巨大的历史灾难作为社会发展的必要环节，在某种意义上就恰如天厌季世的昏浊之气，遂假其手而摧拉之。所以，在有清一代最后中兴的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中，起正面作用的还是那一批为社会气运所激，蔚起于萧墙之间的曾国藩等士人。他们“慨然以正天下人心为自任”。

与其他清朝官员相比，曾国藩有其道德理想和学术根基。在他担任京官期间，师从著名理学家唐鉴、倭仁等。其时，唐鉴让他专读朱子，并嘱其

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具体的要求是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均须记有礼记。记载内容或为心有私欲不克之念；或外有不检之言行。最初，曾国藩只是每天专心阅读《朱子全集》，并未按唐鉴所嘱，做静坐功夫和修身札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1月）他又向倭仁请教。倭仁告诉他，唐鉴所说的乃是儒家研几工夫。所谓“几”就是指人行为善恶的最初发端，并最终和国家治乱之几相联系；“研几”是要时时注意自己行为的善恶，并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活动将其清除。倭仁也劝诫曾国藩一定要天天记日课。

曾国藩以此而行，却不成功。每静坐往往未久便昏然睡去；至离梦境，半天已过，只得在日记中将自己不断痛责。两个月后，已感到自己越来越难适应，先是整夜难眠，白天无精打彩，若有所失，后又突然吐血。这时，他意识到自己体质较弱，似不能恪守理学躬行实践的修身方法。因而决定更深刻把握理学精神实质，而不仅仅去做一些自省功夫。毕竟，儒家立法精义也还在寓名于实，用隐而化以神。就如后来他回首自己的思想发展时所说的：“立身之道，以禹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官员中，其仕途顺利又不多见。他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在湖南湘乡，五岁人家塾读书。道光十三年（1833年）考取秀才，五年后（1838年）会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此时他才二十八岁。后入翰林院，越十年升为礼部右侍郎，二品大员。仕途如此顺利，对清朝官员来说，并不多见。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受到了道光帝重臣穆彰阿的特别提携。据说，一日，曾国藩接到翌日要被召见的偷旨，当晚就住在穆彰阿家。第二天去宫中，被安排在往日皇上接见之处，等了半天未被召见，曾国藩快快而退，又回到了穆彰阿家。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可注意到墙上所悬的字幅。曾回答说，没有。穆彰阿当即派二于仆以四百金去拜谒某内监，请他将壁间字幅秉烛代录。第二天，曾国藩再次入觐，道光皇帝以昨日壁间所挂字幅为历朝圣训，命曾国藩一一奏对称旨。好在曾国藩有备而来，龙颜顿时大悦，对穆彰阿说：“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虽然如此，即使这一记载有十分的真实性的，但曾国藩主要还是被太平天国起义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作为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拜上帝教”，是洪秀全等在西方基督教教义之上杂揉上帝。

耶稣及太平军领袖的事迹和言行，以图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基本原则和符号崇拜——如家庭结构。

人际关系、社会组织和文化典籍。其中又尤以摧毁儒家文化为重。

最使儒生痛心疾首的还是太平军横扫之地，焚学宫、毁木主，狼藉遍地。而在中国历史上，除秦始皇外，几无人敢冒如此之天下大不韪。甚至，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还祭文昌。即如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曾往太平军营中劝洪秀全等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被拒绝后方才逸去。而且，后来同为湘军重要将领的罗泽南、彭玉麟等也都由于太平军毁坏名教，骚挠地方民生奋起与之相抗。所以，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愤愤他说道，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曾国藩，必将与太平天国为敌。

清廷起曾国藩而用之，正值他丁忧回籍。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初）太平军破武昌，调命帮办湖南团练于长沙。初奉调，曾国藩还准备具疏推却，适逢郭嵩焘至，劝道：“君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守古礼，何益于君父。”曾国藩方投袂而起，以罗泽南湘勇为基础，略仿明戚继光之成法，募练农夫，编为湘军。与当时清正规军八旗、绿营，甚至与太平军相比，湘军堪称百胜劲旅，就是因为它“以忠义之气为主”。具体言之：一是湘军构成是以士人和山农为主干，只求其精，不求其多，由士人领山农，不得稍染军营浮滑之习；二是湘军每天都须练习阵法技艺，操练两个月后，凡体弱、艺低、油滑者均淘汰出营；三是湘军选择将领须才堪治民，不怕牺牲，不急功近利和耐受辛苦，如果缺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作为带勇之人；四是湘军有足够的生活保障，使每个士兵生活不成问题；五是湘军组织以同乡为一营，在作战时齐心相顾，人怀忠愤，如报私仇。恰如曾国藩所说，他在少年时读《论语》，至“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深服其言，书诸座右，日必三复。厥后用兵执政，也时时不忘此言。咸丰十年（1860年7月），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进驻座落在浙赣边界群山之中的祁门县城。当时还是其幕僚的李鸿章告诫说，祁门为一盆地，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因而率众幕僚群劝曾国藩移营江西省城，以保响源；或移营江干州县，以通粮路。但均为曾国藩所拒。果然，同年十二月就有李秀成率大军破羊栈岭进克黔县，距祁门大营仅八十里，而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人，形势万分危急。当然，曾国藩执意自蹈险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有其深意之所在。当时，苏、常新陷，浙省再沦；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烟稀少，湘军处境的困难就如时人所言：军粮则半寂难求，转运而一夫难雇，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无处没有太平军；无日没有战斗之血腥。就在徽州方陷，江楚皆惊的危难之际，曾国藩对左右说，我们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后退，将来怎么办？所以决心：“吾去此一步地死所也！”后来李秀成昼夜环攻，飞炮雨集，曾国藩手书遗嘱，帐悬佩刀，每日坚持下棋书写，从容布置，不改常度，直至形势最为紧急之时，一些朋友和幕僚私将行李置于舟中，准备逃离，忽闻曾国藩之今日：形势如此，有暂时回家的，可先发三个月的薪水，等事平之后再回来，我不会介意。“众人闻之，既感且愧，人心遂固。”而这也正是湘军能最终削平大乱的关键所在。时人说：“曾国藩授钺四年，次第荡平，皆以祁门初战不怯，有以寒贼胆而壮士气。”

四、建立民族国家

在历史上，建立民族国家曾经是一种伟大的尝试。

西方民族主义理念的核心部分乃是个人主义，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这一理论都主张通过民族国家的建立，打破封建壁垒，实现自由贸易，保障个人在法律的范围内追求财产和荣誉之时，可以不依照他人的意志，尤其是政府的约束和干涉。所以，民族主义在现实的政治变革中不仅作为民族独立的现实运动和政治理念，而且必然要推动这一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向扩大个人自决权利和保障个人基本权利方面发展。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之下，孙中山等人组织和发动的革命运动，意义也就在于为抵御西方的入侵，为解救民族的危亡，创建全新的民族国家。

孙中山开始萌发倾覆清廷的革命大志，最初只在中国传统观念的范围

内。1883年中法战争，虽则，在香港“以学堂为吹鼓之地，借医学为人世之媒”，和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人大谈革命，被人呼为“四大寇”，但与此同时，他却并未舍弃传统士子的用世途径，1894年“邦”等一系列温和改革措施，中心思想也是认为中国应当效法西方，参行新法，二十年后“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其思路和设想与当时变革思潮的主流，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并无不同。不过，上书终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孙中山意识到和平方法，“不可复施”，遂以出国考察农业的护照再赴檀香山，并于是年11月在当地联合华侨二十余人成立了欲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政治组织——兴中会。1895年春他回到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首次在会章中提出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政治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其组织原则也是“会内所议各事，当照舍少从多之便而行之。”孙中山革命思想所以能形成体系，成为当时反清革命的纲领，是因为他在1896—1898年旅居欧洲期间，目睹了欧洲列强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一改最初仅主张的民族和民权革命，为一劳永逸转而强调将民生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孙中山说：“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各派革命党人商讨成立旨在统一行动的反清政治组织——同盟会，明确地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誓约，“平均地权”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孙中山起而为之辩护说：西方现代国家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就是经济生活中反对贫富悬殊；经济上的民生与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同一重要。中国虽因工商业尚未发达，社会纠纷不多，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防渐杜微，以谋全体人民的福利。所以在他看来，欲解决上述这些潜在的社会问题，平均地权必须适时进行。孙中山说，“同盟会作为全世界之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实际上，这三大纲领又可视为孙中山政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它以民族国家理念中的人民自治为政治最基本的原则，由此之上“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精神”，毕竟，自太平天国以来，革命党人所发动的反清斗争均沿用中国传统词汇“造反”、“起义”、“光复”等等，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等由香港东渡日本，船经日本神户作短暂停留时，孙中山登岸购得一份载有“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消息的日本报纸，大受启发，说：“革命”一词，出自《易》宁“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句“日人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这一话语转换的重要历史意义，即如孙中山所说，中国历史上实行的都是“帝王革命”。“英雄革命”，唯独他矢志以求的乃是平民革命，或者说是国民革命。目的在于“扫除中国一切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所以，现实的历史进程就体现在革命党人以西方近代政治理念为蓝本，力图在中国实现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也正是他们将西方近代政治发展中的“主义”，即“意识形态”视为重建中国社会和实现富强的基本政治伦理和社会基本的道德原则，于是天下豪俊之士风声雷动，积极响应。就如兴中会初建之时，文人墨士极感缺乏，宣传物仅为《扬州十日记》。

《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等，而改良派康有为等人出版的杂志却风行海内外。1899年孙中山派陈少白筹办《中国日报》，报名劝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次年，月在香港正式出版。开始主

笔者多为旧学之人，立论陈腐，颇不为新学士所接受，后来《中国日报》由郑道接手，一转为大力阐发新名词新思想，旗帜为之一新，大受读者欢迎。颇具普遍意义的是，郑道原来也深受康、梁的影响，初到日本时就读于康有为弟子徐勤主办的横滨大同学校。该校由兴中会于 1898 年初设立，次年 8 月为徐勤等接管，但仍以救国图强勉励学生。据载，徐勤每演讲时事，慷慨激昂，闻者莫不感动。而且教室黑板及每一个同学课本的书面上都书有标语，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励哉小子”，学生和教师们每日上完课都必须大声背诵这十六个字，方才解散。一年后，郑道转至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虽为保皇党人所办，但学校除学习英文、日文外，还让学生专修欧、美各国革命史及希腊先哲。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和英国思想家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学说。

风气所至，竟使得这所学校中每一学生无不各言大志，以古今中外先贤自况。“郑道则以中国摩西自称，转向激进革命。”当然，身置一个悲慨位血、危亡痛党的年代，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就如 1906 年出版的一份激进革命刊物所称：政府多一年运命，即我多一年损害；十年而权利丧尽，二十年而社稷丘墟矣。

他们的愿望竟是“时日局丧，予及汝偕亡”，烈士轻生，激扬声名就又成为那一代人的土风。早在 1900 年闰八月，孙中山等组织的革命军于惠州三洲田而败，组织者多匿居于香港。曾为兴中会首任会长，后辞去会长，并荐孙中山白代的杨衡云也参与其事，清地方政府悬赏三万金购其首级，同志们多劝他出洋暂避。但杨衡云却但然说道：男儿死则死矣，何避为。并云：“吾宁授徒以养妻子，不忍虚糜公款，惮立一好模范为同志先。”最终罹难。此后，革命党人中不断有厉节亢高，视死如归者。如著《革命军》而死在清牢狱之中的邹容，因抗议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投海而死的陈天华等，都认为自杀或从事一些并无多大实际意义的暗杀，是以流血撼国人睡梦，以言论张暗弱民气。如早有革命之志的杨卓霖 1905 年加入了同盟会，时为陈天华投海深深感动，想大干一番事业，遂为学习爆炸技术专门迁至横滨。不久，他的好友姚宏业被留学生选为灯国设学代表，路过横滨，两人相对面位，各以死相勉。翌年，宏业以上海中国公学之事投黄浦而死，杨卓霖即回国返沪，参加组织了 1906 要不承认革命党，就可为他减罪。但杨卓霖却直言不讳，说他就是革命党，曾读欧洲历史，知中国如不实行政治革命，就不足以救亡。临终时遗言为：“不自由毋宁死。佛家云，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

更感人的是，在日本留学的鉴湖女侠秋瑾以男性为光复革命牺牲不乏其人，女性则无一人，因而大声疾呼：“亦吾女界之羞也。

愿与诸君交勉之。” 1905 年秋，她考入青力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为中国女学生所开设的速成师范班，课余常常执笔为文，危坐达旦，愤辄自椎其胸说：不能雪国耻，“久活莫为？”流泪之所及，甚至“爱情”这一最具浪漫温馨的个人情感，也不无凛然而极富悲沧之声。

中篇

一、 作为发展瓶颈的政治变革

至此，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困窘已的然可见。追根溯源，当然是政治变革的屡屡受挫，步履维艰。毕竟，从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社会在世界范围建立世界市场，和发展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已经完成。因此，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基本格局中的近代中国，发展的路径在于：(一)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必然要建立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落后的闭关锁国的民族和地区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都注定要被纳入进去；(二)这一世界市场体系具有不同的层次结构，居于中心的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民族和地区，而那些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那些农民的民族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几乎别无选择：要么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不充分地发展；要么停滞，在颓败衰亡中苦苦挣扎。历史给予的外部条件就是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然而，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动态发展来看，被卷入这一体系的地区的国家所处的地位并非固定不变。如资本主义最初发生的国家和地区，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北部、十六世纪的英国、十八世纪的法国，以及此后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的美国、德国、日本也都有过自己屈辱。

落后的年代。对此，近代国人也有所意识。严复曾认为中国本应走出困境，成为世界强国，因为日本“以蕞尔三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霸国。”这里所说的日本成功，即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长州藩的下级武士发动政变，控制藩主，尔后倒幕的诸藩武士又在京师发动政变，成功地控制御前会议。紧接着，维新志士在只具符号意义的天皇旗帜之下，仅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推毁了整个原有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以及全面引进西方体制与文化的中央政府，为其民族的近代化起飞提供了全面的组织动员机制和坚实的法律保障体系。

日本的成功衬托出的是中国的不成功。相比之下，近代百年的中国历史始终未能化解这一困窘。一方面固然是近代中国比日本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更为不利的地位，列强的宰割和剥夺为发展设置和加重了诸如资金匮乏。教育水平低下、生产力发展缓慢。人口负担沉重、社会生活贫困等一系列障碍和矛盾；另一方面，则是近代中国在政治变革方面的迟钝、敷衍、推倭和迁延，丧失了机会，最终导致连绵持续的混乱和社会爆炸，从而使那些困窘犹如一个个的陷阱，难以跨越。毕竟，中国社会内部并不缺乏发展的活力和能量，只要政治环境稍一宽松，政治体制稍一改良这种能量和活力就会立即得到释放，迅速形成社会生产力。如辛亥革命之后，国民政府颁布了一些有利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和法令，再以随后帝国主义忙于世界大战的准备，放松了对中国产品的压制，致使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迅速。在1912年至1919年的八年期间里，建成的厂矿达470多个，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

新增资本达1.3亿以上，八年来的投资相当于过去的全部投资总可就是由于“实业命脉无不系于政治”，这一期间，袁世凯政府和此后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就是经济发展的最大赘疵和毒瘤。且不要说袁世凯之后的直系、皖系及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的频繁战争，就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也曾使正在发展中的经济一次又一次地陷于困境。

1915 国金融信用陡然丧失。本来，中国工商阶层较为保守和稳健，清末革命未起之时，他们曾奔走呼号，以革命瓜分恐吓国人；当清政府势力既尽，又率先逼迫地方官与革命党言和。时人说，处于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考虑，工商阶层始终“有望于战争之息，而不惮牺牲将来，以求曲全现在乎。”甚至在“二次革命”时，他们支持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用兵，以为：“中国为统一国家，整顿纲纪，不能不达张挾伐，诛绝叛逆”。这时，在全国都反对袁世凯称帝之时，代表工商阶层利益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也一反往日常态，致函袁世凯说，天祸中国，降此鞠凶，要求他辞职以谢国人。这正应验了梁启超早在二十世纪初（1902 年）所说的：或曰今后之天下，既自政治界之争，而移于平准界之争，则我辈欲图优胜，宜急起以竟于此。嘻！此又不知本末之言也。在他看来，“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于平准界能称雄者。”同时，又表明专制政体与近代社会经济转型之间，已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二者不能同时并存。政治变革的裹足不前，就实为近代中国各项发展的瓶颈之所在。

二、革命并不能实现道德重建

然而革命并不能实现道德重建。

· 尽管历史已证明，政治变革的迟缓必然导致革命，其演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客观性就在于政治变革是以渐进改良和激进革命两种方式交替进行。虽则，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更多的情况下是渐进改良，殊积寸累地进行利益和权利的调整，但在急速现代化的要求驱策之下，国人意识到“天下理之最明者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倘若统治者处于其阶级偏见和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短视，面对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不断激化，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政治变革，那么历史就需要用果敢、独断的手段实行激进革命，以求摆脱困境。所以，渐进改良和激进革命，“不复是现代化过程中两种可以自由选择策略，而成为变革中互相关联。有密切关系的两个阶段。”二者的区别即可认为，一个作为既定典范运作下的和平手段，另一个则作为制定新典范的爆炸方式，两者的交替出现皆取决于社会内部发展的条件与动力，并非当事人所能自由决定。

问题是，革命虽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却不能自动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它的发展形式是以摧毁和破坏原有社会秩序和文明结构，无法避免地要对原有道德体系进行鞭挞和践踏，因而又不利于道德的重建。就像法国大革命，倡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与断头台联系在一起，最后能得到实现的也就唯有断头台。毕竟，当社会没有了基本的秩序，岂能再期求它有基本的正义，以及同情、理解、宽容和友谊。所以，身为革命者的罗兰夫人在被押上断头台时，方深有体会他说：“自由啊，多少罪行借着你的名义四处横行！”具体到近代中国，当年立宪派头面人物认为历史上革命的四种类型——圣贤革命、豪杰革命、权好革命、盗贼革命，以此时中国人民教育程度低下，社会贫困，发生的只会是所谓的权好和盗贼革命，结果则将是“革命即成，举目尽暴戾恣睢，嗜利无耻之行，明目张胆悍然为之，举世莫敢非也。”但更应注意到近代中国革命情势的形成过程中，西方列强除通过船坚炮利开拓其商品市场之外，还大力传播其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中国社会对于西方的学说和思想的接纳和吸收，却又如梁启超所说，就像久

处灾区的人那样，不论是草根树皮，还是冰雀腐鼠，无不甘之，朵颐大嚼，其消化与否不同，能否招病也不问。这些发展的联系就在于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也将风雨飘摇，顷刻崩溃瓦解。所以，作为革命主体的志士们，价值取向上都随心所欲，并不对道德有所注意。

如 20 世纪初，《大公报》的创始人，著名的改良主义者英敛之就曾评论道：“而今之志士，大都剿袭民权。自由一二新名词，于是脾阴一世，傲慢群伦，以花天酒地为运动之机关，以好贪狠黑为经济之手段，曰言爱群，拔一毛得同群，未见其可为也；曰言爱国，得数金而卖国，本见其不肯为也；而且互相骂詈，互相倾陷，胸愤庚而叫嚣，性残暴而手毒辣，安能爱群？”

“此后，作为又一次革命思想准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社会道德体系的破坏，则莫之为甚。如果说，在此之前，那还是革命者个人的行为，此时则进行的是一场有组织的道德伦理革命，除提出“打倒孔家店”为口号外，一些革命志士们将矛头指向家庭这一最为基本的社会结构。激进知识分子刘师培写道，“我常谓支那之家庭，非家庭也，是一最愚暗之监狱耳。欲破此大狱，其惟婚姻革命乎！而助此二者之实行，则纲常革命也”。当然，如此后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等众多作品揭示出的，中国传统伦理的确给予家庭过多的统治权力，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之下，这种权力肆意泛滥，个体被吞蚀和毁灭、以致父母，母子、夫妻等伦常之间与其说是相亲相爱，毋宁说是摧残扼杀。但在新的道德伦理原则未能确立之前，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价值核心的“家庭”观念被否定，整个社会道德就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且，对其负面作用的体察和认识，只在王国维等少数一些作为文化人殉文化的孤忠奇哀之中。如辛亥之前，他就写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的诗句。民国初年他旅居上海，在给友人的信札中写道：“我居上海二年，于此间社会乃稍详悉，无论公私皆腐败颓预，至无可言”。

所以，如果将 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伟大意义自不待言，但从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和道德的角度视之，则是困窘未能最终得到化解，并无法得到化解的最好明证。重要的是，自此之后，中国社会就一直处在起伏不定的政治动荡之中，直到 20 来看，持续不止的革命意识形态任其发展只会重蹈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之处，即口号越来越激进，人民愈来愈贫穷。再从道德被践踏的角度视之，法国大革命之时，最终是最为“革命”的罗伯斯庇尔也被推上了断头台；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多少此前“专政”。“斗争”理论的始作俑者，或不遗余力的参与者，此时也都成为专政和斗争的对象。甚至国家主席，也在没有起码的人道主义的待遇下屈辱而死。据当事人回忆说，最初在 1968 年仲夏，刘少奇主席病重住院之时，大夫、护士每次治疗都要先开批判大会，一边对他进行医疗检查，一边痛斥“中国的赫鲁晓夫”。

由此，革命留给我们的思考就如法国作家雨果在其名著《九三年》中所写下的：必须要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必须要爆发的风暴，终要爆发。但“在革命的上面仍然存在着真理与正义。正如在狂风暴雨之上，仍然存在着星光闪烁的天空。”在这个意义上，当可认为革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现实困窘，它最理想的发展，只不过是创造一种新的形势，以便形成另外一个系列的渐进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

三、不应动摇的自由信念

自由之信念，从来就是不应动摇的。

既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革命只有成功不成功，而无应该不应该；那么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又有什么现实功用和历史意义呢？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有其现实的功用。问题在于近代中国，无论是渐进改良主义思想家，抑或是激进革命思想宣传者，他们对此的思考也都集中在要不要革命，或如何进行革命的现实选择上。前者，出自对统治阶级进行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的失望，强调救亡之道，舍革命则无出路；后者，担心革命必生内乱和遭瓜分，主张开明专制，由他们与统治者分享政权，共同进行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

但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结果都与二者的愿望背道而驰。原因可能就如 1911 年 5 月，在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刻，梁启超所揭示出的：要之，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圆其说；在今日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圆其说抑更甚。所以，关键还在于这一代人思考的起点和终点大都只停留在现实政治斗争的层面，并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从而缺乏登高望远，垂法永久的关怀和气度。毕竟，面对近代中国如此深刻的历史变局，不先有包括宇宙之心，何以能有旋乾转坤之力？因此，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就建立在民族信心的确立上，历史意义更在于为社会寻求一个更为持久发展的动力。首先，就政治变革来说，它的发展原则必须根据共同责任和平等价值的思想理念，使每一个公民足以拥有获得机会方面的平等权利。社会集体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应该对公民开放：包括完备的民主程序，以促成对话和在各个层次上民众都能行使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利；还必须确立全面的仲裁制度，保证基层单位和个人能享有宪法赋予的各种利益，而且，地方和局部利益不能高于整个民族和人类的利益。其次，就道德重建而言，它的发展也应旨在建立一个考虑到相互利益的合作基础。其特点不能只具有利益的一致性，而且也必须具有利益的冲突性。换言之，对利益冲突的各方应提出原则性的指导，使其能在各种不同利益的社会安排间进行妥当的选择，以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契约认定。

毋庸讳言，上述发展的思想基础就在于“自由”的信念不能有丝毫地动摇一方面，是我们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不仅被作为社会进步的首要目标，而且还是道德社会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如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就是一个自由人联合起来的自由联合体；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对人类自由的剥夺，其残酷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社会而言的。在他看来，历史的进步将是以这样的阶段向前发展：首先，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性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个阶段，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注，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而自由的意义正在于为人类的各项发展设置一个多样化的前提，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心甘情愿地为一切人的幸福而劳动。

另一方面，“自由”的理念在我国民族文化中也源远流长。且不论中国

文化精神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体现在多少志士仁人命身取义，杀身成仁，以超越狭小个人利益，面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就是那些婉蛮倚门少女，绸缪鼓瑟小妇也不乏。“三户亡秦之志”的自由精神。如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考证的柳如是；其个性机警，饶有胆略。除诗词歌赋书琴字画无一不能，无一不精之外，还努力追求平等自由之婚姻，明亡之后从事反清活动，于1664年殉节。而他的另一著作《论再生缘》，又考证了当日无数女生中思想最超越之人的陈端生。虽然，端生丈夫因科场案发，被贬戍边，她则在四海无依。颠沛忧患之中仍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如其对当时奉为金科玉律的君夫三纲，“皆以书中主角孟丽君违抗御旨，在皇帝之前面斥孟氏及韩氏，以至其父母招受责辱，第描写以摧破之也。

……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警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的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方能因时因地，参之于我民族的文化之精义，以及现实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之原则，植根于中国的本土之社会。否则，仅仅对西方社会制度或思想理念割裂开来各取所需的照搬。模仿和移植，势必举其百，而废其一，然百者皆病；举其一，废其百，而其一又不可行。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不论主张渐进变革的康有为，抑或是主张激进革命的孙中山都曾认为中国社会历来有着过多的自由。辛亥之后，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犹如一片散沙，孙中山则更认为中国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而是自由太多，因而断言“自由”这个名词“万不可用到个人那里”。但仔细辨析，孙中山的认识未必正确。辛亥之后的王纲解纽，威权不再，但对中国人来说，只不过是感官和行为的层面上象征性地冲垮了原有体制的束缚，虽然有些人能够在这混乱之中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但大多数则仍蜷伏在权威和专制结构历史形成的铁幕之下。尤其体现在精神的层面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能，也不会自由地信仰和自由地思想，更遑论自由地集会讨论和自由地表达。所以，在这一灵与肉严重割裂的困境中，没有思想，只被一些虚假信念牢牢禁锢着的躯壳，在情欲的支使下，一旦失去约束和控制，当然也就只能像洪水猛兽一样的贪婪和残忍，从而更加重了社会各方面原已存在的危机。

再从理论上来看、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思想和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体，以及能自由地进行选择之时，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存在。自由的意义就在于确立社会正义的原则。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惟有当每一个力量都被一个对立的力量所限制和约束的时候，最大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作为一个实例，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也曾提出了使人养成权利的观念，并使这种观念能被人们牢记的办法。最简单和有效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和平地行使一定的权利。如儿童的能力和经历都是后天逐渐获得的，当一个婴儿能够开始移动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凡是周围他能够用手触到的东西，他都会本能地将它抓住不放。这是由于他没有这是属于谁的财产的观念，更没有什么财产的观念。但是随着他逐渐长大，明白物品的价值，发现别人也会从他手中抢去他的物品以后，便会慎重起来，并通过尊重他人而最后得到他所期望于他人的尊量。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当人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时，包括行动和思想的自由，才会在原则上尊重他人的自由，这个社会也才能有真正的信心和持久发展的动力。因为它是建立在公正和公平的原则之上。

四、忠直者的困厄

值此社会变革之时，凡忠直者必困厄。

在清朝看来，汉族官僚大都来自田间，知民疾苦，熟请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槽然于大计者乎？”但至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清廷仍特简蒙古正蓝旗人的赛尚阿为钦差大臣，主持进剿事务；失利后继之又用满人向荣。和春，均无功而败，方才起用曾国藩。据说，就在太平军占领武昌、汉阳，进据岳州，直逼长沙之时，曾国藩起乡兵出湖南之境，连克武汉诸郡，捷书方至，咸丰帝大喜，对军机大臣们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一旁而立的首席军机祁隽藻却对之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掀起，从之者万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听后，默然变色久之。本来已下发的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的上谕，即疏回成命，“由是曾国藩不能大行其志，六八年皆有责而无权。”后来，咸丰帝重用的肃顺对满人更为轻慢，而对汉人官员却非常谦恭。用他的话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的那杆笔利害得很！”咸丰十年（1860年），苏州、常州为太平军攻陷，咸丰帝欲调胡林翼总督两江、肃顺进而奏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尽善，未可轻易挪动。不如用曾国藩总督两江，这样长江上下游都得人了。咸丰帝如其议，曾国藩方得到了督吏筹响之实权，而不再徒为空名督师。当然，这一时期汉族官僚不断地被委以重任，除文庆、肃顺这些满洲贵族中开明之士的推波助澜之外，还在于这一代汉族士人大都能以“诚信”为待人沟通之具，修政事以实，遂使满洲官员几无猜疑忌恨。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占领武汉，势力遍及整个长江中下游。满人官文由荆州将军升任湖广总督，凡上游荆宜襄郢诸郡兵事都由其负责。时任湖北巡抚的湘军将领胡林翼军驻金口，进攻武昌，凡下游武汉黄德诸郡的兵事都由他主持。两人最初不甚融洽，下属则更显分彼此，抵牾愈益。林翼叹曰“师克在和，此何时哉？”后二人相见，胡林翼严令部属曰，“督抚相见，前事冰释，敢再言北岸将吏短长者，”以造言论罪，官文听说之后，十分高兴。

从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满汉之间的民族差异并非一定会演化成对立和冲突，更何况面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清统治者与曾国藩等一些汉族官僚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关键却在于专制政体的排他性和独占性，又一次设置和加剧了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

从清封疆大吏的构成来看，这一变化确实存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全国有总督五人，均是旗籍和文官出身；十八省巡抚，汉族八人，满族九人，也都为文官出身；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这一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总督八人，只有湖广总督官文为满族，其余均为汉人。更重要的是其中多为湘军将领，如刘长佑为直隶总督，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三人重兵在握；此外还有四川总督骆秉章。两广总督毛鸿宾与湘军的关系又都极深，均靠湘军力量肃清境内动乱。除此之外，在全国十五个省的巡抚中，湘军将领也占了五人。但耐人寻味的是，此时在清廷主张任用汉人的却都是满人大员，而一些汉人枢臣，如祁隽藻、彭蕴章等，却竭力排抵进毁，竟以满汉权力之消长为其担忧，如彭蕴章就奏湘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主张撤湘军而削曾国藩之权者，附和者一时甚嚣尘上。

当然，根源还在于清廷原有一贯确保满洲贵族权力独占的施政方针，但它所以陷君子于穷厄，其阴暗心理如薛福成所言：“利害之私挠乎中，爱憎之分变于外，坠坏国事于冥冥之中”。

所以，在天京破城之际，清廷对曾氏兄弟虽阳为优礼，隐微之间已日见疑虑猜忌之心。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曾国奎升任浙江巡抚，当时他在南京，未去杭州赴任，按惯例可以单折奏事，但当曾国奎将天京军情章折上奏，竟立遭清廷的驳批。天京攻陷之后，曾国奎上奏报捷，没想到竟被上谕严词指责，所责者乃为在城破时有千余太平军逃逸。可清军攻破杭州之日，太平军守将陈炳文率十万余人突围而去，主攻将领左宗棠却未受到任何斥责。数日之后，清廷又下令严查天京太平天国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报明户部以备拨用。更有甚者，就在这份上谕中，清廷直接点曾国奎之名，警告他和部属不要骤胜而骄，否则将不能永保勋名，长承恩眷。

据说，咸丰帝临终遗命有能克服南京者爵以郡王，但金陵城破，曾国藩仅被封为一等侯，而曾国奎只为一等伯。

清廷担心的是曾国藩功高震主。此时，他除总督两江之外，还督办江、浙、皖、赣四省，手中掌握湘军三十万之众。其中受他直接调遣的就有十二万人，此外还有皖、赣等省的厘金和数省的协饷。所以清廷不得不采取以湘制湘的策略，分曾国藩之权于同为湘军将领但声名在他之下的左宗棠、李鸿章等，形成对其事事掣肘，处处打压的牵制格局。如同治三年（1864年11月）清廷突然命令曾国藩前往皖、鄂交界处督兵剿平捻军，所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署理，以图收其大权。尽管这一上谕发出不到一个月即收回成命，但仍使曾国藩大受震动，其亲信幕僚赵烈文当时就写下了“殊咄咄可怪”的抱怨。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在致郭嵩秦的信中就谈到了自己首鼠两端的艰难处境。他说：“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看疑忌。”所以太平天国起义一被平定，曾国藩马上就将自己直接指挥的十二万湘军分别交由左宗棠和闽浙总督沈葆楨。除此之外，对于最让清廷不安的曾国藩部五万余人，他先上奏清廷，急言湘兵暮气不可用，精锐不如淮军，请尽行裁撤；同时还奏请将曾国藩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以及自停部分厘金。果不出所料，疏上之后即得到清廷的批准，这也意味着曾国藩不得不就此远权避谤以自保，自善其身而难以兼济天下。其弟曾国奎解职返湘之后，甚至出其所得，广置田宅，蓄姬妾，奢侈逾恒。曾国藩闻之大惊，遗书谓人言可畏，弟犹不自敛，抑是速亡。可是，曾国奎阅毕此信，却掷书于几，对身边来客说：“吾兄真书痴不解事，然宁不读汉《萧何传》乎？”即指汉初萧何听从朋友规劝，多买田地财货以自污，最终解除了汉高祖的猜疑和恐惧。

但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困窘是，以曾国藩的实力和威望，却又能不另立新朝而重开历史发展的新生机。毕竟，鼓动其谋清鼎者也大有人在。同治二年（1863年），湘中名士王闿运拜谒曾国藩，谈及此事，刺刺不休。曾国藩仅唯唯，且以指酸杯中茶汁，颇有所点画。

后曾国藩因事少离，王窃起视之，见所画者皆“荒谬”二字。当然，王闿运原本为一狂生，自负霸才，劝曾国藩本不足为奇。不过，劝曾国藩乘帆夺清之江山者，却还有湘军将领胡林翼、彭玉璜、左宗棠等，而且郭嵩焘、李元度也都有过暗中活动。如安庆克复之后，彭玉璜迎曾国藩东下。舟未抵

岸，彭遣亲弃以密函云：“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尸曾国藩阅后即面色立变，急言曰：“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当下撕而团之，纳于口咽焉。

一个解释是，其所以不愿效宋太祖之故事，并不因为他对清统治者还怀有某种特别的眷注和期望。早在咸丰帝登基之初向天下征求直言时，曾国藩也曾连上两疏，请在人材选拔和军政重整等方面进行整顿。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之后，曾国藩又以“济世以匡主德，结人心。求人才为要”，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疏于咸丰帝。该疏针对咸丰帝自征言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大臣虽献纳不下百余章奏，但咸丰帝都以“毋庸议”三字不了了之。对此，曾国藩愤怒地说，这是以书生之血诚，徒供肯吏唾弃之具。并进一步指出此时朝政应防“琐碎之风”。“文饰之风”和“骄矜之气”。即谏讽咸丰本人在处理政务上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且出尔反尔，自食其言，饰非拒谏，等等。此折上达之后，咸丰帝被览未毕即怒掷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只是由于祁隽藻等人的苦苦求情，曾国藩方免于获罪，从此，曾国藩再未对清廷的政治革新进一片言只语。咸丰末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清廷急促湘军鲍超部北援，并指定由满人胜保统帅。用胡林翼的话说，这一重大政策是朝廷挟君命以谋楚兵。可此时最让曾国藩担心的还是安庆和江西方面的战事，所以不愿将湘军主力抽调北上。但清廷飞檄，要他先救君父之难。

为敷衍朝旨，曾国藩提出让清廷在他与胡林翼二人之中任选一人，督师北上，拱卫京畿。在讨论此事致胡林翼的信中，他写道：“默观天下大局，尤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由是可见，曾国藩固然生性谨慎，可能是不愿以篡夺而坏忠贞之节，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确实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天下罹难已久，民心思静。就在南京被湘军占领之后，曾国藩视察战地，目睹颓垣败瓦，满目凄沧；周围的将士也全都荒衰枯萎，神色非人，深有所感。特命在钟山脚下，立一石碑，上面刻有：“穷天下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先生说：湘军平定太平军，名言非正。在他看来，洪秀全以受压迫的汉人反对满洲统治者，无可非议；但其不修德政，大行暴戮，并鼓吹基督教教义，所以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保卫自己的乡里，非赞清也。尤其是这一代士人身居高位，却仍能保持山泽之仪而不替，遂使“下吏化之，不至于好，初政十年，吏道为清矣”。

五、最严厉的挑战

最严厉的挑战来自于改革者的自身缺陷。

在一个风气已经大坏的社会里，矛盾的空前尖锐和激化，淬然变政却又极易革新和守旧的相贱、相夷、相倾、相残，毕竟，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制度变革都是作为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它不仅意味着政治层面上某些机构和法令的废止以及某些政治人物的生死荣辱，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可能导致全方位的社会震荡，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一向强调“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具体到光绪皇帝，面临的困窘一方面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大臣多在消极静观或竭力反对；另一方面依靠之人又大都是阅历较浅，职务较低和并无政治实力的年轻书

生。

对康有为来说，反对者的强大压力和自己地位的轻微，不以危言激论就难以发挥效用，所以，在思想层面上，他以圣人自居，附会经义，声势夺人，大倡此时治天下当取开创之势，而不当以守成之势；当以列国并立之势，而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在现实政治中，又危言耸听，过于急功近利。一次召对中，康有为竭力鼓吹自己的变法主张：西方列强的社会发展用了三百年，日本只用了三十年就由弱为强，以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就可以自立；然后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所以，对于光绪皇帝来说，变法国强如一反掌耳。

光绪帝为之说动，认为条理甚详。接着，康有为则问：皇上圣见即已及此，为何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皇帝则目眼帘外，既而叹曰：“奈掣何？”鉴于此，康有为针对当政大臣的奎毫守旧，条陈将官制的改革置于所有变法措施的首位，认为如果不能切实握有政治大权，那么整个改革就犹如琐碎拾遗，终无当也。具体的方法是在北京开十二局和在各省设立民政局，选通才以任新政。然后光绪皇帝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陆续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以及最终废除八股，改用策论取士，这些主张后来陆续为光绪皇帝所推行，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庸沓政风却早已“轻舟已过万重山”，以至康有为非常愤慨，认为自己所提出的虽没有人明确反对，且都为可行之事，但“虽奉旨允行，而此折义皆为虚文矣”。原因当然在于维新变政极大地触犯了那些特权集团的利益，“全躯保位借名之人，每不肯为之”。

如对社会震动最大的首在裁官。当时，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因之失职失业以及被涉及连带关系的有万人之多，“朝野震骇，民不聊生之戚”。尤其是守旧势力乘势煽惑，流言纷坛，传言康有为请开制度局，乃是要尽废内阁六部及各省的督抚。藩桌司道等官员。京朝震动，外省惊惊。面对康有力的这一请奏，守旧大臣自然就认为：“如是则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

除此之外，梁启超等在戊戌年间联合数百名激进举人连署直书，请求行政当局废弃八股取士之制，时值各省万名会试举人云集葶藶之下，都与八股性命相依，听说梁启超等欲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他们也遍播谣言，以至梁启超等“几被殴击。”后来，光绪皇帝采行康有为的建议，下诏将这一年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大批八股士人骤然失业，怨恨康、梁等人益甚，甚至有些直隶士人准备行刺。与此同时，光绪皇帝下谕劝勉亲贵子弟出洋留学，以及亲王、贝勒的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又使得满洲贵族震动。他们将此视为破坏中国之礼法，且又使满洲权势处于危险之域，新旧相攻，门户水火因而演愈烈，一些当道王公也都谣传新党人士污秽宫闱之语。实际上珍妃久禁高墙，光绪皇帝欲一见都不可得，何况康有为这些“外人乎？”而且，康有为等新党人士注重的也只是现实政治层面的变法创制，却忽视了自身道德的约束，以致身处险境，高不知危，满不知溢，明于治国而昧于治身，给予反对者以口实。据时人记载，一次，荣禄谒帝请训，适康有为奉旨召见出来，问康有为以何辞奏对，答之曰：“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荣禄惊骇。

洋务派重要人物的张之洞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极为反感，多次劝其不要再发表这方面的言论，作为交换条件，表示愿提供由改革派人士成立的“强

学会”活动之经费。康有为却说：“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哉？”另一些维新之上，如谭嗣同，与之相识的费行简就认为其博辩喜事，滥交寡识，并非任事之才。杨锐、林旭等又为温雅调整词章之士，更鲜老谋。更有甚者，一些维新志士浮华少实，如饮狂药。康有为奏请成立制度局一事，早已物议沸腾，可新党中少年却到处议论，说某官可裁，某人宜去，现正奏请皇上查办，皇上即将发下圣旨，诸如此类，肆意矜张，从而使得形势更为紧张。在这次变法中，洋务派官僚态度本来较为暧昧，康氏一弟子日出狂言说，顽固老臣，阻新法尚力，但过不了几天就有圣旨斩刘坤一。李鸿章首，以后令行如流水。与之相似，维新志士在上海办的《时务报》，其内部也充满了私意忿争，有挥拳相向，以至杭人某伤粤人某；接着就有杭、粤两地士人分为党派，势不两立。

所以，当时已颇有声望的东南士绅张春最初滞留北京，看到康有力的变法只是遍谒当道，见辄久谈，或频诣见，到他的住所，见其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扬，且宾客杂沓，颇不以为然，“微讽之，不能必其听也。”康有为之弟，即戊戌喋血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也深深地担忧其兄规模大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大孤。举行太大，曾劝将变法重心放在废弃八股之上，只要民智能开，即宜速拂衣而去。早年，康有为一次路过广州华德里之门，忽然有一飞砖掠面而过，只要再偏寸余，就可能击在脑上，顷刻可死，但这却使他深信生死一向有命。所以，康有为对他弟弟的担心说：“有圣主在上，吾以救中国，岂忍言去哉？”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给人的印象就不是一个稳健的改革者，以致日本近代著名政治家，也是明治维新的主持之一的伊藤博文在戊戌年访华时就私下对李鸿章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另一方面，作为变法中流砥柱的光绪皇帝立本未坚，仓促行事，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行政运作的规则，使问题更加复杂，维新期间，光绪帝欲从康有为之请，开懋勤殿，命谭嗣同拟旨，同时又吩咐内侍把历朝圣训交给谭氏，让他以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开懋勤殿故事引人上谕，作为根据以便再请于慈禧。以前，康有为曾对其说过光绪无权，谭嗣同不信，退朝之后即对人说：“今而知皇上真无权矣。”所以，在整个变法期间，左右枢臣皆为守旧，光绪皇帝却无权去之，只得命杨锐等四人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拜命之日，光绪皇帝亲以黄匣缄一朱渝授予四人，鼓励他们竭力赞襄，无所瞻顾。其时，凡有奏折，皆经他们阅览；凡有上谕，也都由他们撰拟；名为章京，实与宰相无异，这又使得军机大臣和政府内阁形同虚设，政治无章法为归。

平心而论，慈禧最初并不全然反对变法。变法酝酿之初，正值德国以偶然事件夺我山东胶洲半岛，举朝无策，光绪帝遂流着眼泪对慈禧说，他再不愿当亡国之君。因此，慈禧的承诺是如果变法真能致富强，“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而且，自光绪帝推行变政以来，未敢自专，所有举措莫不先赴慈禧前禀白，而后宣示，慈禧对之也多能容忍；甚至说：“汝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到戊戌年六月光绪皇帝准备陪同慈禧乘火车往天津阅操，都中一些顽固守旧的官员听说太后冒险坐火车，认为大非帝王尊贵之道，相顾惊骇；慈禧却以自己从未坐过火车，将之视为有趣之事。此外，慈禧重臣荣禄虽不赞成新政，但对于光绪皇帝决心改良陆军，也还积极支持。只是在光绪皇帝下诏裁撤一切阑冗之官，慈禧太并才发生急转。紧接着，维新人士，时任礼部主事王照的上书被礼部尚书许应及太后亲属怀塔

布所格，光绪帝一怒将他们俱行革职，帝后“矛盾才更加尖锐和对立。然而，反观王照所上之书，有请光绪帝侍太后出洋游历，先往日本，以次继往欧美各国，且不论这本为守旧人士极为反感，就在当时也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唯一的意义却是使守旧大员”群往颐和园求救于太后，请太后重新执政。”政变当天，用局中之人的话说，慈禧手无一兵，潜入宫中，制慈禧如孤鸟。

下篇

一、 重塑知识的尊严

重塑知识的尊严，此乃治国之大根本。

中国文化精神向来认为，天道剥而必复，人事愤而后启，不断加深的政治危机和道德沦丧直接引发了一批宏毅猎洁、刚直介特之士对文化的坚持和理想的追求。在学术层面上，体现为蔡元培和王国维等人，以其筚路蓝缕之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就蔡元培而言，其努力的方向固然是被后人称赞的“思想自由”和“兼容并蓄”，但这背后却有其道德和理想的考虑。在他看来，中国社会自民国以来，士风日敝，民俗日冗，根本的原因还是学术日见消沉。为端士习，正学风，他首先重建的就是精神的尊严。在他未去北大之前，北大已是斯文扫地。当时北京的小报广为刊载的是两院一堂，被讥为探艳团也；某公寓，被视为赌窟，捧坤角也；整个北大则是一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也，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即规定教师若为官吏者，不得为学校教员；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能以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说，在大学的讲堂上，身位教师者不求新知，以沿袭塞责；然校方又以资格作为衡量尺度，不重研究是否有心得，教育界奄奄无气，“又安望其影响及于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在当年反清革命的腥风血雨中，他激励亢奋，多次出生入死，甚至一度还主张“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但在此时，他深切地体会到，欲使中华民族人格自立，政治清明，只能求之于学术。就如“五四”风潮平息之后，他反复告诫北大学生：要想永久唤醒中国的民众，青年知识分子必须努力扩充知识，高尚志趣，纯洁品性，然推寻本始，就“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所以，在那动荡的时代里，面对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他更多的是对学生们献身精神的深切同情和理解，知道这些莘莘学子们迫于爱国之心，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求学时间和心力，与衰朽政治相抗争。就此，他多次指出，学生抗议运动的频繁发生，实为大多数国民漠然于国家之安危；而一部分有权力者又日以沦丧国家为务，以致唤醒无意识之大多数国民，重建社会公正和我民族之未来，“非学生而谁厂因此，“五四”运动之后，当一些上街游行的学生被当局拘捕，他挺身而出，愿亲自抵罪，保出所有被捕的学生。后来，被捕的学生被营救释放，返校之时，他又“含着眼泪，强作笑容”，亲率北大全体教职员在汉花园经红楼前面的广场迎接。

与之相同，还有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虽则，王国维以研究中国学术，考订中国古代史料。古文物中文字学、音韵学，并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及历代石经的考释，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贯穿了一种文化精神和道德理想。早在1902年秋，正值近代中国留日风潮大盛，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东京留学，在目睹留日学生组织的一系列政治活

动之后，王国维意识到，在一个没有知识和道德的政治环境中，这些激进知识分子鹜于血气，结党奔走，将来的发展可能就是贤者以须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因而更专心于学术。在他看来，对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生一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给国民带来物质上利益；而文学般社会乎？”为摆脱以往将大学办成养成资格和贩卖知识的政府衙门，将大学办成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和思想中心，他大力强调学者应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尤当首先养成学问家的独立人格。如报考北大未被录取的梁漱溟就以自己《究元决疑论》的论文，被延聘至北大任教，蔡元培看中的是他有研究的兴趣和卓越的思想，而后来梁漱溟果然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自成一家。与之相应，在学术方面坚持学术的分歧应通过正常的学术争论来解决，所以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既有激进反传统的陈独秀、胡适，又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还有拖着小辫，力主复辟的辜鸿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以及桐城派的黄佩等人。

当时最让他震惊的却并不是这一时期的功利所在，学者争趋形势之途的恶劣学风，而是整个学术界的大儒噤口，后生倾风的颓靡士气。他曾写有：往昔昏浊之世士大夫中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亥汉党人，南宋道学，明季东林，如今众浊独清之上，竟只能蹈蹈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未俗，“诚千古未有之现象也！”因此，为不被时俗污染，他砥节励行，始终保持一介书生之本色。民国以后，先后任过三年部长和大学学院院长，十年大学校长和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却没有为自己置片瓦私产。上海的住房是朋友和学生们实在看不过去；大家凑款购赠；逝世时除几千册书籍外毫无金钱积蓄，丧葬费用都还是凭借朋友接济和政府补助所支付。尤其是，为使学术保持理性和对现实的超越，他又坚持将大学作为最高文化之圣地，恪守共同尽瘁学术之理想。当时，他反对学生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如1919年5月4日那天，他站在北大门口，声嘶力竭地苦劝学生们不要上街游行。后来劝阻无效，学生们一意孤行，他则决定引咎辞职。

从蔡元培的思想发展来看，反对学生参加现实政治运动，既非怯懦，也非是其参与政治热情的丧失。毕竟，他曾有过职业革命家则能给国民以精神上利益。物质利益，一时也；精神利益，永久也。所以，他一生学术三变：早年治哲学，中年治文学，晚年治经史之学。

终使他转向经史之学的还是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切感受和强烈责任。辛亥之后，他和罗振王东渡日本。当时，罗振王对他说：自乾嘉以往，学者们都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以至晚近更为变本加厉，认为中国诸经都是伪造；现今学者接受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如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可流弊却愈来愈多。因而要使中国三千年教绎不绝如线，非矫在不能返经。即劝他专研国学，勉之曰：“士生今日，万事不可为，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未由也！”罗振王后来记述道，王国维听了这一番话后，惧然自忽，取行篋中《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至是，专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并旁《书》以求其文之义列。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

清末民初，正值殷墟甲骨大量出土和敦煌石室写本古籍大量发现。王国维拥英、德、日几国外语之长，其治学又能从弘大处立脚，从精微处着力。主要方法有三：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因此，在近

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王国维治学守先待后，有其不以措笔者。

如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的姚名达回忆：当时他受业于王国维《说文》一课。一日课后，姚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他原以为这篇文章是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说，而断为七年或十年。不意，“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

就其政治倾向而言，他在清朝仅一青衿而未通朝籍，民国之后却始终古貌古饰，强直励节而恪守伯夷。叔齐之志。令人惊诧的是，王国维虽身高不过一米五十，常着一身青马衫、布裤、扎着腿头和布鞋布袜，行动迟缓，满口宁波腔，留一小辫，在清华园里却十分引人注目。据他的儿子回忆，每天早晨漱洗完毕，为王国维流头的总是妻子。一次，妻子不知太忙，或有什么烦恼，嚼咕道，“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还留着做什么？王国维回答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当时，北大学生见辫子就剪，王国维常出入北大，但都一直安然无事，可能因为他有一不怒而威的外貌，遂使一般后生不敢贸然行事。

1927 时德辉、王存心之事传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那些恪守传统文化的国学家里眼中，时德辉平日并不自爱，罹此灾祸，也还可以说有自取之道。但王谲心为七十岁老人，平日乡里德望甚重，只因信中写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就被拽出，极端羞辱，卒致死地。“静安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瞑不复视。”就在决心自沉的前一天，正逢清华研究院学生毕业，同学公宴各位授课导师，王国维仍谈蒙古之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甚深。”是晚，王国维阅完试卷之后，草遗书怀之，熟眠如常。翌日，投颐和园昆明湖而亡。遗命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先生究竟为何自我？1923 年王国维被清逊帝溥仪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优俸。1924 年 11 月，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并将清逊帝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当时在场共议其事，后随驾至醇亲王府。其时，自刃炸弹，夹车而行，已有死志。这一年底，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为清皇室破坏大富山古迹发表宣言，文字中直呼溥仪之名，并要求政府收该地产为国有，王国维则怒而为清皇室辩解道：“民国对清逊帝条件规定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该《宣言》中指斥御名至再三，不审世界何国对外国君主用此礼也？”又说北大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立大学，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与其保护财产之法律，必有遵守之义务。

“况大学者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又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卤莽灭裂如是也。”并辞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职务和撤回已送该校之稿件，以求抗议。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之所以非自沉不可，似可理解为梁漱溟后来所言：“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借吾身。”所以，1929 年 6 月清华国学研究所师生集资建立王国维纪念碑，陈寅恪先生撰写碑文，强调王国维自殉的文化精神因为士之读书治学，就是要将其心志脱于俗谤之梗桔，真理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所以，尽管王国维的著述或学说，可能有不足或商榷之处，“准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久，共三光而永世。”

二、高扬一杆反传统的大旗

与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密切相关的学术思想，有两个最为深刻的主题：一个是破坏，另一个就是建设。梁启超说，古今建设之伟业，莫不含有破坏之伟人，亦靡不饶有建设之精神。“实则破坏与建设，相倚而不可离，而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所以，在国人精神困顿委琐已久之时，陈独秀则以大刀阔斧之力，冲刷和洗荡了一切黄茅白苇之习，使中国学术思想顿换一新天地。

单就一般意义的学术来看，陈独秀记诵名数。搜剔遗逸，在学术研究的问题方面，建树不多。1917年，蔡元培聘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出掌中国最高学府之文科，北大一些教授就以他学无专长，只写些策论式的时文而反对这一任命。后来，蔡元培以其精通训诂音韵，并举出他有相关的文字学著作，终使风波渐渐平息。但那些文字学研究，如二十年代由上海亚东书局出版的《字义类例》，作为他第一部学术专著，却是1913年“二次革命”后被倪嗣冲追捕，蛰居上海时的社门之作。以后的一些相关著作，包括三十年代初撰写的《中国音韵学》，《连语汇编》，及没完稿的《例、学识字课本》等，也都是在政治斗争中被排斥、被批判，乃至被诬陷中的不得已之作。学术上的价值，可能如梁实秋所言，用科学方法将文字重新分类和用新的观点解释若干文字的意义，内容简明扼要，易于了解。作为思想界一时的领袖和新文化运动之主将，陈独秀以中西学术作为其思想的根基。首先，他“中学”有一定功底。陈独秀虽以极轻蔑的语气提及自己考中的“入股秀才”，是用不通的文章蒙骗了不通的大宗师，但自幼熟读经史，以后读《昭明文选》渐渐读出味道，其诗作思想高，气体称，胎息厚，颇有宋人气象，应当说“旧学”功底还是不错的。其次，他“西学”也有所专攻。留学日本期间，他研习日文，并能用英文、法文看书；同时撰文介绍欧洲文学思潮，还与苏曼殊一起翻译英诗。据章士钊说：《神州日报》所载《论欧洲文学》等论文都是陈氏的作品。可见，一般意义上的学术非其心志所在，全力以赴的恰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扫歪拨雾，摧陷廓清，1914年，陈独秀曾在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一天早上，章士钊见其黑色衣衫满是星星白物，骇然曰：“仲甫！”

是为何也？”他则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同年，他首次用“独秀”笔名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针对当时风行的爱国主义，提出“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遭人署非。虽则，李大钊说，读过陈独秀之文，伤心无已，“有国如此，深思挚爱之士，苟一自反，更无不情智俱穷”。这都表明陈独秀所持的正是一种不愿与之共立，宁愿与之偕亡的极端心态。

辛亥之后的政治黑暗和社会腐败，使他更相信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未曾进行过彻底的文化和思想革命，他曾对汪孟邹说：“倘若能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改观”。认为中国社会继学术觉悟、政治觉悟之后，当应进入到伦理觉悟的新时代，即“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因此，他主持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实际上是要再造新时代社会伦理。其现实途径，则将锋芒指向了中国传统礼教——儒家的三纲五常，同时大力倡扬近代西方的伦理道德——自由、平等和独立。他专门撰文指出：东西方之间各自的价值取向，犹如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其差别在于：（一）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恶斗死，宁忍辱，爱平和；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恶侮辱，宁斗死，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二）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俱听命家长，又有宗法制度的种种恶果；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个人

主义，个人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三）东洋民族以感情、虚文为本位，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生机日促；西洋民族以法治，实利为本位，社会每一个人都互不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生计，成独立人格。如是之故，《新青年》以反孔和批判中国传统纲常伦理相鼓吹，并认为这一觉悟应置于国体宪法问题的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不过，陈独秀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认为儒术孔道没有优点，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当时，在思想上高揭复古之帜，力主倡明孔教的是康有为。就思想原则来看，本无可非议。因为他向以孔教教主自居，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他著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先后刊印，就被守旧人士攻击为“假素王之名号，行张角之秘谋。”公车上书（1895年）之后，他赴礼部应试，试题恰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康有为在试文结语中写有，“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出言之狂，房考阅之，咋舌弃去。也就是这一年，他出自侍郎李文因门下而成进士。但李文因也恶其敢为诡诞，殿试时故意将他的试卷抑置为三甲，仅授工部主事，不得翰林。

康有为十分气愤，自削门生籍。此时，章太炎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一日，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问道：“康欲作皇帝，有所闻否？”章：大炎答曰：“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关键在于辛亥之后，康有为与衰朽政治流淫一气，这一主张实际上是为反动统治的思想专制推波助澜。而他自己也曾致书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极力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学校不准读经，不准尊孔。他说，共和以来的弦歌息绝，礼崩乐坏，就是因为“国家尊器而忘道，学子媚西而弃中”，要求学校恢复读经，以维国运。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自有博爱。平等、自由之精义，新学倡导者却家有锦衣而宝人敝展，反向西方思想顶礼膜拜。1912年他授意学生陈焕章出面在上海联络沈曾植、梁鼎芬，发起成立孔教会，并刊行《孔教杂志》。1916年秋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而作为反动统治的北洋政府，此前有袁世凯通电尊崇孔圣，宣称要将孔子教义作为民族精神，并恢复祭孔典礼，但实际上却是恣肆欺诈，背叛民国，以帝制自为，玩人褻天，原本就是对儒学思想精神最无耻的践踏和歪曲；此后军阀们都纷纷推行尊孔读经，同样也是其钳制人心。粉饰涂遮的下劣骗术。那么，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政治批判，陈独秀等人就提出儒术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宁愿甘冒全国学究之大骂，又高张“文学革命”之大旗，进一步推动了当时又已停顿的道德重建。如自1917年起，《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动旧文学，旨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一场彻底的精神革命。但这最初只是胡适从美国寄回来二封信，原意是要文学改良，即首先进行的是形式上革命，包括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和须讲文法结构；其次则是精神上的革命，包括不作无病呻吟、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和须言之有物。但到了陈独秀这里，却以《文学改良刍议》为题将胡适的思想进行了全新的改造，明确提出要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将这一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转换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革命。陈独秀认为，所谓文学革命，就是政治革命。犹如近代世界史上革命时期的政治、宗教、伦理以及文学艺术所莫不进行的革命；而中国自辛亥以来虽有三次政治革命，即

因国人精神方面的伦理、道德、文学和艺术垢污深积，黑幕却未稍减。所以，“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我国据以运用此政治精神界之文学”。但胡适在美国看到这篇文章后却致信陈独秀说：文学改良原本是他个人私意，目的在于引起人们的讨论，且此事的是非不是一朝一夕，一两个人就能决定，故建议“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陈独秀的回信则是：“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

三、平民主义

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作为一个思想运动，其后的发展虽并未如林纾所言，“则凡京律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但反映出的却是一代学人致力于知识启蒙，欲使学术平民化的努力。具体言之，这时最让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着迷的是文体变动。平民学校、通俗出版物、工读互助团以及各种形式的平民教育演讲团。其盛况空前，一位生活在当时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写道，他每晚走过马神庙，总能看见许多壮年的、青年的、幼年的男男女女，挟着个书包，走向北大的平民学校，感触极深，联想到国内各地各学校所设的平民学校，受教育者总数至少在几万人以上，这也是“五四运动以来唯一显著的成绩。”仔细辨析，这一时期平民主义的兴起，又首先反映出在中国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的过程中，主体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以往肩负责任和使命的，一般都认为是精英人士，如政府官员、儒家士大夫，坤商和中产阶级，但此时青年知识分子则说，“平素我最钦佩的就是头脑简单、人格高尚、着短衣的劳动界。”毕竟，现实场景中，精英象征着腐败。当时的中国，作为精英的那一批人，不论是政府官员、商人、绅士、抑或知识分子，大都是以自己的权势从蠹朽政治中分一杯羹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对权威和精英的蔑视和反抗，一方面是提倡“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激发下层社会的阶级意识，以形成与腐败的上层社会相对抗的斗争态势，并最终通过缩小社会中上下之间的等级差别，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社会结构。他们说，中国数千年文物政教，几为士阶级垄断；孔学定于一尊，又助长了偶像观念和禁锢自由思想的流弊，“学术的平民化，诚为今日救时之良药”。

其潮流激荡，天下顺从，与工农相结合即成为一种风尚，以至“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另一方面，这一认识的转换还伴随着他们日见激烈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贬斥。如有人就曾痛苦和认真地写道：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蠢民。“他们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个人户所以，当“劳工神圣”这一道德理念被不断强化之时，恰如“珠玉在侧，觉我形秽”，最让他们自感惶郁不安的竟是其作为一社会阶层赖以存在的文化责任和阶级特征，即：“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其次，这一转换又体现出时代精神的发展已从国人单纯向西方学习；追求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文明的怀疑和批判，这里思考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是否应是中国未来的方向，事实上，近代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发展，

不仅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层面上破坏了传统农业生产关系，而且在文化层面上也瓦解了传统社会的道德风尚，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所以，早在1919年春，李大钊就写道：“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上的生活，几乎都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生活，全是人的生活。”所以，他号召青年们，“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身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进一步发展，如“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受托尔斯泰的影响，试图在中国推行托翁的泛劳动主义。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不论什么人没有剥削他人劳动。掠夺他人储积和他人生产物的权利，并猛烈地批判建筑在财产和金钱之上的资本主义文明所制造的种种压迫、刑罚、战争和欺骗，提出要消灭种种罪恶，就必须每个人参加劳动。“人人自劳而食（此为根本），什么财产啦，资本啦，一切为罪恶源泉的东西，都无存在之必要。”在那时的俄国，托尔斯泰身为贵族，对其主张身体力行，每年三季作工，一季到莫斯科经营出版事业，并将自己的思想写作成书，印成许多小册子，拿到农民间散布，这都使其中国的追随者们感叹不已，赞之曰：“现在俄国今日的改革，这位托先生的力量真不小呀！”劳动既然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意义，因而也就被视为人生最大之义务，“故亦为最大之善行。”于是，王光祈以风行中国，由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提倡的新村运动为参照，准备在离城约四五里的乡下租一可供十余人种植的菜园，菜园中盖有中式建筑的两层楼房一幢。楼上有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楼下作卧室、饭厅。园子西南角建一厨房，东北角建一厕所。房后建一球场，园于周围挖一条小溪、溪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还有竹篱。

王光祈还设想，在这里生活的人每天只须种菜两个小时，读书、翻译各三个小时，然后游戏和阅读报纸。当然，读书和种菜只是满足个人的需要，每个成员还须为社会稍稍尽力，所以每人还得翻译欧洲的学术著作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译书所赚红利除纸张印刷费用外，一半作为译者津贴，另一半作为共同生活的费用。新村还准备设一平民学校，附近农家子弟均可免费入学，每逢星期还要召集他们开一个演说大会，放幻灯和留声机。这样做的文化和道德意义，如王光祈自己所言，我们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天真烂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结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片，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些思想都遇到了极大的障碍，根本无法实行。如工读互助团是这一代理想青年在城市中采行的生活方式。其原则不外打破私有制，工作归团员公有，各尽所能和各取所需。1919年底在北京先后成立了三个这样的小组，经营的项目主要有食堂、小商店和食品店。此外，在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等地也先后成立或筹备相似的团体，但很快就都在现实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纷纷夭折。如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就有食堂事少人多，入不敷出，每日亏本；连在食堂里作工的八个人都没有了饭吃；原准备以放映电影增加收入，看电影的人却很少；洗衣办了两个星期；才收了七十几枚铜子；外面的衣服一连三四天还没有收到二十件，只得专门洗自己的衣服。而且人心涣散，成员中有的要求脱离家庭，有的要求脱离婚姻，还有的要求脱离学校，过共产生活和男女共向生活。所以，即使没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会因意见分歧而难以维持。至1920年9月，

这些团体大都销声匿迹。但这种理想主义却因本为时势所激，情感多于理性，在遇到现实生活中难以克服的障碍时，一些热血青年即认为未来的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已不能简单地将现存社会等级制度改良或改造，而是要通过激进的方法，以社会下层认为更为公正、合理、平等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正如从杭州到北京参加互助团的成员施存统，在参加北京东城根附近的达教胡同一个名为“曦园”工读团体的实验失败后，绘友人信中写道：“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激进革命意识的形成，标志着时代精神从文化层面向政治层面的伸展。如一向主张先进行伦理觉悟的陈独秀也形成这样的认识：社会万不可以主观想象随意改造，须用科学，即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去进行。实际上，1915年《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创办发行之时，适逢筹安会成立，《青年杂志》对他们的活动有过专门报道，却并未更多的评论和指责。未几，一位署名“王庸工”的青年写了一封读者来信。认为《青年杂志》应以察论阅议，唤醒青年为急务，对杨度等人发起的筹安会，“切望大志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国民幸甚！”《青年杂志》的作者却答之曰：对于筹安会所为，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因为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至1918年7月，陈独秀等恪守不谈政治，专注文化建设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

他指出编辑部的同仁及读者往往不以谈政治为然，有人主张“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陈独秀则认为，国人对政治问题不应装聋作哑，对于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彻底的觉悟，要急谋改革，否则“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甚至为更好地参与现实政治，他们又着手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更短。

并更直接批评现实政治的《每周评论》。

1919日，他起草了“告北京市民宣言”的稿本，先交由胡适译成英文，然后与高一涵一起到篙祝寺旁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制所去印刷。印好之后和高一涵来到中央公园的茶馆，将《宣言》放在没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吃茶的人看到传单都大声叫好。三天后（6月11日），他又到新世界散发这一传单。由于身着白帽西服，上楼下楼甚为频繁，且兜中膨满，自然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随之就被拘捕入狱。对此，时为北大预科学生的罗章龙后来回忆道，“五四”前后的陈独秀所以能登高以招，顺风而呼，关键在于他所主张的直接行动更是符合和代表了一大批激进青年的心志。“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然而，对陈独秀来说，思想骤然的转变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主张中国站英法一方参战。认为中国只要参战，就可能会在将来有列席和议之权，从而改变近百年以来国人被屈辱和受奴役的历史。可是，一战结束后在巴黎召开的对德和约会议却是列强按其国力所进行的分赃，这不禁使那些幻想这次会议将体现人类公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失所望。作为一代青年思想领袖的陈独秀，怨忿和愤激之情更是溢于词表。和会未召开之前的一个月，他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和平意见感动不已，此时却嘲笑这位总统提出的多半是不可行的理想。而当和会不顾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陈独秀更是绝望万分；与之同时，国内局势

又更加恶化。如少数政治精英为讨论结束军阀混战而在上海召开的南北会议也毫无结果；他即认为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并声称自己已形成了对内。对外的彻底觉悟：对外决不能单纯依赖公理；对内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政府。”这就是说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

四、法律高于一切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现实社会的严重危机国学术思想界不断提出效法泰西的变法主张，但衰朽政治昏然不思振作，屡屡置之高阁，以致于这些思想付诸于实践只能通过历史的巨大灾难。如清廷以海军衙门武备学堂之名，重修颐和园工程，遂使海军羸弱不可恃。“越十年，遂有东藩之役”，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国惨败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尽管从双方军力和综合国力的比较来看，日本略占优势，但战争进展异乎寻常的顺利，关键就不在于技术和装备，而是一个新兴帝国主义与一个腐朽专制统治，两种政体的较量。

第一战日本就吞并朝鲜，第二战日本突入辽沈，第三战日本夺走北洋海军陆上基地威海，第四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廷则不得已弃朝鲜，割台湾，以银三百兆两议和，国家财政更加紧张，贫弱几不能立国。

与之同时，这场战争给国人的震撼极为强烈，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产生的深刻影响，严复先生评之曰“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一日，中日即将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更是朝野欲动。当时正值各省举人汇集北京应试，广东举人康有为首先得知，即与梁启超等乘势鼓动粤中公车，湖南举子随后附和，上折请清廷拒绝和议。到了二十八日，粤、湘举人同递，各省俱被感愤，纷纷上书，顿时“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康有为等见士气可用，又通宵达旦起草万言书，准备联合十八省举人再上书清廷，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筹战守以图自强的政治变革要求。表示愿意签名者约1200人，但清自顺治年间就有不准士人干政的严格规定，主政重臣见有千余举人公车联章，意图阻止，并妄造非言恐吓。很多士人不愿再冒政治风险，上书之议方被搁置。尽管如此，这一次上书却极具历史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晚清之士气稍伸，实自此始”。

早在这之前，康有为就曾以布衣身份伏阙上书，请求当道大公顺应潮流，学习西方，变革政制。

就康有为的变法思想言之，经世之怀一方面强调平等和人道主义。在他看来，为学有“为我”和“兼爱”两个方面。具体言之：“兼爱”作为仁之极；“为我”作为义之极。所以，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最终就在于建立一个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的大同世界。甚至他所勾勒出的理想社会不仅人人如一，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而且还无男女之异。他说：“分等殊异，此狭隘之小道也；平等公同，此广大之道也。”另一方面康有为理想的社会只作为一渐进改良的过程，现实的发展首先取决于行政当局“内修政事，外攘夷狄”的政制变革。毕竟，在他看来，此时的中国社会虽经世人赞誉之至的同治中兴，但这绝非是一个兵革不举，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其背后预伏着“四夷逼于外，乱民作于内”的深刻危机。尤其

是对频频出现的天降灾异，大告警厉，统治者们却仍然酣德偷情，苟安旦夕，他譬之为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因而极力倡扬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其中心思想是强化中央权威，使政府决策能够得到坚决贯彻和政治权力能有一相应的法律制约，即下情既亲，无不上达。

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来到了北京，时值清廷上兴土木，下通贿赂，主政重臣孙毓汶与李莲英密结，把持朝政，群僚皆以贿进。

大臣退朝，即拥媚优，酣饮为乐，士大夫们也纷纷掩口不语。鉴于此，康有为奋起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请朝廷效法日本变法致强，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疏上至翁同龢和处，翁氏以康有为所说大为汗直，退还。京师之人“咸以康有为为病狂。”然而，久旅京师，康有为对朝中局势已很熟悉。尤让他愤恨的是眼见这个国家日见衰亡而不能救；不禁萌发了漂流于海外的想法，准备行教于美国，或经营殖民地于巴西，在那里重建一新中国。后来，限于财力，家中又有老母，只得决然舍归，专意著述。光绪十六年（1891年）康有为开讲堂于广州长兴里，大讲求仁之义，志在“雪祖宗之忿耻，恢华夏之声教，存圣伦干将混，维王教于渐坠”。

与此同时，康有为从中外历史发展的具体事例，探求拯救中国的方法。为给自己的变法提供理论基础，他甚至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把从东汉以来作为中国政制基础的经学，多斥之为汉代刘歆伪造；并大胆倡宋人所遵述的中国文化之经典多系伪造，而非孔子之原典。此外，又将孔子视为制法之王，创立“三统”、“三世”说，强调政治变革的重要历史意义。

然而，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看，康有为位卑而权轻，毕竟很难被现实政治所接纳。

但是康有为痴心不改，仍然义无反顾地慷慨上书，寄希望于最高统治当局立救败冤。用康有为的一句话说，就是——“忠爱之心，不摩则冷，学行之事，不激则流。”历史后来证明，康有为是正确的。

法律高于一切。

五、再祭乌托邦

1851 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的精神之父是洪秀全。他接受西方基督教思想，是在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被录取，决心从事反清革命开始。当时，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劝世良言》，早在 1836 年他第一次赴广州应试就已得到，却一直搁置在旁。据洪仁轩回忆，1843 年，他在离家乡约三十里路的莲花塘教书。一日，表兄李某参观其书馆，偶于其藏书中抽出《劝世良言》，遂问其书中内容。洪秀全答以不大知道。李乃借回家去阅读，读后还诸洪秀全，谓此书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秀全乃潜心读之，遂大觉悟。看来，现实的挫折，使其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忿闷情绪和反抗心理，《劝世良言》给他的恰恰就是这一思想的形式。本来，这本小册子就不是严格意义上基督教经典的阐释，它是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在 1832 年以“学善居士”的署名，将基督教《圣经》中的某些要旨与中国传统经典的若干内容加以附会诠释。在他所撰写的六十几个互不联贯的章节里，反复宣传的是拜上帝。敬耶稣、反对崇拜偶像。邪神，宣扬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的教义，洪秀全则将之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歪

曲，他所取的只是上天独一无二的真神，即“上帝那和华（GodJehovdaU’”。强调所有的富贵光荣，皆由之而来，上帝亦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因此，他的反清思想以那个并不存在的皇上帝才是真神，而其他被人们崇拜的偶像神抵都是妖魔作为前提）导出一整套反抗现行政权的造反理论。即现实社会中用“皇”“帝”这一类称号的人间统治者，“妄自尊大，自诩永免地狱之灾”，就应视为妖魔而被打倒，那些平日残食百姓的文武官吏则是为虎作张的妖徒鬼卒，也为上帝所不容。于是，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并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和思想水平最高的农民大起义。其对近代中国变革发展和道德重建的深远影响，体现在：首先，太平天国意识形态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宣扬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声称他们就是要破除现实世界的掠夺斗杀和重建理想公平社会。金日起义前后，起事者内部曾严格地实行了同食同穿的“圣库”制度，人们都将自己的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缴纳公库，衣食则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其实际意义一方面使一些贫穷困窘者得以在太平军中得到基本的生活安全保障。如李秀成在他的自述中就说，他参加太平军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吃一顿饱饭。另一方面也较为充分地安抚和满足一些普通民众在动乱年代的生活要求和社会期盼，有些人参加太平军就是相信拜了上帝就不会再被蛇虎伤害，或被豪绅欺侮的宣传；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这一思想又在于通过暴力的方式剥夺剥夺者。所到之处，太平军将士们宣布：“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其次，太平天国意识形态又突出了百年来汉民族作为被压迫民族的反满民族思想。太平军进入湖南后颁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文件，文字极富煽动性，声称汉人应有汉人之形象，而满洲悉令剃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汉人变为禽兽；汉人应有汉人之衣冠，而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使汉人忘其根本；汉人有汉人之伦，康熙阴令满一人管十家，淫乱汉人之女子，是欲汉人尽为胡种；汉人有汉人的配偶，而满洲统治者悉收汉人之美姬为妾；甚至还说满洲制度。满洲京腔，都是清统治欲以胡言胡语惑汉人，以致“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与五胡。”所以，这一宣传又较为有效地吸引了大批天地会会党，以及那些仍有规复之志的汉族士大夫们。如举人胡孝先、钱江，甚至还有未出仕之前的左宗棠和洋务思想重要鼓吹者的王韬。

但太平天国的悲剧却在于兴也忽焉，扑也忽焉，值得深思的是，如前近代中国发生过的无数次农民起义一样，只不过在当时昏暗的天幕下犹如一道闪电，划出了瞬间的耀眼光芒，最终未能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发展出新的路径。原因或许是，它的发展同样极深刻地带有那个衰世时代的所有颓败特征：只在破坏而未能建设；只在报复而未能谋求历史的谅解和包容。就如太平军兴起之日，数十万底层民众抢掠相踵，蜂拥而至；但其施旗蔽日，征帆满江，所到之处却是一片虚墟，满目疮痍。据说，太平军攻克南京，进入总督衙门，有人将满屋人参误认为胡萝卜，烩为一锅；还有人抢得衣服太多，十数件一应套在身上，行走都不方便。尤其是洪秀全等太平军领袖在天京广征媳妾，大建殿宇，极尽六朝缔罗金粉之奢华；再加上太平军领袖之间连续发生的血腥权力倾轧，都注定这一中国历史上动员最为广泛的民众运动，绝无可能发展为一场经国序民。以道义定天下的文化重建和社会革命。当然，历史责任不能由太平天国来承担。更深的困窘在于：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和奢侈浮虚之风，已形成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穿透力和影响力，竟使得像洪秀全这样一些对之深恶痛绝的反叛者，他们的浴血

搏击与其说是一种破坏，毋宁说是对之衰朽之处又一种意义上的强化和补充。因为，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理结构，洪秀全等人下意识要破除的只是那些体现在自己身上的贫富不均和种族歧视，而非这一制度本身及其得以存在的那些道德原则。正如洪秀全进入南京之后就撰写近百首《幼学诗》。《天父诗》，宣扬的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心扶主，生杀由天子，男女五岁不同席的专制纲常伦理。与之相应，太平天国又仿效专制统治者制定诸王出巡。不及时回避。冒冲仪仗，均斩首不留等一些严格等级制度。

而且，大多领袖人物沉湎于荒淫无耻的生活，都表明起事之初最为精彩，也最能和现实衰朽政治相区别的那种以兄弟姐妹亲情为基础的平等平均意识早已丧失殆尽，其结局也就注定重蹈衰朽而别无他途。

另一方面，这一运动在现实社会风俗之坏，人心之愤的制约和导引下，发展的路向非但不能摧陷廓清，以待新命，而且有着强烈的历史倒退意向。正如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发聋振聩，攻城掠地，声势极大，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凝集了千万被践踏和凌辱的底层民众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和极端敌视，但当不满得到宣泄，个人失去的有所补偿，就成为参加者的唯一目的。

除此之外，尚复何求？至于那些在起义之初所提出的平等、平均诉求，以及后来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其思想的意义只不过是要倒退到分散、孤立和封闭的小农经济，并彻底取消商品交换。它规定按人口分田至户，农民按户种田，在分配上则要求每家每户除口粮外，收获一律上交国库，遇到婚丧喜庆，由国家采取通天一式的限制，从国库中支付。但在社会层面上，大小官吏“世食天禄”，农民则必须耕田奉上。因此，这些原本十分精彩的思想，在专制体制的基本结构下，更多的还是作为政治动员的符咒和号角，蛊惑和煽动的有效性不仅在于它要否定现存的社会秩序，而且还要否定文化和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结构，以便向那更为普遍的贫穷、压抑、强制和掠夺，甚至更普遍没有个性的原始状态倒退。或许，这正是中国特色最早的、朴素的乌托邦？

六、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孙中山先生当推为近代第一人。

与整个知识阶层更多地从西方思想中寻求救国方法有所不同。后一时期的孙中山则开始注重从中国文化精神中寻求思想资源。本来，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者之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主要受西方近代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形成，如天赋民权，三权分立等欧美政治理念。他曾多次谈到西方对中国近代化的示范意义，如 1904 年 8 月以英文发表在美国报刊上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就有：“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

孙中山的社会改造思想可用“三民主义”进行概括。早在 1905 年 11 月，孙中山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写的《发刊词》中，就认为“民族”、“民权”、“民生”是欧美各国进化的根本，只要实行了这三大主义，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中国也可以臻于独立富强的美境。辛亥之后，清政府被推翻，民国政府业已成立，孙中山以民族、民权两主义俱已达到，认为“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努力的，即在此事”。1912 年

9月，袁世凯举行宴会饯别即将返沪的孙中山，席间问孙中山道：“方今革命可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孙中山则莞尔从容回答：“满清幸已推翻，如云国中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袁世凯闻而失色。孙中山却态度坦然。但就当时孙中山的思想而言，这只是要进一步推展民生主义之革命。后来，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以及军阀们的反动统治，又使孙中山投入到现实政治斗争中，组织和发动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北伐革命”，并筹划成立“中华革命党”和改组国民党等等，但其思考重心则始终在于如何进行社会革命。著于1919年的《建国方略》，孙中山制定了极为详尽的经济发展计划。涉及的范围包括：如港口建设、内河大江运输体系、铁路建设、蒙古新疆的发展、铁矿和钢铁厂、服装工业、居室工业，教育等各个方面。

这一思想当然可归之于近代中国追求富强的时代主题，但与前人相比，如洋务运动时期那些改良思想家，以及此后的康有为，严复等人，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并没有刻意凸显富强于反对侵略，洗刷国耻的总体意义，而是强调满足普通人民食、衣、住、行的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这一思路正与儒家经济伦理相吻合，先贤们向来认为养民之政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即水、火、金、木、土。只有当这些称之为“六府”的物质资源被充分开掘和利用时，然后方有正德、利用、厚生“三事”的允洽，也就是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这在孙中山那里，就是“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国的人民都能够享受”。

孙中山究竟怎样实现自己思想的又一次创新？在1905年，在孙中山最早提出民生主义时，主要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他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切。如最为富强的英国为例，资本主义的发展虽使社会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超过前代也不止数千倍，以致某大地主的地租占伦敦城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可见，那时孙中山强调要在实行民族、民权革命的同时，也要实行民生革命，还多从政治家的角度考虑，他预言欧美工人罢工、无政府主义、社会党人的兴起，社会将其不远。中国如能将这三大革命同时进行，“还视欧美，彼且睦乎后也。”毕竟，在他看来，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伤国民的元气。因此“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辛亥之后，现实政治变革面临着诸多困窘，孙中山转向了更深层的文化思考，意识到政治变革必须要有道德重建作为支撑。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重要理论著作，如《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三民主义》大都写于这一时期，而是在思考中国问题时更多地转向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汲取智慧。

如他多次强调欧洲驾乎中国之上的只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自有其政治哲学之真谛，进而言之：首先，孙中山的社会改造思想已植根于儒家思想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如他认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斗争，而是互助。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虽然，俄国

社会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完成于1900年，其中也谈到人类社会、氏族。部族的组织及其风俗习惯与制度都是建立在人类互助的基础之上，并以此反驳那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把达尔文生物进化的生存竞争原则应用到历史社会上去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孙中山早在1912年8月对北京学界讲演《学生应主张社会道德》中就以另一条思路，明确表示不同意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优胜劣败之说，主张用以有余而补不足的学说重建社会道德。就如《诗经·大雅》中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指出人们秉执的常性，都是美德。孟子则更为明确地论证每一个人都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在此之上，儒家又有博施于人而济于众的一整套社会伦理道德。孙中山从人性之善，而不是人性之恶，演化出关于社会进化的理论，认定社会进化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经济利益的调和，非因大多数经济利益的冲突所致。具体言之，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日见激烈，资本家在中国却寥若晨星，且仅见于通商口岸，进而提出“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向来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在于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如孔子所言：“丘也闻有国有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平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一理念并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其根本要旨却在于不断提示政治家们要以普通人民为社会的主体，最大可能地抑制分配层面上的社会不公正。

但作为孙中山社会改造模式的基本原则，防止贫富不均，又是他殚思尽虑之所在。辛亥之后，党内曾有人反对他的“节制资本”，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在欧美文明国中尚不能行，更何况于中国。且眼前中国急需发展民族经济，在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岂能不依赖外国资本和私人资金。然孙中山则反驳道：他的社会改造模式非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家。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至于那些主张中国必须经过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在孙中山看来就如共和之先必经君主立宪之一级，“是不待辩而自明者也”。

再次，孙中山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改造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而且也包括所有的国家事务。孙中山相信，富强与文明并不能划等号。他说：同时代的很多改革志士改造中国的理想，不过想将中国发展成一个极强大的国家，以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罢了。其实不然。

今日最富强的莫过于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了。在孙中山看来，文明的定义是民主共和，同时也包括贫富不能过于悬殊。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孙中山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惟俄国为新式。所谓新式的定义就是以道德和文化为本位，如俄国能够“化国为家，人人当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同心协力”。

1934 从小受到免费教育。穷人的孩子，国家为之代谋，成人后有田可耕，有工可做，年纪老了的时候，又有国家发给的养老费，全国就像一个大公司，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孙中山说：“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而且，他还多次强调，在今日我民族未发达之先，就应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昌盛的时候，想到今日身受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要把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即“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

是我们四万万人的责任”。

尤其是，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思想资源又进行了重新阐释，使其社会改造模式更具时代和历史的特征。孙中山说，穷本极源，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民族团体以外，还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具体地说来，孙中山认为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为外国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将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至平天下止。虽然孙中山认为，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应该要保存的；但传统文化只是将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置于道德的范围；而他则要将其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为适当。孙中山说：“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功夫，从前虽然是做过了的，但是自失去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明其妙的。”这一改造，如其将传统“知易行难”说反其道为“知难行易”，目的是要凸显道德的价值导向和实践意义，在现实的政治变革中则是为了避免国民革命再蹈中国历次农民革命之覆辙：他说，凡人类皆有其主义。以发财而论，则人人皆欲之，我党之救人，亦属发财主义。

但常人则欲个人发财，我党则欲人人发财而已。“古代草莽英雄，出而革命，乃化家为国之革命，我党则不然，乃根本民意而革命，实为化国为家之革命。”而这一思想的道德基础在于孟子“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孙中山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之内，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们的责任。”在中国古代社会，这一道德训诫全部的政治含义，不过是对统治者个人的道德约束。如孟子对梁惠王大讲“义利之辨”，强调“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充其量只是要求统治者不以个人之私利而坏天下之公利，推己及人，推恩天下。而孙中山则不同。后来被尊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人的孙中山，那时候即已把西方社会的民主理念结合进来，既有工具理性，更有价值理性，不仅在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同时也在于百年中国的道德重建和社会伦理的完善。在风雨如磐的年代里，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孙中山先生圣心苦雨，独力撑天，九死而不悔。

即使是在他逝世 73 年后的今天，仁立在夕阳西下的世纪山巅，我们也依然还能感受到那曾经照耀两个时代的巨星的奕奕风采，我们也仿佛依稀还能听到伟大国父那铿锵有力的召唤——来吧，让我们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奋斗！